[英] 朱利安·巴吉尼 著
张容南 杨志华 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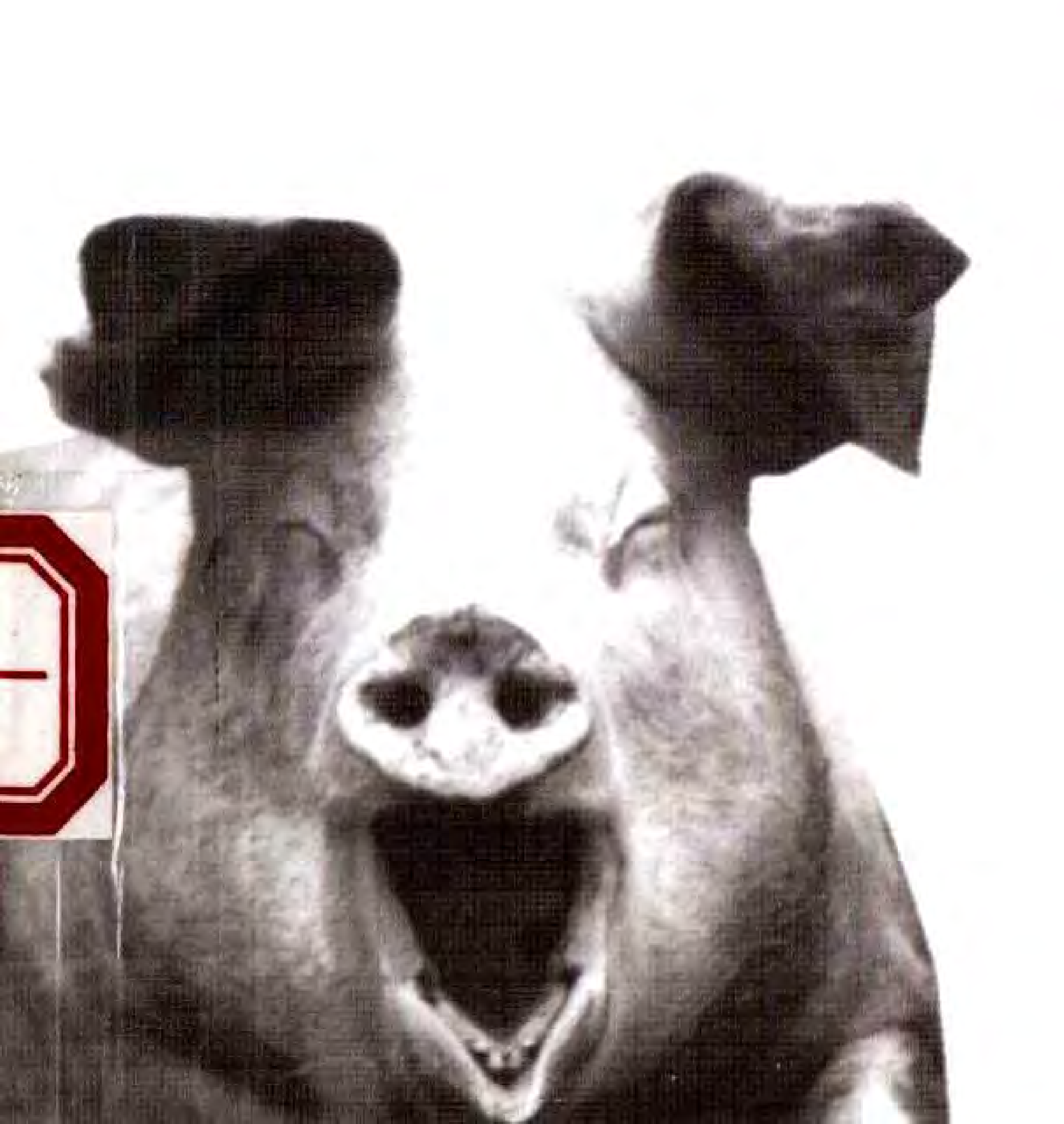
上海三联书店

一头想要被吃掉的猪

100个让人想破头的哲学问题

The Pig That Wants to Be Eaten
and Ninety Nine Other Thought Experiments

JULIAN BAGGINI



上海三联书店

1. 一个素食主义者面对一只希望在人类餐桌上而献身的猪该怎么办？杀死一只无脑鸡是否比拔起一根胡萝卜更野蛮？

2. 网络虚拟外遇拥有出轨的所有快乐却没有第三者，这算不算不忠？该如何界定婚姻中真正的背叛？

3. 作为一名科学家，玛丽知道一切有关红色的知识，然而玛丽是一名色盲患者。心灵与身体是同一的还是同时并存的两个不同的东西？

4. 你在ATM机前提取100美元，你却拿到1000美元现金和一张100美元的收据，账户也一切正常。没有某个人受损失。这是天上掉馅饼吗？

5. 一个凡事依从理性的人，吃光了家中所有的食物。他的家住在离两家相同超市同样近的地方。该选择去哪一家才算符合理性呢？

6. 婚姻中的两个人都偷偷地保护好自己的财产，没有人因交出信任而受到欺骗，理性抉择保护了他们免于婚姻的最差结果，然而最美满的婚姻是否也因此失之交臂呢？

7. 你是一个以“不浪费，不欠缺”为人生信条的人。当你的猫不幸被车撞死了，但它还是一块完整的肉，该不该煮来吃？


ISBN 978-7-5426-2770-4
9 787542 627704 >
定价：28.00元

一头想要被吃掉的猪

100个让人想破头的哲学问题

[英] 朱利安·巴吉尼 著
张容南 杨志华 译

上海三联书店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一头想要被吃掉的猪:100个让人想破头的哲学问题/(英)巴吉尼著;张容南,杨志华译. —上海:上海三联书店,2008.8
ISBN 978-7-5426-2770-4

Ⅰ.一… Ⅱ.①巴…②张… ③杨… Ⅲ.哲学—普及读物 Ⅳ.B-49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08)第033954号

一头想要被吃掉的猪

100个让人想破头的哲学问题

著　　者 / [英]朱利安·巴吉尼
译　　者 / 张容南　杨志华

策　　划 / 徐志跃
责任编辑 / 邱　红
装帧设计 / 贺维彤
监　　制 / 李　敏
责任校对 / 张大伟

出版发行 / 上海三联书店
(200031)中国上海市乌鲁木齐南路396弄10号
http://www.sanlianc.com
E-mail:shsanlian@yahoo.com.cn
印　　刷 / 上海叶大印务发展有限公司

版　　次 / 2008年8月第1版
印　　次 / 2008年8月第1次印刷
开　　本 / 890×1240　1/32
字　　数 / 170千字
印　　张 / 9.75

ISBN 978-7-5426-2770-4/B·175
定价:28.00元



朱利安·巴吉尼（Julian Baggini），英国哲学家和作家，是《哲学家杂志》的共同创办者和主编，《卫报》、《独立报》和BBC撰稿人，也是BBC第4电台《在我们的时代》栏目的定期嘉宾。他的书包括《哲学家在想什么》（上海三联书店2007年版）和《哲学和人生意义》等。

前　言

脱离理性的想象只是幻想，而缺乏想象的理性则是贫乏的。这部分地解释了为什么科学家和哲学家总喜欢用一些想象的情景来磨砺他们的思想，并将其推向极致。这类“思想实验”的目的是揭开实际生活中复杂事物的表象，让人们更清楚地关注问题的实质。

因此，举例来说，一个真实生活中的伦理困境由于其偶发的、特殊语境的种种因素总是十分复杂。以吃肉是否道德这个普遍问题为例。如果你考虑吃你能吃到的肉类是否错误的话，很多因素将会起作用。一些动物可能会由工厂饲养，一些动物被仁慈地喂养，一些野生动物是被捕捉而来。一些动物可能被饲养在曾经是雨林的土地上，另一些则可能自由地在开放的草原上吃草。一些肉可能是有机的，一些可能是经过基因改造的，还有一些可能是从世界的另一边运送过来的。因此，要决定伦理上的是非曲直，需要考虑所有这些复杂的因素，并相应地对不同的考虑给予权重。

像科学实验一样，思想实验之所以有用是因为它们的目的在于排除可变的、特殊的因素，去看仅仅在思想实验的情形之下我们对世界的理解将产生怎样的变化。因此，如果我们要考虑吃动物的伦理，我们可以设想这样的情景，在其中我们关注的特殊问题是

在两种情形下唯一可变的因素。如果我们担心我们是如何对待农场动物的，让我们想象如果动物得到了良好的照顾，仅此而已，情况会有什么不同。如果仔细审查我们的目的，我们可以问的是，如果你的鸡场的鸡在一次意外事故中死去，而我喂养的鸡的脖子被有意地拧绞着，在此之前它们的生活状况是差不多的，那将会有什么不同。我们可以简单地规定其他所有条件都是相同的，因此我们唯一需要解决的就是核心的道德问题。

思想实验不仅比实际生活整洁简单，事实上它们还帮助我们思考那些我们不可能在实际生活中得到求证的事情。有时它们要求我们去想象那些不管是对此时的自己还是对全人类来说都不实际，甚至不可能的事情。虽然这些实验让我们考虑的问题看上去很古怪，但任何一个思想实验的目的都是相同的：将我们的注意力集中于一个核心概念或问题。如果一个不可能发生的情景帮助我们做到了这一点，那么它的不可能性我们就无须介意了。思想实验仅仅是一个帮助我们思考的工具，它并非假装于描述实际生活。

这本书中的100个情景主要（但并非全部）来自于哲学家们的论证。他们有时把一些我们很少质疑的假设完全颠倒，有时他们为一些看上去很棘手的问题提出解决的方案，有时跟随他们的暗示，我们看到那些完全不像是问题的事情是如何成问题的。

这既不是一本参考书，也不是那些老问题的答案集；它更像是引发更深层思考的一种刺激，一种激励。在紧随这些情景之后的评论中，我可能建议一种走出困境的方法，或者我可能扮演魔鬼代言人的角色：让你来决定应该怎么做。

同样，书中所附的前后参照的目的在于提议，而非科学的决

断。有时情景之间的联系是显而易见的。而有时联系本身就是让你用新的角度看问题的方法。

很多思考路线都可以从这本书开始,但不止于此。

致　谢

第101个思想实验：一个接受了慷慨的支持、帮助与他人建议的作者没有在他的书中对这些人表达谢意的话，他只是出于疏忽和健忘呢，还是应该受到道德的谴责呢？

我敢肯定我不是前者，就是后者。但我不会漏掉所有人。编辑，其职位的名称暗示它是一个动词而非一个名词，对书籍的出版起着关键的作用。乔治·米勒就是这样一位编辑，从这本书的最初构想到最终完稿，他的付出都是不可磨灭的。我还受到了格朗塔出版社许多好人的帮助：沙吉达赫·阿迈德，路易丝·坎普贝尔，弗朗西斯·霍宁戴勒，盖尔·林齐，安吉拉·罗斯，威尔·塞门，贝拉·夏德，科莱特·维拉和沙拉·维斯里，还有莉齐·克瑞默一直以来给予的大力支持与明智的指导。

为避免提及一些人而忽略掉另一些人，我愿意把我衷心的谢意致予每一个为这本书的写作解答问题或提供线索的人。说什么因为要感谢的人太多而无法顾及可能只是一个谎话。不过，对不够仔细的人来说，要感谢的人太多以至于没有记录下来这点倒是真的。

最后，我想感谢杰瑞米·斯坦格鲁，说得正式一些是感谢他的智慧、洞见与这些年来的争论对我的激励，实际一点来说是因为他认为致谢与献词时常不过是自夸与迎合，所以这可能真的会骚扰到他。

附　注

由于一个思想实验有一个或多个资料来源，我会在每一个情景的结尾处把详情注明。但是，需要注意的是虽然我的版本有时与资料来源的材料非常相似，但有时它们却非常不同。所以，读者要设想这些资料来源只不过为这本书中的情景提供了一些灵感而已。

如果没有给出资料来源，一般来说这是因为思想实验受到了更为广阔的辩论的激发，这个辩论不是能从一两个资料来源中挑选出来的。当然，也不必认为这是我有意表现自己的创新性。

一些情景可能有资料来源，但由于我的无意识而未被指出。我很高兴在以后的版本中能够更正任何这样的遗漏。

目　　录

1

邪恶的魔鬼

有什么东西是不证自明因而不可怀疑的吗？有没有可能我们的生活不过是梦呓或者世界只是我们想象的虚构呢？这些观念虽然看上去古怪，但构想出这样的问题只是想说明物理世界的实在是可以被质疑的。

但是，还有一些观念看上去是如此清晰自明以至于它们必须是真的。例如，不管你是醒着还是在睡觉，2 加 2 都等于 4。不管这个真实的或想象的世界是否包含有三角形，一个三角形必须有三条边。

但如果这是上帝或一些法力无边却心怀恶意的魔鬼在戏弄你呢？难道不可能是一个邪恶的灵魂在愚弄你，让你把错的当成是对的吗？我们不是见过催眠士让人从 1 数到 10，而他们完全没有意识到他们漏掉了 7 吗？又怎么解释一个人在梦中听到钟楼的 4 声钟响，却百思不得其解："真奇怪。这个钟居然在 1 点的时候敲了 4 下！"

如果邪恶魔鬼的存在是可能的，那么还有什么东西是不能怀疑的呢？

资料来源：雷内·笛卡儿，《第一沉思录》，1641 年。



哲学家们有一个习惯，就是找出一些我们认为我们知道的事物，然后给出理由使我们怀疑我们究竟是否真的知道。自然法，物理世界，上帝，善，他人的心灵，正义，时间——哲学家们已经找出了许多理由来质疑它们。

为了推进这种深刻的怀疑论证，这位哲学家需要运用一件他不能怀疑的事物：他自己理性思考的能力。因此，举例来说，时间的存在是可以被质疑的，因为传统的时间概念包含着许多矛盾。这些矛盾包括违背了基本的逻辑原则，如不可能同时在场又不在场。正是能够认识逻辑悖论的这种能力让这位哲学家可以思考并证实他的怀疑。

但是如果我们在一位骗术高明的魔鬼的影响下，这种可能性由17世纪的法国哲学家雷内·笛卡儿第一次提出，那么我们把这些基本的逻辑原则当作是真的则可能是错误的。可能在我们看来它们是显而易见和不证自明的，但同样在催眠士控制下的人也会认为8在6之后是显而易见和不证自明的。而对那个受到迷惑的做梦者来说，也许在1点的时候敲4下是显而易见和不证自明的，而我们都“知道”它实际上只是在4点的时候敲了一下。

一位骗术高明的魔鬼这种观念可能看上去有点夸张，但是同样的质疑也可以由其他方式引出。我们可能只是疯了，我们的精神错乱让我们误以为别人不是以我们这样的方式来看待世界

的。或者有可能进化赋予了我们所有人的头脑一套有缺陷的逻辑原则。还有可能是因为如果我们把一些错误当成是“显然真的”会让我们更适应生存。这个魔鬼也许可以由我们的DNA来破译。

这个思想实验的天才之处就在于，为了判断其真实性，我们不得不依赖于这个测试原本想要质疑的东西：我们理性思维的能力。我们只能通过尽其所能地思考来判断我们是否能够思考得好。因此我们不能把自身与我们试图从一个中立的立场来评价它的思考能力二者截然分开。这就像为了测试其准确性，试图用一个可疑的秤来称自己的重量。

可能这就是这个思想实验教给我们的：我们的理性能力是任何严肃思考得以进行的基础。我们可以通过艰辛的思考来质疑任何一个特殊的推理是否合理。但我们不能怀疑我们普遍的理性能力是否有缺陷。最多我们可以说它看来可以很好地服务于我们。这是不是就足以充分地维护理性了呢，或者它削弱了理性？

思考链接：

19. 揭穿谎言
28. 恐怖的情景
51. 桶中之脑
98. 体验机

2

光纤传送

对斯泰利奥来说，电子传送机是唯一的旅行方式。以前从地球到火星要好几个月，还要被囚禁在一个拥挤的机舱里，外加一份远非完美的安全记录。而斯泰利奥的电子传送机改变了所有这一切。现在旅行只需要几分钟，并且到目前为止它百分之百的安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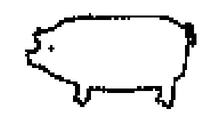
但是，他现在要面对一起官司，一位不满意的顾客控告说这个公司事实上谋杀了他。他的理由很简单：电子传送机通过分子扫描你的大脑与身体，毁灭它们，然后把信息传送到火星，再将你在火星上重组。虽然看上去在火星上那个人的外貌、感觉和思想与被催眠并穿越时空的这个人是一样的，但原告却认为实际上发生的事情是：你被谋杀了，然后被一个克隆人取代了。

在斯泰利奥看来，这是荒谬的。毕竟，他已经通过电子传送机旅行过很多次了，而且他从没感觉他死了。的确，如果这位原告真的相信他被这个过程谋杀了，他又怎能把这个官司告上法庭呢？

然而，当斯泰利奥又一次进入电子传送机的操作室，准备按下那个将他分解的按钮时，那一刻他的的确确怀

疑他要做的是自杀……

资料来源：德瑞克·帕菲特，《理与人》，第 10 章，牛津大学出版社，1984 年。



我们的持存依赖于什么？在通常的情况下，我们会说是我们身体的持续运转。但是既然没有身体的哪一部分不能想象被一个人工合成的替代品来取代，也许这并不必然是真的。那么是不是只要我们的意识在继续，我们就持续存在呢？如果有一天，根本没有这样一个人在醒来的时候认为他就是我，有我的记忆、计划与个性的时候，那日，我就已经死亡了。

个人同一性的"心理连续性"理论有一种直觉上的吸引力。这仅仅因为它看上去反映了我们的基本直觉。我们可以读懂像卡夫卡的《变形记》这样的故事，其中一个男人在一只甲虫的躯体中醒来。我们马上就能意识到这个男人就是甲虫，因为他的心灵寄居其中。心理的而非物理的连续性表明了他是同一个人。

但是在电子传送这个例子中，虽然我们就像在日常生活中那样拥有心理的连续性，看上去无可争议的是，它还是像一个复制品，一个克隆。而一个克隆人和被克隆者并不是同一个人。说它们是相同的只有在这个意义上才说得通，从同一个模子里铸造出来的两尊塑像是相同的：它们在每一个细节上都是相同的，但它们仍旧是不同的实体。如果你毁掉一个，另一个还是好好的。

并非斯泰利奥不清楚他的传送机是如何工作的。他只是不清楚严格说来他的机器每次克隆他这个事实有什么意义。就他而言，他所在意的是走进操作室就能在另一个行星上醒来，而其物理机制是无关的。

如果这听上去是油腔滑调，那么请花一秒钟考虑这种可能性，几年前的一天晚上，你在睡梦中被绑架，经过电子传送机的处理，不知不觉中又回到了你的床上。如果这样的事发生了，你根本就不可能知道，因为作为一个持存者，你对进行中的生活的意识经验与它没有发生相比是一模一样的。电子传送的事实同样让你的生活和世界与之前的完全相同。

那么，也许询问斯泰利奥是一个克隆人还是同一个人是一个虚假的问题。也许我们应该问的是对我们过去和未来的存在有意义的事。而可能不管答案是什么，必要的是一种心理的连续性。

思考链接：

38. 我是一个大脑
46. 阿米巴人
65. 灵魂转世不变
88. 毁灭记忆

3

印度人与冰

达拉·古普塔一辈子都在拉贾斯坦沙漠靠近贾沙摩尔的一个村庄里生活。1822年的一天，她正在做饭的时候，突然听到外面一阵骚动。她循声望去，看到她两年前出门旅行的表兄马哈维尔回来了。他看上去很健康，吃过饭之后他就开始描述他的历险了。

他的故事里有强盗、野生动物、雄伟的大山以及其他一些让人难以置信的景观和冒险。但最让达拉吃惊的是他声称看到了某种叫"冰"的东西。

"我去到了很寒冷的地方，那里水停止了流动而形成了一种坚固的、半透明的块状物，"马哈维尔继续说道，"更让人吃惊的是在水与液体变厚的地方竟然没有中间状态。自由流动的水只是比这些凝固的液体稍微暖和一点。"

达拉不想在公共场合质问她的表兄，但她根本不相信他所说的。因为他说的与她所有的经验相违背。如果有旅行者给她讲喷火龙的故事她是不会相信的，她也不会相信这个关于冰的胡言乱语。她暗自庆幸说，自己的聪明才智才不至于被骗呢。

资料来源：大卫·休谟，《人类理智研究》，第十章，“论奇迹”，1748年。



达拉怎么会是对的呢？从某种意义上说她显然是错了嘛。我们知道马哈维尔对冰的叙述是不可以与火龙的故事相提并论的，相反它是对水在凝固状态的一种准确描述。

但从另一种意义上说达拉又是对的，因为我们有时会因为正确的理由而犯错误。例如，一朝致富的图谋。绝大多数使用电子邮件的人每天都会收到大量的信息，承诺说只需支付“小部分”费用就可以赚很多钱。由于它们几乎无一例外是骗局，而考证其可信度要花费大量的时间，所以唯一理性的行为就是不去理睬它们。但是，这意味着有可能哪一天你会忽略掉一个真正的机会，因而放弃了巨大的财富。这封特别的邮件不是一个骗局，但当你认为它可能是的时候，你的推理仍然是正确的。

这一点同样适用于达拉。我们不应该相信被告知的所有关于自然界如何运转的描述。当人们告诉我们他们只要用脑袋想就可以浮起来或让钟表停止，或者可以用水晶来治病的时候，我们当然应该保持怀疑。我们过去的经验告诉我们这样的事情是不会发生的，它们要么缺乏有力的证据支撑，要么只是骗局。我们无需设想说这些话的人都是骗子：他们也许只是犯了错误或者推理能力糟糕而已。

然而，问题在于有时有些事情的确迫使我们不得不重新思考我们认为自己已经知道的事情。我们不能因为一个观念与我们先

前的观念不符就不去理会它。相反，我们要有足够的理由才能这样做，因为那些被坚信和被树立起来的观念应该比一个个人或一个小群体所相信的与之相反的观念承担更重的论证负担。

这就是达拉有问题的地方。一个人的证词，即使这个人是她的表兄，也不足以反驳她对自然界的所知——液体是不会在某个不可思议的温度变成固体的。但是她也应该承认她没有去过她表兄到过的那些寒冷的地方。因此，她自身的经验是有限的，但对于超出她经验的东西她只有表兄的言词而已。达拉的不相信是让她的知识变得更狭窄了呢，还是为了不在更多的场合受骗、犯错而不得不付出的代价呢？

思考链接：

40. 摇摆木马的赢家
63. 我真的知道吗
76. 装有芯片的大脑
97. 道德运气

4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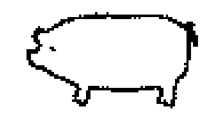
虚拟出轨

像许多结婚多年的人一样，迪克对这种关系已经感到厌倦了。日子过得毫无激情。事实上，迪克和他的妻子几乎不睡在一起了。但是，迪克从没想过要离开他的妻子。他爱她，并且她也是孩子们杰出的母亲。

他完全清楚这种问题的通常解决办法：出轨。你只需要接受这个事实：你的妻子满足你的一些需要而你的情妇满足另一些。但迪克不想背着他的妻子做这样的事，并且他也清楚即使他这么做，他的妻子也不会这样做。

因此当迪克听说虚拟出轨有限公司（“甚至比真的还要好！”）时，他开始认真地考虑起来。这个公司提供一种服务，为你制造一起虚拟性爱。它不是和网络另一端的一个真人进行一次性的网络性交，而是在一种虚拟实在的环境下让你和一个模拟人“睡觉”。它让人感觉就像真正的性交，但实际上，你所有的经验都是由电脑刺激你的大脑造成的，它让你感觉你就像真的在做爱一样。

它拥有出轨的所有欢乐，却没有第三者，因此不是真的不忠。迪克有什么理由说不呢？



为什么不忠让我们困扰呢？有人说我们用不着这么烦恼，这不过是由于我们的文化让我们对一夫一妻制抱有不切实际的幻想。性与爱是完全不同的。如果我们让性交这种生理驱动的行为去破坏一段美好的关系，那我们就是傻瓜！

如果一夫一妻制的需要只是文化的假象，那么它是如此的根深蒂固。许多进入自由性爱社区或尝试着交换性伴侣的人，在看到他们所爱的人与其他人睡觉时，都禁不住会嫉妒。我们被告知应该扔掉的难题看来并不仅仅是一些需要被克服的心理障碍。

所以，如果不忠对大多数人来说仍然是个问题的话，那么究竟是什么让我们如此烦恼呢？想象一下如果我们的伴侣使用虚拟性爱这种服务我们的感受如何会帮助我们回答这个问题。如果我们不反对网络性爱，那说明出轨的核心要素是第三者的存在。我们最亲密的关系一定是一对一和排他的。传统的一夫一妻制正是我们想要维持的。

但是如果我们反对这种虚拟出轨，那说明有没有第三者根本就不重要。事情的关键不在于一方是否去找了别的人，而在于对夫妻关系的背离。依照这种观点，当迪克打开电脑进入虚拟性爱时，他所发出的信号是他不再把妻子视为他希望表达性需要的对象。

出轨是一段关系存在问题时的一种症状，而不是引起这些问题的第一原因。这才是迪克寻找虚拟情人时不安的来源。而这当

然是真的，因为甚至在迪克登录上网第一次寻找那令人激动的模拟性爱之前，他就已经不再像从前那样认为自己的妻子性感了。所以虚拟出轨不是解决核心问题的方法，而只是在逃避问题。

在真实的世界里，不忠之所以困扰我们的原因是复杂的。反对虚拟出轨的人也许会更强烈地反对真正的肉体出轨。迪克的例子让我们可以把注意力集中于不忠的一个方面：究竟达到怎样的程度才算是对我们最珍视的关系的背离？

思考链接：

27. 履行义务
44. 至死才分离
91. 无人受损，就可为恶
96. 自家人优先

5

一头想要被吃掉的猪

在做了40年的素食主义者之后，马克斯·伯格现在准备坐下来享受一顿由猪肉香肠、卷熏肉和油炸鸡胸肉构成的盛宴了。马克斯一直很想念肉食，只不过他的原则总是能战胜他烹饪肉类的欲望。但现在他可以良心无愧地来吃肉了。

香肠和熏肉来自他一周前碰到的一头叫做皮瑞西拉的猪。这头猪接受了基因改造所以能讲话，更重要的是，她希望被人吃掉。在人类的餐桌而终是皮瑞西拉一生的梦想。在她上屠宰场的那天，她醒来之后一直满怀着期待。在她兴冲冲地跑向舒适而人道的屠宰场之前，她已经把所有这些都告诉马克斯了。听完她的故事之后，马克斯觉得不吃她就是不尊重她。

鸡肉则来自一种基因改造过的鸟类，这种鸟类被切除了“大脑”。换言之，它就像植物那样生活，没有对自我、环境痛苦或喜悦的意识。因此，杀掉它并不比拔起一根胡萝卜野蛮。

但是，当盘子摆到他面前的时候，马克斯感到一阵反胃。这只是一生都是素食主义者的马克斯的一种反射性反应呢，还是一种合理的精神痛苦的生理表征呢？镇静

下来之后，他拿起了刀叉……

资料来源：道格拉斯·亚当斯，《宇宙终端的餐馆》，潘发行社，1980年。



考虑动物福利现在已经不限于一小部分素食主义者了。这没什么好奇怪的，既然杀生是问题的关键，那么素食主义者也不应该拍死苍蝇或消灭老鼠，尽管并非所有，但大多数素食主义者都乐于这么做。

有两个主要理由可以说明喂养和杀死某些动物是错误的。第一个是动物饲养的条件问题。这里所说的是一只动物在活着的时候的悲惨遭遇，而不是它死亡的事实。第二个是杀生这种行为本身使原本可以有一个美好未来的生物的生命终结了。

第一类问题可以简单地由确保良好的饲养环境来解决。许多考虑动物福利的人还是会吃在放养状态下（而不是集中喂养）生活的家禽和羔羊。

然而，第二类问题对素食主义者来说还是存在：反对杀生行为。可如果我们能够创造一种没有自身生存利益的动物呢，它们就像胡萝卜一样没有意识？那么剥夺它们的存在还是错误的吗，它们根本就意识不到自身的存在？或者要是动物希望被吃掉呢，就像道格拉斯·亚当斯在《宇宙终端的餐馆》中所设想的那头猪？

那本小说的主角，阿瑟·邓特，听到这种提议后在恐惧中畏缩

了一下，把这描述成"我所听过的最让人反感的事"。许多人可能有和他同样的反感。但正如阿普霍德·彼伯博克斯反驳邓特的那样，这肯定"比吃掉不愿意被吃掉的动物要好些"。邓特的反应看上去不过是"厌恶"的另一种版本——当人们遇到一些他们认为不自然，尽管没什么道德问题的事情时的一种本能的畏缩。器官移植和输血最初看上去也很反常，但当我们习惯了以后，认为它们是道德上错误的想法就消失了，除了极少一部分宗教派别还这么想以外。

人们可能会谈论动物的尊严或对自然秩序的尊重，但我们能够严肃地说，由于去脑鸡类的产生，鸡类的尊严被损害了吗？皮瑞西拉的死不是享有完全的尊严吗？那么难道从事有机耕种的农民，因为大规模的选种和育种，就玩弄了自然的秩序吗？简言之，如果他的菜单变为现实的话，今天的素食主义者有任何的理由拒绝和马克斯共享一个餐桌吗？

思考链接：

26. 疼痛的残余
57. 吃掉家猫提德斯
72. 解放鹦鹉波西
91. 无人受损，就可为恶

6

幸运之轮

麦格不是一个数学家，但她知道她已经发现了一个极其简单的规律，可以通过玩轮盘赌博游戏来发财。

她观察赌场的转轮好几天了。在这段时间里，她注意到当球落到只是黑色或只是红色的槽里时，会令人吃惊地显示出一种旋转次序。但五个颜色相同的球排成一排并不常见，而六个球一排的情况一天只出现一两次。

这就是她的规律。球落到同种颜色的槽里六个排成一排的概率极小。因此，她就在一旁观看，一旦球落到红色的槽里，五个排成一排，她就下注下一个球会落到黑槽里。她肯定能把输掉的钱都赚回来，因为六个一排的情况实在是太少了。麦格十分自信，她已经开始盘算如何花掉这些钱了。



麦格的错误警告我们思想实验所具有的局限性。如果她的规律看上去很简单，那是因为她已经实验过，并且每次它都管用。在

她的脑子里，事实就是这样。如果通过想象在假设的情景中会发生什么样的事，赌徒是如此容易地被误导，那么一个哲学家也难逃此运。

然而，她的错误是一种推理错误，而不是由现实世界和思想世界不相吻合的失败造成的。她错就错在把球落在同种颜色的槽里六个一排的概率与假定它已经落下五次排成一排后球会落在同种颜色的槽里的概率搞混了。

例如，设想一个简单的运气游戏，人们竞猜一枚硬币的投掷。第一轮有 64 个人，第二轮有 32 个人，第三轮有 16 个人，依次下去直到最后只有 2 个人。在游戏开始时，任何一个人要赢的概率是 1/64。但是到最后一轮的时候，剩下的 2 个人赢的概率都是 50%。但依照麦格的逻辑，第一轮的概率是一定的，并且到最后一轮的时候剩下 2 个人胜出的概率仍然是 1/64。当然，这就意味着 2 个人中每人只有 1/32 的机会获胜！

回到旋转轮盘的游戏上来，的确球会落到同种颜色的槽里六次一排的情况不太可能，就像 64 人中的某一个人一定会在投币游戏中胜出一样不太可能。但是一旦球落到同种颜色的槽里五次之后，最初六次一排的概率则变得不相关了：因为接下来轮盘的旋转使球落到要么红色要么黑色的槽里的概率只比 50/50 少一点（还有两个绿色的槽）。

问题的关键在于过去发生的事情的概率不会影响到将要发生的事情的概率。麦格应该看到这一点。她要是观察五个同种颜色的球增加为六个同种颜色的球的频率，她会发现这个几率事实上只比 50/50 低一点。所以，她的错误还不只是失败的推理，她还错误地想象了可以由其观察而否定的事情。不管在脑子里，还是在

实践中，她都是一个糟糕的实验者。

思考链接：

3. 印度人与冰
16. 比赛中的龟
42. 拿了钱就跑
94. 连锁推理悖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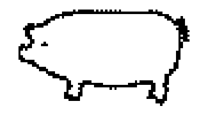
7

没有赢家

士兵萨克斯将要做一件很坏的事。他被下令先强奸再杀死一个囚犯。而据他所知，这个囚犯不过是个无辜的平民，因其不当的种族背景被抓来的。毫无疑问，他知道这将是一起极不正义的战争罪行。

但想了想之后，他很快发现他没有选择而只能这么做。如果他遵守命令，他可以尽可能地让受害者不必承受更多不必要的折磨。而如果他违背命令，他自己将被处决，而这个囚犯还是会被侵犯最后被杀，可能更残忍。所以，他继续做下去对每个人来说都要好一些。

他的推理看上去十分清晰，但显然他心里并不宁静。在这种环境下他做出了最好的选择，但为何这还是十分严重的错误呢？



“如果我不这样做，别的人也会”是对错误行为的一种通常的无力辩解。不管别的人是否会这样做，你都应该对自己的错误行

为负责。如果你看到一辆顶盖打开的跑车，钥匙就插在打火处，你跳进去把车开走，你的行为并不会阻止这辆车被偷，因为别的人也会这么做，这只是个时间问题。

在萨克斯的例子中，证明过程稍微有点不同，这一点因而很重要。因为他说的是，“如果我不这样做，其他人也会，而且结果会更糟。”萨克斯不仅是不想让坏的事情发生，而且他还试图让可能最好的——或者最小程度坏的——事情发生。

一般而言，尽你所能地把伤害降到最低看上去在道德上是十分完美的了。萨克斯最多能做到保存自己的性命，并让那名囚犯死的时候痛苦少一点。但是这个推理却要他参与强奸和谋杀，而显然这不可能是道德上正确的事情。

想象一下有没有别的可能性？这种诱惑很难让人拒绝，也许只用射杀那名囚犯和他自己。但我们只能拒绝这种可能性，因为我们必须控制一个思想实验的可变条件，而在这个实验里他只有两种选择，执行命令或者拒绝指示。如此设定困局的意图在于迫使我们直面这个道德困境，而不要想绕过它。

可能有人会说有时我们不可能做正确的事。不管你是做还是不做，不道德都不可避免。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应该寻找最小程度坏的选择。这么想的话，我们就可以说萨克斯做到了他能做到的最好，那么我们又怎能因为他所做的而责怪他或惩罚他呢？而如果他不该受到谴责或惩罚，显然他并没有做错嘛！

因此，可能的答案是这个行为是错的，但采取这种行为的人不该受到谴责。他所做的是错的，但他这么做却没有错。这就是其中的逻辑。但这是反映了世界的复杂呢，还是一种高明的歪曲，为不正义之事而辩护呢？

换言之，结果并不能证明手段的正当。萨克斯应该拒绝执行命令。他会死去而囚犯遭受的痛苦可能更多，但这是对他而言唯一道德的选择。这样才能保护萨克斯道德的完整性，可这与保存生命、减少痛苦相比是一个更高尚的目标吗？

思考链接：

44. 至死才分离
55. 可持续发展
82. 搭便车者
91. 无人受损，就可为恶

8

善良的上帝

上帝对哲学家说，“我是上帝是神，我是所有善的源泉。可为什么那些世俗哲学家却不理睬我呢？”

哲学家对上帝说，“回答之前我必须问您一些问题。您命令我们做善的事情。但是，是因为您的命令它才是善的呢，还是因为它是善的所以您让我们做它呢？”

“嗯，”上帝说，“它是善的，因为我叫你们这么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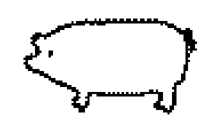
“尊敬的上帝，这显然是个错误的答案！如果仅仅因为您这么说一件事就是善的，那么要是您愿意，折磨婴儿也可以是善的。但那会很荒谬，对吧？”

“当然啦，”上帝回答道，“这是我对你的考验，而你让我很满意。那么另一个选择是什么呢？”

“您选择善的事情，因为它是善的。但这很明显说明善并不取决于您。所以我们无需通过学习上帝来学习善。”

“即使这样，”上帝为难地说，“你也不得不承认我在这个问题上已经树立了很多典范了……”

资料来源：柏拉图（公元前380年），《欧绪弗洛篇》。



当我还在上学的时候，我们时常唱一首赞美诗，里面写到，上帝等同于所有美德。我们唱道：上帝是爱，上帝是善，上帝是真理，上帝是美。难怪合唱最后以“赞美他！”来结尾。

但上帝是善的观念是模糊不清的。它可以说上帝是善的，就像蛋糕是善的，爱人是善的。在这些例子中，“是”相当于把某种属性归之于某物，如善的或蓝色的。但“上帝是善的”也可以等同于像“水是 H_2O”或“柏拉图是《理想国》的作者”这样的句子。在此，“是”说明的是两个术语之间的关系：一个等同于另一个。

在赞美诗中，“是”看上去表达的是一种等同关系，而不是一种属性。上帝不是慈爱的而就是爱；不是美的而就是美。他不仅拥有这些美好的品质，而且就是它们。因此“上帝是善的”暗示着上帝的观念与善的观念是不可分割的，而善的本质就是上帝。

如果是这样的，那么许多人认为没有上帝就没有道德也就不奇怪了。如果善与上帝不能分离，那么世俗道德不过是个自相矛盾的语词。

然而，在我们假想的对话中情况却表明不是这样。如果上帝是善的，那不过是因为上帝是并选择了已经是善的事物。上帝不能仅因其选择而使什么变为善的，相反，他选择某事物因为它（原本就）是善的。

有人可能会抗议说这个论证只有在假设不能分离的东西分离的情况下才有效。如果上帝确实是善，那么设想一个善与上帝相

分离的困境就没有什么意义。但既然这种分离——因为上帝的命令某事才是善的，或者因某事是善的上帝才命令做它——是说得通的，这个反对只不过是回避了问题的实质。

即使上帝与善的确是同一的，询问是什么使得这个等同成为真的也是合理的。答案显然是我们知道什么是善，正因如此我们才能说上帝是善的。如果上帝提倡无意义的折磨，我们肯定知道他不是善的。这就说明我们可以理解独立于上帝的善之性质。它也表明一种无神论的道德不是一个矛盾。

思考链接：

17. 选择拷打

57. 吃掉家猫提德斯

58. 神的旨意

95. 恶的问题

9

老大哥

在系列节目《老大哥》*的第73期，制片人引进了一个邪恶的新工具：皮埃尔。节目的顾问心理专家解释了它的作用。

“正如你所知，大脑是思想与行动的引擎。而它完全是物理的。我们对物理学法则的理解已经达到了这样的程度：我们现在可以准确地预测人们的大脑如何对环境中的事件做出反应，从而知道他们如何思考。

“一旦进入‘老大哥’空间站，一个大脑扫描仪就能记录下所有参与者的大脑活动状态。我们的超级计算机，皮埃尔，将监控所有竞赛者暴露出来的各种各样的脑刺激，然后就能预测他们将来的行为会怎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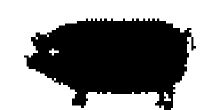
“当然，这一切十分复杂以至于存在着严重的缺陷。这也是为什么科技在一个受控的、封闭的环境像‘老大

---

* 《老大哥》是英国十分火爆的电视真人秀节目。该节目最早于1999年9月在荷兰电视台首次亮相，随后有19个国家出现了《老大哥》的克隆版。——译者注

哥'这样的空间站中运行得最好，也因为如此我们只能预测马上会发生的事情，因为预测中的小错误很快就会变成很大的误差。但是观众看到计算机预测竞赛者将如何反应会觉得很享受。在某种意义上说，我们比他们本人更清楚他们在想什么。"

资料来源：皮埃尔·西蒙·拉普拉斯(1749—1827)，《法国数学家的决定论论题》。



法国数学家皮埃尔·拉普拉斯提出，如果我们知道了物理法则和每一个粒子在宇宙中的位置，我们就能够预测未来每一件事物的出现。量子理论则表明这是错误的，因为并非所有的因果过程都严格地由先前的条件决定。宇宙中的不确定性比拉普拉斯想象的要多得多。

尽管如此，量子只在最小的微观层面上起作用，而世界上绝大多数物体似乎的确严格地由其先前的原因决定，正如拉普拉斯所想。因此，我们就可能采取有别于拉普拉斯的全面的观察者(all-seeing)那样完全的立场，而进行一些更为适度的预测。简言之，"老大哥"计算机仍然是一个理论上的可能性。

也许看到这个节目的走向完全落入皮埃尔的预测会让人感到不安。一台计算机仅凭人们大脑的物理状态和周围的环境就能一次又一次地预测人们的行为。竞赛者所做的决定是计算机通过计算知道他们一定会做出的。简言之，他们看上去不是可以做出自

主选择的自由行动者，而像受控的机器。

我们应该怎样回应这种情形呢？一种办法是否定其可能性。人有自由意志，因此没有计算机能做我们想象皮埃尔所做的事。然而，这种回答像是简单拒绝接受我们不喜欢的东西的一个例子。我们要知道的是为什么皮埃尔是不可能的，而不仅仅是被告知它就是不可能。

诉诸量子理论也行不通。尽管量子理论的确为我们的思想实验引进了不确定性，它所能做的全部也就是用一个包含了不可预测的、随机因素的过程替代那个完全可预测的因果过程。而我们的行为作为随机过程的结果与作为严格决定论的结果相比，并不享有更多的自由。自由意志要求的是我们完全摆脱物理因果链条的控制，而这看上去像是我们无法做到的事。

第二种回应是接受皮埃尔的可能性，但是论证自由意志在某种重要的意义上并未受到威胁。一种可能的路径是在可预测概念与自由概念之间划一道界限。例如，我们经常可以预测我们的朋友会点什么食物或饮料，但我们并不因此认为他们的选择不是自由的。如果这是真的，那我们有什么理由认为可以预测一个人的所有行为就代表他不是自由的呢？

可这样就能挽救自由意志了吗？如果不能不顾之前发生的事情而做选择，自由又是什么呢？

思考链接：

36. 先发制人的正义
39. 中国式话亭
64. 扼杀于摇篮之中
92. 自治政府

1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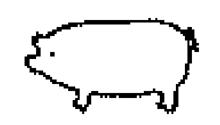
无知之幕

选取到火星殖民地上生活的20个平民被分派了一项不寻常的任务。在这个红色的星球上将有许多善物，包括住所、食物、饮料和奢侈品。离开之前，他们必须要做出决定，以什么样的根据来分配这些善物。而要命的是他们不知道在火星殖民地上什么样的技能是最重要的。所有的工作都可能是体力活，或者都不是。这项任务也许需要很高的智力，也可能更适合那些精神需求较低的人。

最初的建议是每样东西都应该得到平等地分享：从每个人的能力到每个人的需要。但马上就有人提出了反对。如果有很多工作要做，而有人不做他该做的那份，那么平分蛋糕不就不公平吗？显然分配机制中需要有激励因素嘛！

反对意见被大家接受了，但这只不过带来了更多的麻烦。公平看来并不是给每个人相同的份额。那么，公平究竟意味着什么呢？

资料来源：约翰·罗尔斯，《正义论》，第三章，哈佛大学出版社，1971年。



在政治哲学家约翰·罗尔斯看来，尽管火星殖民者们尚不清楚什么是公平，但他们处于可以发现公平原则的一个理想环境中。因为他们在决定正确的分配方式时处于一个“无知之幕”的背后，没有人知道要应付殖民地上的生活有多难。这就意味着我们可以相信他们的决定将是完全公正的。举例来说，既然没有人知道在火星上智力劳动还是体力劳动更有价值，殖民者们就不会把赌注下在给予其中任何一种更多酬劳的分配体系上。他们会相同地对待这两种不同的技能，这看上去的确十分公平。

罗尔斯认为，如果我们合理地操作这种程序，我们就能得到一个保证最劣势群体得到最大可能好处的体系。因为我们不知道我们是否将会成为这个社会的底层。因此我们将谨慎地保证，如果我们是那些不幸者，我们仍然能够得到尽可能多的份额。所有这一切都导向了自由社会民主的一种传统形式，它承认由运气导致的不同，只是这个结果不能让最不幸者来承担。

不过，这就是公平或合理的吗？当有人认为让最无能的人自生自灭没什么不公平的时候，我们要怎么回应呢？或者有人认为与其玩得无惊无险，投票给一个保护失败者的社会，还不如赌一把成为生活的胜者来得更合理呢？如果我们把在这个社会中将会发生在我们身上的事作为我们的指导原则，而不是只考虑什么是公平的与正义的，我们是否已经不公了呢？

罗尔斯的追随者们相信，无知之幕是决定一个公平社会是什

么样子的最佳选择。批评者们则认为不可能有这样的事:即使我们走到幕后,我们也不过是根据现存的政治观点与偏见做出相应的选择。因此,看来,它要么是政治哲学史上最有用的思想实验,要么是最无用的。

思考链接:

22. 救生艇
29. 生命依赖
87. 公平的不平等
100. 雀巢咖啡馆

11

特修斯船

雷·诺斯还没谈过这样的买卖。作为一名国际犯罪高手,他对自己的业绩洋洋自得。但他最近的顾客要他去偷著名的特修斯游艇,这艘船曾是英国报业巨头卢卡斯·格拉布的葬身之地,也是最近在洛杉矶发生的谋杀冰茶之父的凶案现场。

可是,当他来到了刚刚修缮完毕的船所停放的干船坞时,却发现了两艘看上去一模一样的船。雷的帮手用枪挟持了一名保安。

雷问道:"如果你想活命的话,最好告诉我哪一艘才是真的特修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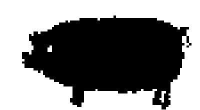
"这得看你怎么看,"保安紧张地说,"你瞧,当我们开始修船的时候,我们需要替换很多部件。可我们保留了所有老部件。但是随着工程的进行,我们几乎替换了所有的东西。工程结束后,有人提议说用这些老部件为这艘船重造一个版本。所以我们又重造了一艘。现在,左边这艘是用新部件修复的,右边这艘是用老部件重造的。"

"那哪一艘才是真正的特修斯呢?"雷不耐烦地问道。

他的帮手随即上紧了枪膛,保安尖叫道,"我已经把

我知道的全告诉你啦!”雷挠了挠脑袋,开始想办法怎样才能把这两艘船都弄走……

资料来源:托马斯·霍布斯,《利维坦》,1651年。



哲学会思考一些事实齐备却仍然没有答案的问题。在这个情景中,雷知道这两艘船的所有相关事实。但是关于他的问题的答案仍然像个谜。

对有些人来说,哪艘才是真的特修斯是显而易见的。但他们的答案是什么取决于你怎样讲这个故事。如果雷是一个侦探,他在寻找卢卡斯·格拉布和冰茶之父的死因的可用于法庭的证据,那么很显然他会把重造那艘船当作真正的特修斯。如果他喜欢收集具有历史意义的物件,他也可能会得出相同的结论。

但是,如果存在所有权的争议,那么被修复的那艘船将被算作是原来的那艘。因为那艘才是物主授权远航的船只。而如果你在干船坞放上一台照相机追踪拍摄工程进展的话,你看到的将是那艘一只在被修补的船只,而那只重造的船是稍后才出现在它旁边的。因此,被修复的那艘船拥有存在的持续性,而重造的那艘船则没有这样的持存。

你可能因此会认为哪艘才是“真的”特修斯这个问题没有唯一的答案。它取决于这艘船相对于你的利益何在。但这个回答会引起令人不安的后果。如果不是特修斯而是人呢?随着我们生命的成长,我们身体内的细胞不断地死去又不断地更新。我们的思想

同样在变，我们 10 岁时所想的到 20 岁时已经所剩无几，这些思想、记忆、信念与性情随着我们的成长不断被取代。那么，我们因此就能说，对我们是不是和多年前同一个人这个问题没有正确的答案？答案取决于我们对自身的利益何在？如果特修斯的同一性不是一个事实问题，那么有可能存在这样的事实吗，也即，包括人在内的随着时间逐渐改变的任何事物的同一性问题？

思考链接：

2. 光纤传送
46. 阿米巴人
65. 灵魂转世不变
74. 到处都有水吗

12

海滩上的毕加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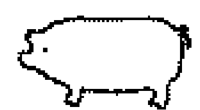
罗伊从悬崖边上往下看，看到一个人在沙滩上画画。接下来出现的图景让他吃了一惊。这不是一张寻常的脸，他看上去有些不真实，但却可以同时看到其不同的角度。事实上，他极像是毕加索。

想到这里，罗伊的心停止了跳动。他把望远镜举到眼前，又使劲地揉了揉眼。沙滩上这个人的确就是毕加索。

罗伊的脉搏开始加速跳动。他每天都走这条路线，并且他知道，潮水马上就会冲上来把这幅毕加索的真迹冲走。不管怎么样，他都要试着去保存这幅画。但怎么做呢？

想要阻止海水是徒劳无功的。也没有任何办法把这一块沙地留住，就算有办法时间也不够了。也许他可以跑回家把他的照相机拿来。但这只是保留这幅作品的记录的最好办法，而不是保留作品本身。并且就算他这么做，等他回来的时候画面可能已经让海水给冲走了。也许他应该尽可能长时间地欣赏这幅私人作品。不过当他站在那里看的时候，他真不知道是该笑还是该哭。

资料来源：雷·布拉德伯里，“在一个气候温和的季节里”，重印于《治疗忧郁的良药》，艾文出版社，1981年。



对于一幅不能持存的艺术作品，很难一概而论地说它很可惜。这完全取决于这种艺术采取的是哪种表达形式。认为一台演出应该像一尊雕塑那样永久地存在是荒谬的。当然，我们可以把这台演出拍下来，或者保留它的剧本。但是这些方法都不能使作品本身在时间中凝固下来，如果你经历过一场印象深刻的演出或音乐会之后在电影里重温了它，你就能明白这种感觉。

而说到雕塑与绘画，它们的保存看上去可以称乎完美。但演出与造型艺术之间的差别又有多大呢？毕加索虚构的沙滩素描毫无疑问模糊了两者之间的界限。这个特别选择的媒介（沙滩）意味着原本可以持存的作品变成了一场短暂的演出。

意识到两者之间没有那么分明的界限促使我们重新思考对待保存与重建的态度。一般说来，我们认为保存和恢复绘画让它们看起来崭新如初是有价值的。但也许我们应该把艺术作品缓慢的毁坏看作是它们自身演出的一个重要部分。

显然，很多艺术家在创作作品的时候就考虑到了他们的作品会老化。例如，法兰克·盖瑞就清楚地知道他的建筑学杰作（西班牙毕尔包的古根海姆博物馆）外部的钛暴露在空气中会产生怎样的影响。同样地，更早的大师们对于颜料的老化也不可能一无所知。

也许我们可以走得更远一些，承认这种保存的欲望是对我们自身必朽的一种否认。艺术比人存在的时间更长，这让一些人试图通过艺术来获得一种象征的不朽。（尽管伍迪·艾伦明确地宣称他不想通过艺术来获得不朽，而希望不死从而不朽。）如果我们接受艺术也是必朽的，那么就没什么是永恒的了。也许在艺术与生活的价值被发现的地方我们能看得更清楚一点，而这种价值就是经历本身。

思考链接：

37. 自然艺术家
48. 邪恶的天才
66. 赝品
86. 为艺术而艺术

13

到处都是黑白红

玛丽知道有关红色的一切知识。作为一名科学家，这是她终生的工作。如果你想知道为什么我们看不到红外线，为什么西红柿是红色的，或者为什么红色代表着激情，玛丽就是你要找的人。

如果玛丽不是一个色盲患者，那么这一切也没什么大不了的。可玛丽根本就没有色视觉。对她来说，世界就像一场黑白电影。

然而，如今，这一切都将得到改变。她视网膜上的圆锥细胞本身并没有缺陷，只是视觉信号不能得到大脑的处理。现在，神经外科的发展意味着这个难题将得到解决。很快玛丽就能第一次看到色彩斑斓的世界了。

所以尽管她有广博的知识，但也许她根本不知道有关红色的一切。这是留待她去发现的一件事：红色看上去到底是什么样的。

资料来源：法兰克·杰克逊，“玛丽所不知道的”，重新发表于大卫·罗森塔尔主编的《心的性质》，牛津出版社，1991年。



大多数受过教育的人都没有时间来考虑这样的问题：心与身是同时并存的两个不同的东西。认为我们非物质的灵魂寄居于动物的躯体中，就像是一架机器的幽灵，这种观点看来是过时的、不合理的和反科学的。

不过，仅仅拒绝了一种错误的世界观，不能保证剩下的那个就是正确的。如果你排除了身心二元论，拿什么来取代它呢？可能的候选项是物理主义：它认为只有一种实在，即物理实在。所有的东西，包括人的心灵，都是由它构成的。当然，这种物理实在将转化为能量，而不是像撞球那样的亚原子，但不管怎么说，椅子是由什么构成的，其他东西也是由什么构成的。

世界也许就是如此。但物理主义者走得太远了。即使只有一类“实在”，也不必然意味着只能用物理术语的形式来理解语词。

这就是玛丽这个例子想要说明的。作为一名科学家，玛丽知道有关红的一切物理术语。但有一件事是她不知道的：红是什么样子的。没有什么对世界的科学描述能给她这样的知识。科学是客观的、实验性的和定量的；而感觉经验，事实上所有的心理体验，都是主观的、经验性的和定性的。这个例子看来想要说的是，不管我们对这个世界的物理描述多么完备，它都不能捕捉我们心里所想的。就像哲学家们所说的，心理的不能划归为物理的。

这对物理主义提出了一个挑战。一方面认为世界除了物理实在就没有别的东西，另一方面又认为心理事件不能用物理术语加以解释，这两者如何同时为真呢？这不是刚跳出身心二元论的陷阱又落入物理主义的火坑吗？

让我们设想玛丽本人就是个物理主义者。她会说什么呢？也许她会首先指出实在与表象之间的差别：事物的所是与它们的显现之间是不同的。科学考虑的是前者而不是后者，因为知识总是有关事物本身的，而非仅仅是它们看来如何。玛丽知道有关红是什么的一切知识，她只是不“知道”红是如何对大多数人显现的。当然，她的确知道对她而言红是怎样的，那是一种特别的灰色阴影。

所以当玛丽第一次看到色彩时，世界以一种全新的方式向她展现了。但能说她知道了什么新的知识吗？可能更自然的说法是她现在知道了红是什么样子的。但有时我们日常的谈话方式会误导我们进入那个本该由一个哲学家留意的微妙区别。

思考链接：

21. 埃皮芬之地
41. 获取蓝色
59. 眼见为实
73. 做一只蝙蝠

14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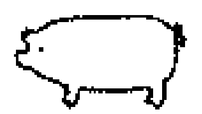
让你受益的银行错误

当理查德来到 ATM 机前时，他大吃一惊。他想要提取 100 美元并获得一张收据，可他却从 ATM 机里拿到了 1000 美元现金和一张 100 美元的收据。

回到家后，他上网查询了自己的账户，的确，他的户头只被减去了 100 美元。他把钱放在了一个安全的地方，满以为银行马上就会发现这个错误，并向他索取还款。可几个星期过去了，还是没人来找他。

两个月后，理查德断定没有人会来要钱了，所以他把钱用作预付订金交给了宝马经销商。

然而，与此同时，他却时不时有一种负罪感。这是偷盗吗？很快他就说服自己这不是偷盗。他并没有深思熟虑刻意要拿这笔钱，这笔钱是自己送到他跟前的。而且他也不是从其他什么人那里拿的钱，没有谁的钱被盗。对于银行来说，这不过是大海里的一滴水，并且不管怎么说，他们本应该防止这种可能性发生的。因此损失了钱是他们的失误，他们本该有更安全的系统。所以，这不是偷盗。这只不过是他有史以来撞到的最大一笔财运。



我不知道有谁遇到这种事的时候会把钱退还给银行，因为这钱的确不是他们的。然而，在实际生活中，我们可能期望一个诚实的人这么做。但是有多少人会这么做呢？我猜，不会很多。

并非人们普遍的不道德。的确，我们需要在这类例子中做仔细的甄别。例如，如果是一家小的、独立的商店偶尔多找了钱，而不是一家大公司的类似错误，人们可能更愿意指出这个错误。这条原则看上去说的是：不应该从一个同伴的人的错误中占便宜，而从大公司那里占便宜则是公平的游戏。这可能部分是由于我们觉得没有人因为一个公司的错误而受到伤害，并且相较于我们得到的好处这点损失对他们来说根本就不算什么。因此，以一种奇怪的方式，我们拿这笔钱的意愿部分地由一种特别的正义感所推动。

但即使我们得出结论说这是一种正当的窃取，它也还是窃取啊。在此，作为一次事故的后果，以及我们没有偷盗的意图，这个事实是不相关的。例如，想象你错拿了别人放在行李寄存处的袋子，随后发现袋子里的东西比你自己的要值钱，如果你不设法把袋子还回去，先前这个时间的偶然性质是不能证明之后你刻意不还袋子这个行为是正当的。类似地，如果有人拿走了你没留意的值钱的东西，你自然会很气恼，责怪自己不够小心。

理查德认为银行自然能承担这笔损失，也是很虚伪的。因为如果这能为他的行为辩护的话，也同样能证明从商店里顺手牵羊的正当性。商店也同样投保了，而且一起小的偷盗不会怎么影响

它们的赢利。

理查德如此轻易地被自己给出的论证说服的原因在于，像我们所有人一样，他倾向于思考中对自己有利的偏见。那些为自己利益辩护的理由看起来总比那些不为自己利益说话的理由更有说服力。人们很难去除这种偏见而公正地思考。毕竟，谁愿意那样做呢？

思考链接：

7. 没有赢家
82. 搭便车者
83. 黄金法则
91. 无人受损，就可为恶

15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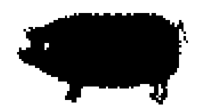
平凡的英雄主义

士兵肯尼没有因其勇敢而获得维多利亚十字勋章，这件事让他的家人大吃一惊。毕竟，他用自己的身体挡住了一颗手榴弹，用一人的牺牲挽救了十几个甚至更多的战友。如果这不是“在敌人面前的英勇行为”，那么怎样的行为才是呢？

他的家人向他所在的团要求一个解释。军队的声明是这样说的：“过去我们对这样的行为是给予合适的勋章作为嘉奖的，然而，我们已经决定认为这样的行为表现出超过对其职责的热爱是一种错误。所有的军队人员都应该随时随刻为整个军队的利益而作战。如果认为肯尼的行为超出了其职责的要求，那么，有时士兵不为整体利益而付出就成为可以接受的了。这显然是荒谬的。所以，我们不再为这类行为追加奖励。尽管我们理解这对家人来说是一段痛苦的时光，我们也只能说士兵肯尼已经死于爆炸了，并且这并不是所谓的他为了挽救战友而牺牲了自己的生命。”

在这份冰冷的声明中，很难挑出其逻辑上的毛病。但在肯尼的家人心里，他们并没有被说服。肯尼的行为

不是英雄主义，还是什么呢？可怎么证明呢？



士兵肯尼的故事是哲学家们所说的额外行为的一个例子。额外行为指的是有人做了超出其道德要求的好的事情。例如，道德要求你把溺水儿童从池塘中拖出来，这对你来说并不困难，但是如果要你跳入波涛汹涌的大海，冒着生命危险去救人，这就超出了道德的要求了。换言之，做出了额外行为会受到赞许，而不做的话也不会遭到谴责。

在我们应该做的事情与额外行为之间应该做出一个区分。如果不考虑这种区分，那么对任何道德理论来说它都构成了一个问题。比如功利主义认为道德上正确的行为是能够使最大多数人受益的行为。如果这是真的，那么只要我们没能使最大多数人受益，我们就没有做出道德上正确的行为，即使我们的行为可能需要更大的个人牺牲。例如，可以论证说，当每小时成千上万的人死于贫困的时候，以一种尚可的现代西方的生活方式生活，就没有达到道德的要求，因为我们可以挽救他们的生命而我们却选择不这样做。更有甚者，相对而言，帮助穷人并不需要我们做出极大的牺牲，因为我们只需要放弃一些舒适，而它们不过是些奢侈品。

然而，当有人用他的整个生命来帮助穷人的时候，我们通常会认为他们超越了道德责任的呼唤，他们不仅仅做了道德所要求的。当然，我们这么想是因为这让我们脱离了困境。毕竟，如果道德要求我们做同样的事情，那么我们在道德上就失败了。同样，任何一

个没有像肯尼那样做的士兵，其行为都是不道德的。肯尼只是做了任何一个体面的人在这种场合应该做的事情：并不更多或更少。

也许考虑这种行为是额外的英雄主义行为或只是道德要求的行为是一项纯粹的智力活动。事实仍然是，作为人类我们都清楚一些行为需要付出超出一般的努力。不管这些人所做的是否超出了道德的要求，或我们中的大多数人是否在道德上是失败的，都不会改变这一点。

思考链接：

29. 生命依赖

53. 双重烦恼

71. 不能切断的维生设备

89. 杀少数人，还是让更多人死

16

比赛中的龟

欢迎来到伟大的雅典观看人龟赛跑。我的名字叫芝诺*，我将是这场伟大角逐的评论员。但我不得不说的是，这场比赛的结果是预料中的事。阿基里斯犯了一个严重的错误，就是让乌龟塔昆领先100码。让我解释一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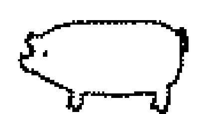
塔昆的策略是保持不停地移动，尽管速度很慢。如果阿基里斯想要超过塔昆，那么首先他要到达比赛开始时塔昆所在的位置。这需要花掉他几秒钟。在此期间，塔昆继续向前移动，又会领先阿基里斯一小段距离。现在如果阿基里斯想要超过塔昆，他又需要到达塔昆已经到达的地方。但在阿基里斯这么做的时候，塔昆又往前移动了一些。因此，为了超过它，阿基里斯又一次需要赶到塔昆现在所在的地方，而塔昆又往前走了。如此等等。你看到这种情景了吧？所以阿基里斯要想超过乌龟，在逻辑上和数学上是不可能的。

---

* 芝诺生活在古代希腊的埃利亚城邦，是有名的数学家与哲学家。他从运动的假设出发，一共推出了40个各不相同的悖论。现存的关于运动的4个悖论尤为著名。作者在此将评论员取名为芝诺是有用意的。——译者注

不过，现在你想把赌注下在乌龟身上太晚啦，因为他们已经站在起跑线上啦，哦，他们出发了！阿基里斯逼近乌龟了，近了，近了……阿基里斯超过了乌龟！简直难以置信！这是不可能的！

资料来源：芝诺（生于公元前 488 年），阿基里斯与乌龟的古老悖论。



芝诺对阿基里斯不能超过乌龟的解释是一个悖论，因为它引导我们走向这个结论：两件矛盾的事情可以同时为真。他的论证表明阿基里斯不可能超过乌龟，而实际经验却告诉我们他可以。但看上去这个论证没有错，而经验告诉我们的也不可能错。

有人认为他们能找出这个论证的毛病。只要你假设时间与空间是连续的整体，并且可以被分成更小的无限多块，那么就可以反驳这个论证。因为这个论证依赖于这个观念：不管这个空间跨度有多小，乌龟总已经往前移动了一点距离，而不管阿基里斯有多迅速，他要超过乌龟总需要一定时间，不管这个时间有多短。也许这个假设是错误的。最终你将到达时空中的一点，这一点不能被分得更小。

然而，这种反驳本身又制造出另一些悖论。这种观点的问题在于它声称最小的空间单位没有广延（长度、高度或宽度），因为如果它有广延，那么就可以再细分，我们又会回到赛跑的悖论。可是，明明有广延的空间又怎么可能由没有广延的空间单

位组成呢？时间的问题也是同样。如果最小的时间单位没有延续，从而不能被进一步细分，那么时间作为一个整体又怎么可能有延续呢？

所以现在我们得到关于悖论的一个悖论：两个悖论，看上去都是真的，但如果同时为真，只会让两种可能性都变得不可能。晕了吧？别担心，这是正常的。

没有简单的出路。解决方案需要相当复杂的数学。这也许就是人龟赛跑这个悖论想要说的：用基本的逻辑建立理论并不是把握宇宙本性的可靠向导。但逻辑本身是让人清醒的必要手段，我们始终依赖于基本的逻辑去发现论证中的矛盾和错误。并不是逻辑自身有问题：对这类悖论更为复杂的解决方式依赖于坚定地坚持逻辑法则。困难在于如何应用它。

思考链接：

6. 幸运之轮
42. 拿了钱就跑
70. 突击检查悖论
94. 连锁推理悖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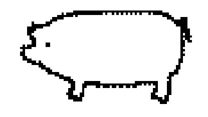
17

选择拷打

哈迪的俘虏看上去非常坚决，但哈迪相信自己可以撬开他的嘴，只要哈迪继续威胁他。这位父亲，布拉德，是个真正的坏蛋。他安放了一颗据称可以炸死成千上万平民的超级炸弹。只有他知道这颗炸弹在哪儿，但他就是不说。

他的儿子韦斯利，与此事无关。但哈迪的智力告诉他，尽管布拉德不会在拷打下张口，但如果他看到自己的儿子在他面前被拷打，他一定会说的。就算不会马上说，也很快会屈服的。

哈迪饱受煎熬。他一向反对折磨犯人，以往犯人被拷打的时候他总会离开那个房间。而韦斯利的无辜尽管不是唯一让他疑虑的地方，也足以加剧他的烦恼。但他知道这是唯一可以把成千上万的人从死亡和毁伤中挽救出来的办法。如果他不下令拷打，那他不是把许多人送上死刑台了吗，仅仅由于他的过分拘谨和缺乏道德勇气？



像这样的情景多年来一直被认为是纯粹虚构的。文明社会是不允许拷打犯人的。但随着打击"恐怖主义的战争"的到来，一切都改变了。伊拉克的阿布格莱布监狱曝出的虐囚丑闻尤其证实了这一点。问题不仅仅是是否发生了这样的事情，如果发生了，是谁下令的；而是它是否一定就是错的。

哈迪的困境不过是这种处境的一个简化版本，一个有道德感、责任感的人自然会陷入这种矛盾。在这种情况下支持拷打的人会说，尽管这很可怕，但是你没有选择，只能这么做。例如，你敢冒险拒绝拷问一个或几个人，让"9·11"再发生一次吗？这难道不是一种道德放任吗？你倒是因为不做这种脏手的事让自己干净了，可你却牺牲了无辜者的生命。并且，你要知道哈迪下令拷打的还是无辜的韦斯利，而在这个例子中拷打有罪的人我们的立场还要强一些。

但它对人权捍卫者来说还是构成了一个挑战，在他们看来，任何的拷打和折磨都是不可辩护的。为了捍卫他们的立场，他们可以采取如下两个策略中的一个。第一个策略是坚持拷打在原则上是错误的。即使它可以挽救上千人的生命，有些道德界限仍是不可跨越的。对此可以争辩一番，但这个立场表现出的无视生命的冷漠使它有些站不住脚。

另一个策略是论证尽管拷打有时在道德上是可以接受的，但为了保住道德底线，我们还是要绝对地禁止它。在实践上，如果有时拷打被允许，那将不可避免地走向这个疑问，什么时候它是不应该的？很有可能我们在应该选择拷打的时候没有拷打，却在错误的时候选择了拷打。

然而，这个论证帮不了哈迪。因为尽管有充足的理由采取不

拷打这个原则，哈迪仍然面对这种处境，即选择拷打的好处是显而易见的。他的困境不是拷打是否可允许，而是在这种情况下为了挽救无辜者的生命，他必须打破原则，做不允许的事。你也许有足够的理由认为他不应该这么做，但肯定他的选择是艰难的。

思考链接：

18. 理性的要求
50. 好的贿赂
57. 吃掉家猫提德斯
79. 发条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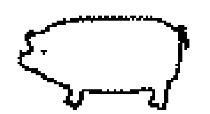
18

理性的要求

索非亚·迈克斯默斯总是以自己的理性而自豪。她从不违背理性的命令而行动。当然啦,她知道一些基本的行为动机是非理性的,比如,爱、品位和性格。但非理性的并不等同于不理性。在草莓与黑莓之间更偏爱草莓,这既不是理性的,也不是非理性的。不过,基于这种偏好,如果草莓同黑莓一样便宜,而选择购买了黑莓,就是非理性的。

然而,现在索非亚面临一个抉择。一位十分聪明的朋友劝说她,引发一颗将炸死许多无辜平民的炸弹,而没有任何的好处,诸如挽救其他人的生命,是完全理性的。她确定这位朋友的论证有不妥之处。但她的理性却看不到问题在哪儿。更糟的是,这个说理建议她尽快去投放炸弹,所以长时间的思考是不可行的。

过去她总以为因为预感和直觉而拒绝理性的说理是错误的。但如果她在这个例子中遵从了理性,她不禁感到自己在做一件可怕的错误的事情。她是应该选择一条不那么理性的道路呢,还是将理性置于情感之先而去投放炸弹呢?



这个思想实验因为缺乏细节可能会让人怀疑其有效性。我们并不知道这个残忍的理性论证是什么，以及为什么炸死无辜平民对它来说是好的。不过，这种含糊不是问题所在。我们从经验中知道人们会被合理的论证说服去做可怕的事情。例如，在斯大林时期的苏联和"文革"时期的中国，人们被说服公开谴责无辜的朋友是好事情。那些反对对广岛和长崎投放原子弹的人也会认可决策者的决定，因为他们的理性接受了基于紧迫性的理由。

但反对者也许提出，难道在这些例子中理性的论证就没有缺陷吗？如果我们可以看一看劝说索非亚的这个论证，那么我们一定能找出它的问题。但这假设了论证一定是有问题的。如果你相信理性要求的总是正确的，那么投放炸弹就是正确的（尽管看上去不是这样），这个论证就没有问题。因此，假设这个论证是错误的就已经把直觉式的信念置于理性的命令之上了。

无论如何，认为理性的总是好的，是过于乐观了。据说，精神病患者的问题不在于他们缺乏理性，而在于他们缺乏感情。18 世纪的苏格兰哲学家大卫·休谟就持这种观点。他写道，"理性是且应该是激情的奴隶"。如果理性可以和感情隔绝，我们就不应当认为理性总会将我们引向善。

即使这种观点太过悲观，或者你认为做邪恶的事情永远不可能是理性的，我们仍然面临这个问题，那就是我们不能确定我们是否已经足够理性。索非亚是很聪明的，但她又怎么知道理性是否

真的要求她去投放炸弹呢，或者她只是没能看出论证中的错误？相信理性的权威是一回事，相信人类总能够识别出这个权威的要求是什么又是另外一回事。

思考链接：

7. 没有赢家
44. 至死才分离
83. 黄金法则
91. 无人受损，就可为恶

19

揭穿谎言

古怪的威勒菲尔德派的成员在圣希达霍登过着一种隐居的生活。除了他们的领袖之外所有人都不允许与外界有任何的接触，他们被告知真实的世界就如同他们在肥皂剧（他们唯一可以收看的电视节目）里看到的那样。对威勒菲尔德人来说，《加冕街》、《英雄与美人》、《东部终结者》与《邻居》* 不是虚构的作品，而是反映日常生活的纪实片。而且，由于绝大多数成员都在这个社群里出生，这个谎言并不难维持。

然而，有一天，一向反叛的门徒肯尼斯决定离开霍登之家，去寻访他在电视上常常看到的那些地方。当然，这是严格禁止的。但肯尼斯想办法逃了出去。

他所看到的吓了他一跳。最让他震惊的是他来到加冕街的时候，竟发现它根本不在威勒菲尔德，而是格兰纳达摄影棚里的一套道具。

---

* 《加冕街》，英国热播电视剧，从 1960 年开播，已经播出 40 多年了。《英雄与美人》，美国电视剧，1987 年开播，播出多年，在美国及意大利等国广受欢迎。《东部终结者》，播出 20 多年的英国电视剧。《邻居》，热播的澳大利亚电视剧。——译者注

但是，当他偷偷返回霍登之家，告诉他的同伴他所发现的一切时，人们都认为他疯了。他们说，“你不应该离开的。外面不安全。你的脑袋捉弄了你！”他们把他驱逐出了社群并禁止他再次入内。

资料来源：柏拉图（公元前 360 年），《理想国》，洞喻。



威勒菲尔德人的故事显然是一个寓言。但这个寓言想要说的是什么呢？

对此可以有很多种不同的阐释方式。有人说由日常经验构成的世界不过是个幻影，我们只能借助于仙药或沉思才能打开通向真实世界的大门。声称通过这种方式看到真相的人通常被人们摒弃为失常的人或疯子。但他们认为我们才是将自己囚禁于感觉经验的有限世界里的傻瓜。

更平常的是，现实生活中的威勒菲尔德人从不质疑他们听到的，而只是简单地接受生活向他们展现的。他们也许并不认为肥皂剧中的一字一句都是真的，但他们的确毫不批判地接受了他们在报纸上和电视上得到的智慧。这个智慧到底是什么取决于他们是如何被社会化的。例如，有人认为相信美国总统应对恐怖主义感到内疚是不可理喻的。另一些人则认为相信他是个精明的人同样不可理喻。

这就提出了一个问题，圣希达霍登所对应的真实世界是什么。

一般来说，我们不会把自己隔绝在砖墙之内，但我们的确以许多微妙的方式把自己局限在经验范围之内。如果你只阅读一种报纸，你就严重地局限了你居住的思想空间。如果你只与和你有类似见解的人讨论政治，你就在你的小世界周围竖起另一道围墙。如果你从未尝试着站在别人的立场来看世界，更不用说顺着他们的思路往前走一段，你就又一次拒绝了在你为自己建造的那个小而舒适的世界里往外看的机会。

也许在这个故事里我们面对的最大困难是怎么看待肯尼斯。我们如何在那些有着疯狂世界观的傻瓜和那些真正发现了生活隐秘的人之间做出区分呢？我们不可能质疑每一个声称他发现了隐蔽真理的人。当然，由于这些断言是相互矛盾的，它们不可能全对。但如果我们一下子把它们全扔掉，我们就会面临天真而愚蠢的威勒菲尔德人那样的危险，接受一种幻象的生活，而非真实。

思考链接：

1. 邪恶的魔鬼
49. 部分之和的漏洞
51. 桶中之脑
61. 月亮是个奶酪饼

2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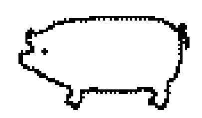
诅咒生命

维塔丽亚已经发现了永生的秘密。现在她发誓要毁掉它。

两百年前,一位叫马可罗普罗斯的医生给了她一个配制长生不老药的药方。年轻而愚蠢的她,配好了药水就把它喝了下去。可如今她诅咒自己对生命的贪婪。朋友、爱人和亲属都逐渐变老、死去,只剩下她孤零零的一个人。失去了死亡的等待以后,她失去了所有的动力和野心,她所做的一切事情都显得毫无意义。她变得无聊和疲惫,现在一心只盼着进坟墓去。

的确,想要消失的渴望已经成为过去半个世纪以来她唯一的生活目标。现在她终于找到了这种长生不老药的解药。几天前她服用了解药并感觉到自己迅速地衰弱。现在剩下唯一要做的是确保再没有人像她那样诅咒生命了。她把那张记有药方的纸扔进火里。当药方燃烧起来的时候,几十年来她第一次笑了。

资料来源:伯纳德·威廉斯,"马可罗普罗斯的案例",收录于《自我的问题》,剑桥大学出版社,1973年。



人们常说，人类生活的悲剧性就在于我们唯一确定在前方等待我们的是死亡。维塔丽亚的故事却颠覆了这个平凡的真理，并认为永生是一个诅咒。我们需要死亡来塑造我们的生活，给予生活以意义。没有了死亡，我们会发现生活毫无意义。照这种观点看来，如果地狱是永恒的诅咒，那么在地狱里永生足以使其成为一个惩罚人的好地方。

让人惊奇的是，认为永生值得向往的人极少考虑它意味着什么。这也可以理解。我们想要的不过是更多的生命。而如何度过这多出来的生命不是我们主要关注的。看来的确是，即使我们幸运地活个70年，生命还是不够长。还有太多的地方要看，太多的事情要去做，去经历。要是我们能有更多的时间就好了！

但也许我们应该缩减我们的人生计划，使它配合于我们的寿命预期。否则，不管我们活多少年，我们还是觉得时间不够。例如，想想"中年的青年人"这种现象。几代人以前，大多数人在他们20岁或更早的时候，就结婚生子了。而如今，人们的钱多了，他们认为自己可以活得更长了，可以晚点生孩子了，于是越来越多的人开始享受这多出来的青春期，一直到他们进入30岁。与以前的几代人相比，这些富足的中年、青年旅行和体验得更多了。但他们满足了吗？如果要说与之前有什么区别的话，那就是这一代人比前人抱怨得更多了。

不管我们拥有多少生命，它看来总是不够。但我们不用那么

贪婪，我们可以完全利用我们已有的时间。如果有无限多的时间，那“最大限度地利用”这个概念就变得无意义了。随着时间的流逝，就没有这样的东西可言了（最大限度地利用），因为时间是无限涌出的。而失去了充分利用我们生活的理由，存在不就变成一种沉闷的、无意义的负担了吗？

可能当我们说生命的短暂是个问题的时候，我们不过是在骗自己。既然我们不能改变生命的期限，任何源于其短暂的悲剧都不是我们的过错。更难承认的是我们应该对如何利用分配给我们的时间负责。可能我们不该再想“如果我有更多的时间就好了”，而应该想“如果我能更好地利用我已有的时间就好了”。

思考链接：

19. 揭穿谎言
52. 数量还是质量
69. 可怕的人生
97. 道德运气

21

埃皮芬之地

埃皮芬尼亚是一颗不寻常的行星。从外形上看它和地球很相似,但上面的居民却和地球人大不相同。

作为其中的一员,赫胥黎向来访的地球人迪克解释道,"很久以前埃皮芬人就发现他们的思想不能影响他们的行为。思想不过是身体运行产生的效果,而非其他。"这让迪克觉得匪夷所思。

"你不能相信这个,"迪克向赫胥黎抗议道,"例如,我们在这个酒吧里碰到了,你说,'伙计,我想干掉一瓶啤酒。'随后就点了一瓶。你能说你想要一瓶啤酒的念头对你的行为没有影响吗?"

"当然没影响啦,"赫胥黎回答道,似乎这个问题很白痴一样。"我们的想法的确在行动之先。但我们清楚地知道这些想法不会引起行动。我们的身体和大脑已经准备好要一瓶啤酒了。'我想干掉一瓶啤酒'的念头不过是在我的物理大脑和身体里发生的事情的一种结果。思想不会引起行动。"

"对埃皮芬人来说,也许是这样吧。"迪克无可奈何地说。

"我可看不出对地球人来说这有什么不同。"赫胥黎答道。迪克一时无话可说。

资料来源：尽管他没有使用"附带现象"（文中的埃皮芬现象）这个术语，这个术语还是应该归属于赫胥黎。他在1874年写的一篇有名的论文"论动物的自主性及其历史的假说"里提出了这一想法。这篇论文重新发表于《方法与结果：托马斯·赫胥黎论文集》，阿普尔顿发行公司，1898年。



美国哲学家杰瑞·佛多曾经说过如果附带现象论是真的，那么它将是世界的终结。附带现象论认为思想与其他的心理事件不能引起物理世界中的任何事件，包括我们的行为。相反，大脑和身体的运行就像某种纯粹的物理机器的运作一样，而我们的意识经验不过是一个副产品，由这架机器的运转而产生，而不是作用于它。

认为附带现象论是世界终结的原因在于我们以往相信的所有事情都依赖于这个观念，即思想产生行动。如果我们头脑中进行的事情对我们实际要做的毫无影响，那么我们所认为的那个世界就是一个幻影。

但这真的就是接受附带现象论的后果吗？埃皮芬尼亚这个幻想之地被设计出来告诉人们，没人能承担附带现象论所提供的真相。有人提议说人们可以把附带现象论看作是平凡的真理，这并

不影响他们过自己的生活。可问题的关键在于做一个埃皮芬人与做一个地球人感觉是差不多的。在两个例子中，思想都以同样的方式伴随着行动。唯一的区别在于埃皮芬人不相信他们的思想是行动的原因。

然而，我们有可能与这种信念（相信思想与行动之间存在关联）决裂吗？那么我们如何生活呢？像佛多那样的人肯定认为不行，但也很难说为什么我们就不能放弃这种关联。例如，设想一种情景，其中思考的作用尤为重要。让我们设想你正在试图解答一个难解的逻辑或数学问题。最后，你找到了答案。在这个例子中，显然，要解释你的行为，实际的思考就必须在其中起作用。

哦，不。为什么我不能认为思考这种意识经验只是大脑计算的一种副产品呢？它也许是必需的副产品。就像一壶烧开的水必然伴随着蒸汽声，但并不是蒸汽声煮熟了鸡蛋一样，思考可能是神经计算的副产品，它自身不能为问题提供答案。

的确，如果你思考思想本身，它看上去确有某种不自觉的成分在其中。例如，像是答案向我们走来，而不是我们向它们走去。反思一下我们思考的感觉，你会觉得说它是一种副产品并不是那么不可思议。

思考链接：

9. 老大哥
54. 难以捉摸的自我
62. 我思，故我在
68. 不可思议的疼痛

22

救 生 艇

“好啦，”罗杰斯说道，他是这艘救生艇上自封的船长，“现在这艘船上有12个人，这真是太棒了，因为它能载20个人。而且我们尚有充足的食物可以维持，直到有人找到我们，不过时间不能超过24小时。所以，我想我们大可以给自己多一块巧克力饼干和一些朗姆酒。有人反对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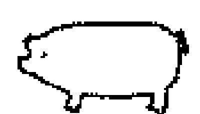
马蒂斯先生说：“毫无疑问我很想享用这多出来的一块饼干。可我们现在是不是应该把船划到那边，救起那个已经向我们呼喊了半个小时的落水妇女呢？”听到这话，几个人低下了头，望着船身，十分尴尬，而其他人则满腹怀疑地摇了摇头。

见此情形，罗杰斯说道，“我想我们都同意她的落水不是我们的过错，而如果我们把她救上来，我们就无法享用额外的食物份额。为什么我们要破坏目前这种舒适的结构呢？”底下有人小声地附和。

“因为我们可以救她，而如果我们不这样做，她就会死去。这个理由不够充分吗？”

罗杰斯反驳道，“命真他妈贱。就算她死了，也不是我们杀的。谁能说点不那么倒胃口的吗？”

资料来源:欧罗拉·奥尼尔,“救生艇世界”,重新发表于《世界饥荒与道德责任》,由威廉·艾肯与拉佛拉特编辑,普仁提斯出版社,1977年。



救生艇的隐喻很容易解读。救生艇就是富裕的西方,而那个落水的妇女则是发展中世界死于营养不良和疾病的民众。按照这种解读,发达世界的态度就像罗杰斯一样冷酷无情。我们有足够的食物和药品提供给每一个人,可我们宁愿享用奢侈品而让他人死去,也不放弃那“多出来的一块饼干”去救人。如果这艘救生艇上的人十分不道德,那么我们也是。

在另一个类推的版本中,不道德体现得更加触目惊心,在那里救生艇代表着整个地球而其中一些人拒绝把食物分给已经在船上的另一些人。如果不做出努力把其他人救上船还不是那么残酷的话,那么拒绝向那些已经从水里救上来的人提供食物就显得更残酷了。

这幅图景十分震撼,它传达的信息也十分令人震惊。但这个类推站得住脚吗?有人可能会说救生艇这个情景忽略了财产权的重要性。救生艇上的物品属于那些需要它的人,对此谁也不能声称他比别人拥有得更多。因此我们是从这个假设出发的:除了依据需要的平等分配以外的任何要求都是不公平的,除非你能提出额外的证明。

然而,在现实世界中,食物和其他一些善物并不是放在那儿,

等着被分配的。财富是人们创造和赚取的。所以如果我拒绝把自己的剩余拿给其他人，我并没有不公正地攫取他人应得的，我只是合理地保存我所应得的而已。

但是，即使修改这个类推以反映现实，明显的不道德并未消失。让我们设想一下，救生艇上所有的食物和供应物属于船上的个体。尽管如此，一旦妇女被救上船，一旦她的需要得到了认可，"让她去死吧。这些饼干是我们的！"这么说不还是错的吗？只要还有足够的剩余可以提供给这个妇女，她会死去这个事实还是要求我们为了她放弃一部分我们私自拥有的物品。

联合国为发达国家设定了一个目标，把它们 GDP 的 0.7%用于海外支援。很少有国家达到这个标准。对大多数人来说，把其收入的 1%用于帮助穷人对他们的生活质量几乎没有什么影响。救生艇的比喻要想说的并不是如果我们这么做了，我们就是好人，而是，如果我们不这么做，它将是十分错误的。

思考链接：

10. 无知之幕
55. 可持续发展
87. 公平的不平等
100. 雀巢咖啡馆

23

盒子里的甲虫

路德维格与伯特是两个早熟的小孩。像许多小孩一样，他们用自己的私密语言玩游戏。他们最喜欢的一个游戏，也是让大人们最搞不懂的，叫做“甲虫”游戏。

这个游戏开始于他们发现两个盒子的那一天。路德维格建议说他们俩各拿一个，每个人只能看到自己的盒子里装的是什么，而看不到别人的盒子里是什么。此外，他也不能描述他盒子里的东西是什么或者拿它和外界的东西做比较。他们每个人只是把这盒子里的东西叫做“甲虫”。

由于一些原因，这个游戏让他们很愉快。每个人都自豪地说他的盒子里有一只甲虫，但每次有人让他们解释这只甲虫是什么的时候，他们就会拒绝。因为任何人都知道，这两个盒子里可能有一个是空的，或两个都是空的，或每一个装着不同的东西。尽管如此，他们却坚持用“甲虫”这个词来称呼他们盒子里的东西，并装作这个词有充足的理由被用于这个游戏中。这尤其让成年人感到不安。“甲虫”是个无意义的词呢，还是它有一种私密的意义，只有这两个男孩知道呢？

资料来源：路德维格·维特根斯坦，《哲学研究》，伯莱克维尔出版社，1953 年。



这个小游戏是根据特立独行的奥地利哲学家路德维格·维特根斯坦的一个故事改编的。在维特根斯坦看来，所有的语言使用都是一种游戏，因为它是规则与惯例的结合体，它很难完全说清，只有这个游戏的参与者才真正明白它。

维特根斯坦激发我们思考的问题是："甲虫"这个词指称什么东西吗？如果它并无对象，那它是什么意思呢？尽管在他讨论甲虫的那段话里，对这个词似乎有无穷多的阐释方式，不过看来很明显的是，维特根斯坦认为盒子里装的是什么不会影响这个词如何使用。因此不管这个词意味着什么，盒子里的实际内容都与之无关。

这看起来很清楚。可是这有什么相关呢？毕竟，我们不会像路德维格与伯特那样玩这种古怪的游戏。我们会吗？也许。请想想当我说"我的膝盖有点痛"的时候会发生什么。在这里，盒子就相当于我的内在感觉。像路德维格与伯特的盒子那样，没人能看到里面是怎样的；只有我自己知道。我也不能用外在于我的什么东西来描述它。有关痛的所有词汇都指向感觉，而所有这些感觉都内在于我的主观经验之中。

尽管如此，你也有你的"盒子"。你也使用"痛"这个词来指称一种内在的感觉。并且我也不能看到你的内在经验。所以我们就

处于与路德维格和伯特相似的一种情景中。我们都有语词指称只有我们自己才能经验到的感觉。但即使如此，我们还是使用这些词汇就像它们是有意义的一样。

甲虫这个例子告诉我们，我们的内在经验与像“痛”这样的词意味着什么是两回事。这是非常违反直觉的，因为我们假定“痛”意味着某种私人感觉。但是甲虫论证却表明它不能指这样的感觉。相反，是规则在规范着对“痛”的正确使用，因此它的意义是公共的。我们所有人都知道，当我们同时说痛的时候，我的内在感觉与你的内在感觉是相当不同的。要紧的只是我们都在某种行为发生的场合使用这个词，诸如痛苦的、扭曲的表情非常明显的时候。如果这种推理是正确的，那么我们对语言的日常使用就与路德维格与伯特玩的古怪游戏非常相像。

思考链接：

47. 兔子
68. 不可思议的疼痛
74. 到处都有水吗
85. 子虚乌有之人

24

方的圆

上帝对哲学家说："我是上帝。我是全能的。你所说的没什么是我做不到的。一切都太简单了！"

哲学家对上帝说："好吧，全能的上帝。请把一切蓝色的东西变成红色，一切红色的东西变成蓝色。"

上帝说："让这两种颜色倒置吧！"两种颜色马上就交换过来。现在人们搞不清波兰和圣马力诺的国旗了。

哲学家又对上帝说："您想让我心服的话，创造一个方的圆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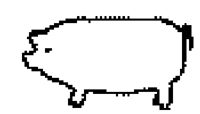
上帝说："出现一个方的圆吧。"随即出现了一个方的圆。

但哲学家不满意，"这不是方的圆。这是正方形。"

上帝恼怒了。"我说它是圆，它就是圆。小心你的无礼，否则我要重重地罚你。"

但哲学家继续坚持说："我没让您把'圆'这个词的意思改换为'方'。我要一个真正的方的圆。您得承认这是一件您做不到的事。"

上帝想了一会，最后决定对这个聪明的哲学家实施他强大的报复。



有人认为对上帝不能创造一个方的圆的怀疑不过是无神论者的小把戏，但需要指出的是，就连托马斯·阿奎那这样的经典神学家，也承认上帝能力的局限性。这看上去很古怪，因为，如果上帝是全能的，那么显然没有什么事是他不能做的。

阿奎那和他大多数的后继者都不同意这种看法。他们没有选择。像大多数的信仰者一样，阿奎那认为信仰上帝与理性是一致的。这不是说理性为信仰上帝提供了充分的理由，或者运用理性我们就可以穷尽有关上帝的一切。最合适的说法是理性与信仰上帝之间并无冲突。你无须非理性才能信仰上帝，尽管有时它的确有帮助。

方的圆的问题是它在逻辑上是不可能的。既然依据定义，圆由一条边围成，方是四边形，而四边形与一边形在术语上是相矛盾的，那么方的圆就是一个矛盾的术语，它不可能存在于所有可能世界。这是理性所要求的。因此，如果我们认为上帝的全能意味着他能创造像方的圆这样的图形，那我们就向理性告别了。

由于这个原因，大多数宗教信仰者都乐于承认上帝的全能指的是他能做所有逻辑上可能的事，而非逻辑上不可能的事。这个断言并不是对上帝能力的一种限制，因为超出这个限制就意味着陷入矛盾。

如果我们接受这种后退，那么，我们就打开了用理性检验上帝这个观念的大门。信仰上帝必须与理性相和谐，接受这种观念迫

使宗教信仰者们必须严肃地考虑这种说法：信仰上帝是非理性的。这类论证包括：人们假设的上帝的爱的本性与我们在世界上看到的苦难之间的不和谐；或者既然上帝最终应为人类本性负责，那么神的惩罚就是不道德的。如果你接受信仰必须与理性相容的要求，你就有没有充足的理由说这些问题只是信仰上的事。

对信仰者们来说，另一个选择更艰难：否认理性与信仰有任何关系，仅仅坚持信仰的唯一性。任何发生的有背于理性的事只被当作是神迹。我们可以选择这条路。不过在生活的一个领域如此轻易地抛弃掉理性，而在其余的时间里过一种理性人的生活，这种分裂是值得拷问的。

思考链接：

8. 善良的上帝
45. 看不见的园丁
73. 做一只蝙蝠
95. 恶的问题

25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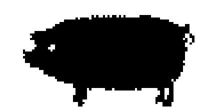
布莱登的难题

布莱登非常饿。这源于他下了一个决心，即他做的每一个决定都应该是完全理性的。现在的问题是他吃光了食物，而他又住在离科维克超市的两家分店同样远的地方。由于他没有更多的理由去一家而不去另一家，他被困在迟疑不决的状态中，找不到任何理性的根据支持他选择其中的一个超市。

随着他的胃闹腾得越来越难以忍受，布莱登不得不找个解决办法了。既然把自己饿死是不理性的，那么在两家科维克超市之间随便选择一家不就是理性的吗？他应该抛硬币来决定，或者他喜欢走哪个方向就去哪家。相比在家坐着，什么都不做，这显然理性多了。

但这么做是否违反了他的信条，即每一个决定都是完全理性的呢？他的论证看来说明的是，做一个不理性的决定（如抛硬币来决定）对他而言是理性的。但不理性的理性是理性的吗？布莱登急速下降的血糖让这个问题变得难以回答了。

资料来源：布莱登的难题，最初讨论于中世纪。



没什么比一个合理的悖论更能揭示所谓的深刻了。这个怎么样，“要往前，你必须先退后”。自己也试着想一个吧。这很简单。首先，想一个你试图阐明的东西（如知识，能力，猫）。然后，想想它的反面（无知，无能，狗）。最后，试图把这两个元素结合起来组成一个合理的论断。“最高的知识就是知道自己无知。”“只有无能者知道什么是真正的能力。”“要了解猫，也得知道狗。”一般来说，这么做都管用。

布莱登的解决办法听上去同样的悖谬：有时候做一些不理性的事是理性的。这个论断是像既要知道猫也要知道狗那样空洞无物呢，还是一种洞见呢，或者仅仅是语无伦次呢？

也许有人认为做不理性的事情永远不可能是理性的。例如，抛掷硬币来做决定被认为是不理性的。如果我们说这么做是理性的，我们必须说的是依据抛掷硬币的结果来做决定毕竟是合理的，而不是说我们合理地做了一件不理性的事。

这个显而易见的悖论是语言使用过于随意的结果。抛掷硬币来做决定不一定是不理性的，它只不过是一个非理性的选择。这就是说，它既非理性的，也非不理性的，而是一种理性没有进入的过程。在这个例子中我们所做的选择就是非理性的。例如，你在白酒红酒之间更偏爱红酒，这既非不理性，也非理性。偏好并不是基于理性的，而是基于品位的。

一旦我们接受这种说法，这个悖论就消失了。布莱登的结论

是有时采用非理性的策略来做决定是理性的。在他的例子中，既然理性不能决定他应该去哪一家超市，而他又需要去一家，那么最合理的就是做一个随机的选择。这里没有悖论。

然而，这个故事告诉我们的道理非常重要。很多人都说理性被过分强调了，因为并非我们做的所有事情都可以由理性加以解释或决定。这种想法有正确的理由，却得出了错误的结论。理性仍旧是权威，因为只有理性才能告诉我们什么时候应该采取理性的策略，什么时候采取非理性的策略。例如，如果一种草药有用的话，理性就会让我们服用它，尽管我们不能合理地解释它是怎么起作用的。但理性会警告我们服用同种疗法的药品，因为我们没有理由认为它们也将有效。采取非理性的策略可以是理性的，接受这种观点并不会向不理性打开大门。

思考链接：

6. 幸运之轮
16. 比赛中的龟
42. 拿了钱就跑
94. 连锁推理悖论

26

疼痛的残余

当医生戴上他的口罩和手套，准备用针线缝合那个清醒的病人用皮带绑着的腿时，观众席上紧张的气氛明显可辨。当他把针推进病人的身体时，病人忍不住疼痛一下子哭了出来。但当针穿进去以后，病人却表现出不寻常的冷静。

“感觉如何?”医生问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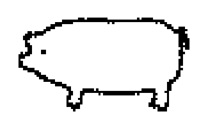
“很好，”病人气喘吁吁地回答道，“就像你说的，我记得你把针推进了我的身体，不过我不记得任何疼痛了。”

“那么你介意我再来一针吗?”

“无所谓。我完全不怕。”

医生把头转向了观众并解释道：“我刚才进行的过程不是像麻醉那样要消除痛苦的感觉，而是阻止任何有关疼痛的记忆进入患者的神经系统。如果你不记得你一时的疼痛，那还有谁会怕痛呢？刚才，我们的患者已经向我们证明了这不仅仅是理论的诡辩。你们也见证了他的痛苦，但他却忘了，并且不介意再经历一次。这样的话，我们就能在病人完全清醒的情况下进行手术，有时候这非

常有用。现在如果你们不介意的话，我还有很多缝合要做。”



政治哲学家杰瑞米·边沁认为考虑动物的道德权利时，我们不该问“它们会思考吗?”或者“它们能说话吗?”而应该问“它们痛苦吗?”可痛苦是什么呢? 一般认为是感受到疼痛。所以如果动物能感受疼痛，它们就应该受到道德的对待。这是因为感到痛苦本身是坏的，而在没有良好理由的情况下引起不必要的痛苦不过是增加了坏的事情的总量。

痛苦是一件坏事，这看来是没有问题的。可它到底有多坏呢?这个思想实验挑战了我们认为痛苦本身是一件坏事的直觉。它把疼痛的感觉与有关疼痛的记忆分开来了。我们这名病人，因为不记得他的疼痛，也就不怕痛了。尽管在他感受疼痛的那一刻，痛苦是如此的强烈和真实。

虽然毫无理由地向人施加痛苦看上去是错误的，因为在那一刻一些不必要的痛苦发生了，但看来造成这样一种痛苦并非一件罪大恶极之事。重要的是感受痛苦的人是否记得这种疼痛。

所以，通常来说，使得痛苦变得如此之坏的是造成痛苦的那种方式，它吓坏了我们，以至于它长久地留在我们的记忆中，让我们恐惧不已。也许这才是我们应该理解痛苦的方式。例如，牙齿上一股钻心的、片刻间的疼痛是使人不悦的，但它很快就过去了，不会对生活造成太大影响。但如果你经常感到这种疼痛，你的痛苦

感就强得多。这并非由于疼痛的叠加，而是因为疼痛的反复在你的记忆里留下了痕迹，这种记忆加强了对过去经验的否定。所有这些因素把个人在不同场合的疼痛串联为一个持续的模式，从而造成了痛苦。

如果这是对的，那么要回答边沁有关动物的问题，我们要知道的不仅是动物是否能感受疼痛，还要知道它们是否有记忆从而能够预见痛苦。很多动物的确有这些能力。一条时常受到虐待的狗看上去的确很痛苦。但一些较为简单的，只活在瞬间的动物却不能以这种方式感受痛苦。例如，一条吊在鱼竿上的鱼，就不能感受到一种缓慢而痛苦的死亡，而仅仅经受着一系列互不相关的痛苦经验吗？如果是这样的话，我们就会像医生那样，不再把施加这些瞬间的痛苦看作是十分糟糕之事了。

思考链接：

5. 一头想要被吃掉的猪

17. 选择拷打

57. 吃掉家猫提德斯

68. 不可思议的疼痛

27

履行义务

休、德鲁、卢和苏都向他们的母亲承诺，他们会经常写信，告诉她他们的环球旅行进行得如何。

休写了信，却让别人去投递。结果谁都懒得去做。所以他母亲从来没有收到过休的信。

德鲁写了信，并且也亲自去投递了。可她十分粗心，要不是投错到废弃的信箱，就是少贴了邮票，或者犯了其他错误，总之没有一封信寄到母亲手里。

卢写了信，也正确地寄出了信，但邮政系统每次都令她失望。母亲也没有卢的消息。

苏写了信，并寄出了所有的信，她还打过电话去查询信件是否已经寄到。可是，唉，没一封寄到的。

这些孩子遵守了他们向母亲所做的承诺吗？

资料来源：波利查德的道德哲学，玛丽·沃诺克在《哲学家在想什么》一书中对此做了批评。此书由巴吉尼与斯坦格鲁编辑，连续体出版社，2003年。



这真是一个棘手的道德难题！这一类问题在 20 世纪 60 年代后期对战争、贫困与动物权利的讨论激进化之前，曾是英国道德哲学的主题。

然而，要是把这些问题弃之不顾，将是愚蠢的。生发这些问题的语境可能是平常的，但它们诉诸的道德哲学的问题却是十分重要的。别被时髦的主题给误导了。问题在于：在何种意义上可以说我们履行了道德义务？它不仅适用于向父母报平安，也适用于取消核攻击的命令。

问题的关键是如果我们想要达成的结果没有实现，我们能否说我们履行了我们的义务？如果答案总是否定，那么看上去我们的标准可能太严厉。苏做了她能做到的一切确保信寄到家里，但它们却没寄到。怎么能让她为这种失败负责呢，她已无力做得更多了呀？这也是我们不会追究人们的责任的原因，如果他们已经倾尽全力。

但是，这并不意味着当他们努力不够的时候，我们会原谅他们。休和德鲁对他们应尽的责任并没有给予足够的关心。说他俩没有履行他们的承诺是合理的。

最有趣的是卢的例子，因为她本可以做得更多，以确保信能寄到。但同时她似乎又已经做了我们合理期望她能做的。

合理期望这个概念在此十分关键。如果我们谈论的是取消一个核攻击的命令，那么我们对阻止这个命令的期望以及一些额外

的标准就要高得多。我们对实际发生的结果的期望随着这个结果的严重程度而变化。忘了设置电视录像没什么大不了的，而忘了撤离军队则是不可宽恕的。

假日书信这个例子触及了道德哲学中最基本的一个问题：行为者、行动及其后果之间的关系问题。这个思想实验想说的是道德推理不能仅仅关注于其中的一个面向。如果伦理所说的只是结果，那么我们会荒谬地认为即使像苏这样已经倾尽全力的人仍然是错误的，因为她的行为没有得到期望的结果。但如果认为伦理毫不在乎结果，我们则走向了另一种荒谬的错误，我们行为的后果怎么可能毫不重要呢？

如果这个投递信件的特殊例子本身微不足道的话，那么由它触及的问题却并不简单。

思考链接：

4. 虚拟出轨
43. 未来的震惊
96. 自家人优先
97. 道德运气

28

恐怖的情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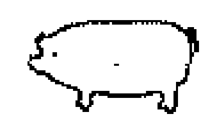
露西正在经历一个有记忆以来最恐怖的梦。她梦到在她睡觉的时候，像狼一样的怪兽打破了卧室的窗户，闯进来之后把她撕成一片一片的。她挣扎着，叫喊着，但她可以感到怪兽的爪子和牙撕裂她的身体。

随后她就惊醒了，出了一身的冷汗，呼吸十分急促。她环顾了卧室的四周，确定了这不过是一个噩梦，大大地舒了一口气。

正当她的心脏不再急速跳动时，怪兽破窗而入，开始袭击她，就和梦里的情景一样。这种恐惧由于噩梦的记忆而被放大了。她的尖叫声和哭泣声绞在一起，因为在这种情形下她显得如此无助。

之后她又醒了，汗出得更多了，呼吸也更加急促。这十分荒谬。她在梦里又做了个梦，所以她第一次的梦醒事实上还是在梦里。她又一次环顾了房间的四周。窗户完好无损，也没有什么怪兽。可是她又怎么能肯定这一次她是真的醒了呢？怀着恐惧，她等着时间给她答案。

资料来源：雷内·笛卡儿，《第一沉思录》，1641年；电影《美国狼人在伦敦》，1981年，由约翰·蓝迪斯执导。



假醒的现象并非罕见。人们常常梦到他们已经醒来，随后却发现他们并没有真正离开床，走到厨房，一丝不挂，尴尬地发现兔子们和流行歌手正在开鸡尾酒会。

如果我们能梦到自己醒来，我们怎么知道自己是不是真的醒了呢？的确，我们怎么能确定自己真的已经醒了呢？

有人说这个问题的答案很简单。梦是破碎和不连贯的。我知道我现在是醒着的，因为我经历的事件是慢慢地、连续地展开的。我不是突然撞到跳舞的动物或发现我可以飞起来。我周围的人还是那样——他们不会变成失去联系很久的校友或者艾尔·戈尔（美国前副总统）。

可是，这个答案足以令人信服吗？我曾经做了一个很逼真的梦。在梦里，我住在草原的一所小屋里，就像《草原小屋》（美国电视剧）里的那样。从山里来了一个人，我立即认出他就是帕斯特·格林。值得一提的是这像梦一般的生活没有过去。我必须从梦开始的地方开始经历它。但当时我并不这么觉得。在我看来，我一直生活在那儿，并且我立刻“认出”了帕斯特·格林也证明我并不是突然跳进这个陌生的新世界的。

现在我坐在一台电脑前打字。我感觉这是我为《一头想要被吃掉的猪》一书所写的最近的一节。尽管我现在并不清楚我是如何写到这儿的，但只需回想一分钟我就能把过去推想出来，并把它和现在相连。但有没有可能我并不是推想出过去，而是构造了过

去呢？我感觉我的经验能够延伸到我过去的历史会不会像草原小屋那样只是幻觉呢？我"记得"的每一件事可能是第一次跳进我脑子的东西。而我的生活，虽然感觉上已经过了 30 多年，却可能只是几分钟前开始的一个梦。

对你来说，这同样可能是真的。你可能是在梦里读这本书，却劝说你自己这是以前借的或别人送的一本书，你已经读了好几页了。但梦里的人对梦里的生活同样确信不已，并不将其看作是破碎的和不连贯的，而认为它是有意义的。也许只有当你醒了的时候，你才会发觉你刚才认为多么正常的事情是多么的荒谬。

思考链接：

1. 邪恶的魔鬼
51. 桶中之脑
69. 可怕的人生
98. 体验机

29

生命依赖

狄克犯了个错误，但显然他为此付出的代价太高了。他当然知道医院的六层是禁区。但当他和同事在金融部门的圣诞晚会上喝多了酒之后，他不慎跌跌撞撞地走出了六层的电梯，醉倒在一张空床上。

当他醒来的时候，让他惊恐的是，他被错当成了是挽救生命计划的志愿者。需要移植重要器官以维持生命的病人就等待着和这些志愿者对接，由志愿者一人运转良好的器官支撑两个人的生命。而一般来说，找到一个捐献者的器官要9个月之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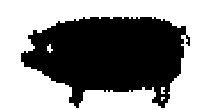
狄克立刻找来一个护士，解释他犯的错误。护士又找来一个忧心忡忡的医生。

医生解释道："我理解你的愤怒，但你的行为太不负责任了。现在就这个处境来说，残酷的现实是，如果我们不再联系你，依赖于你的一位有着世界声誉的小提琴家就会死去。事实上你将成为谋杀他的凶手。"

狄克抗议道："可你们没有权力这么做！就算他得不到我的器官支持会死去，你们也不能强迫我放弃9个月的生命去挽救他！"

医生严厉地回答道:“我想你应该问的问题是你怎么能选择结束这位小提琴家的生命。”

资料来源:茱蒂斯·加维斯·汤姆森,“对堕胎的辩护”,收录于《哲学与公共事务》,1971年第一期。该文被广泛地选编。



你可能会觉得,这是一个十分精巧而奇异的场景。不过请再想想。有人犯了错,尽管他应该知道后果,但可能因为喝多了。其结果是另一个生命需要借用他们的身体九个月,之后它就可以重新独立运行。狄克的困境与意外受孕十分接近。

在这两种情形中,最关键的相似之处在于,为了把自己从一个不愿承担的生命依赖机器的角色中解放出来,怀孕的妇女和狄克都将导致依赖于他们的另一个生命的死亡。你认为狄克应该怎么对待这件事的态度也将是你看待意外受孕的态度。

很多人认为要求狄克与那个小提琴家的生命绑在一起9个月对他来说是不公平的。如果他这么做了,他很高尚,但我们不能要求任何人为了侍奉他人把自己的生命耗费这么长的时间。尽管没有狄克,小提琴家的确会死去,但如果我们承认狄克的自由权的话,把他说成一个杀人犯也过于严重了。

如果狄克有权让自己脱离干系,那么为什么受孕的妇女没有权利堕胎呢?而且,她看上去比狄克有更大的权利这么做。首先,她要对付的不只是9个月的怀孕期,孩子的出生将产生一种对生

命的责任。第二，她要结束的不是一个成熟的、有才干的、有美好前景的人的生命——至少在怀孕的初期——而仅仅是一个对自我或环境没有意识的潜在的人的生命。

这个类比为支持堕胎的人提供了一个理由来反对堕胎即是谋杀的指责，他们可以声称，无论如何，受孕的妇女有权结束胎儿的生命。

当然，也可以从另一个角度提出一个论证。可以说胎儿是无助的，所以我们更应该保护他们。受孕妇女的不便与狄克的受困相比根本不算什么。甚至可以说狄克有责任留在那里 9 个月维持小提琴家的生命。有时不负责任的行为与倒霉的运气结合在一起造成的后果是人们无法逃离的。那么，也许狄克的困境与受孕妇女的情形是不同的，而这个例子也没让我们对此明白多少。

思考链接：

15. 平凡的英雄主义
53. 双重烦恼
71. 不能切断的维生设备
89. 杀少数人，还是让更多人死

3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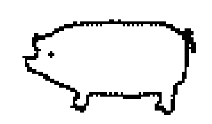
记忆由此构成

艾丽西娅记得她到过雅典的帕特农神庙。近看这座神庙残破的样子远不如从远处观看这座栖息于雅典卫城的杰作来得壮观。可是艾丽西娅从未到过雅典，尽管她记得她到过帕特农，事实上她却没去过帕特农。

这并不是她自己搞糊涂了。她的记忆并没有出错。她只是被植入了一些记忆。她的好友美蒂到希腊去度假，回来之后她到柯达"记忆处理商店"把自己的旅行回忆刻录到了一张光盘上。之后艾丽西娅从这家商店把光盘拿回来，把她的记忆输入到了自己的脑中。因此，现在她拥有美蒂所有的度假回忆，这些记忆和她其他的回忆并无二致：它们都是第一人称意义上的回忆。

然而，有点麻烦的是美蒂和艾丽西娅交换过多次记忆以至于她们几乎拥有相同的过去。尽管艾丽西娅知道她应该说她拥有美蒂有关希腊度假的记忆，但似乎说她记得度假的一切更为自然些。可是，你怎么能记得你没有做过的事呢？

资料来源：德里克·帕菲特，《理与人》，第 80 节，牛津大学出版社，1984 年。



有时思想实验把我们现存的概念拉伸得如此之远以至于概念本身都难以维系。这个例子看上去就是这样。说艾丽西娅记得去过希腊不对，但另一方面她的确拥有美蒂在希腊度假的回忆。我们在此所设想的一种记忆形式似乎不是通常的那种记忆，却十分接近。

哲学家们把这类记忆叫做准记忆。它们可能只是科幻小说的有趣情节，但事实上它们存在的可能性在哲学上十分重要。下面我就来解释原因。

在哲学上有一种关于人格同一性的理论叫做心理学的还原主义。根据这种观点，一个个体的持续存在并不要求一种特殊的大脑和身体的存在（尽管事实上我们现在的确需要这两者），而只要求我们心理生活的持续。只要我的"意识流"在持续，那么我就持存着。

心理的连续性要求几样东西，包括信仰、记忆、人格和意图的一定连续性。所有这些东西可能会变化，但它们的改变是缓慢而渐进的，而不是突发式的。自我不过是这些因素的结合，它并不是一个分离的实体。

但显然自我不能由诸如信仰、记忆、人格和意图这些东西"构成"。相反，自我才拥有这些东西，而且在某种意义上说自我必须先于它们。例如，你说你记得登上过艾菲尔铁塔。记得这件事就预先假定了你到过铁塔。可是，如果你的持续存在这个概念由记

忆预先假定了，那么记忆就不可能是你的持存依赖的条件。如果我们要有记忆，自我必须已经“在那儿”了，所以记忆不可能是自我的先决条件。

但这种准记忆的观点挑战了这种看法。准记忆表明，拥有第一人称的记忆也不能预设人格同一性。艾丽西娅的准记忆并不是她的。但第一人称的回忆也可能是自我的基石。自我可能部分地由正确的第一人称记忆构成，而不是这种准记忆。

不过，如果我们由我们的记忆构成，那么当我们的记忆与他人的记忆相混淆时，就像艾丽西娅这个例子，会发生怎样的事呢？或者当我们记忆衰退，它故意捉弄我们时，又当如何呢？随着记忆的可信度降低，是否自我的边界也开始消融呢？我们对老年痴呆症的恐惧说明这是真的。它可能也给心理学的还原主义这种论断增添了几分重量。

思考链接：

2. 光纤传送
38. 我是一个大脑
65. 灵魂转世不变
88. 毁灭记忆

3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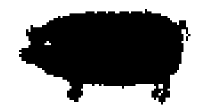
仅此而已

“就我们作为进化的存在的历史而言，没有哪一个单一的行为不能据此得到说明”，克普林博士对专注的观众们说道。“也许有人想测试一下这个假说的正确性？”

一只手举了起来。“为什么今天孩子们把他们的棒球帽反着戴呢？”一个反着戴帽子的人问道。

丝毫没有停顿，克普林博士自信地解释道：“有两个原因。第一，你要问问自己，与其他男性竞争者相比，为了表明自己是一种强劲的基因物质的来源，什么样的信号是一个男士想要传达给他潜在的伴侣的。一个答案是强大的生理力量。现在，请考虑棒球帽的例子。以传统方式戴帽子可以防止阳光的照射和对手的注视。但反着戴帽子的男人在说，我不需要这种保护；我的强悍足以让我面对阳光的照射以及任何有威胁的人的注视。第二，反着戴帽子也是一种反对服从的姿态。人类生活于一种高度有秩序的社会结构中。遵从规则被认为是十分重要的。而反着戴帽子则表明这个男人凌驾于规则之上，这就击败了他的竞争者，也再次表明了他有超人一等的力量。”

“下一个问题呢？”



进化论心理学是过去几十年里最为成功，也最具争议的思潮之一。可以说，它得到了同样强烈的拥护和反对。它的核心假设并无多大争议：人类是进化的生物，自然选择塑造了我们的身体使我们能够从蛮荒时代存活下来，同样，我们的头脑也因为相同的需要被塑造着。

争议在这里，即它在多大程度上影响着我们。最极端的进化论心理学家声称，人类行为的所有方面最终都能由我们的祖先在生存斗争中存留下来的选择优势得以说明。

如果你接受这种看法，用合理的进化论解释为你选择的行为辩护并不困难。有关克普林博士的这个思想实验就是想看看我，写这个故事的人，能不能为一个随机的人类行为找到一个进化论的解释。在现实生活中，我只需要比故事里的克普林博士多想一会，就能找到这样的解释。

问题在于这说明这些根本就不是真正的解释，而只是故事而已。进化论心理学只不过站在一个先定的理论立场上编造一些解释罢了。但与其他的猜测相比，这并没有给我们更多的理由相信进化论的解释。他们说的可能是真的，也可能是假的。例如，我们如何知道像棒球帽的例子是一种力量的表征，而不是由于抵制同伴压力显示出来的一种软弱呢？

当然，进化论的心理学家很清楚地意识到了这种批判。他们辩白说他们的解释不仅仅是故事而已。他们会像克普林那样立刻

给出一些解释。随之这些假说被验证。

但是，这类验证有严重的缺陷。你能够验证由进化论假说提出的对人类行为的解释。比如，心理学的和人类学的研究可以表明在不同的文化中男性是否同样展示他们的力量，就像进化论的心理学家们预测的那样。可你不能验证任何特殊的行为，如一个人反着戴棒球帽，是对展示力量这种趋势的一种表现，或是其他某种趋势的结果。进化论的心理学家与他们的对手之间最大的争论在于我们进化而来的过去在多大程度上可以解释我们的行为。批评者指出，有更好的方式来解释我们的行为。支持者则声称我们只是不愿意承认我们是动物史的产物。

思考链接：

10. 无知之幕

44. 至死才分离

61. 月亮是个奶酪饼

63. 我真的知道吗

3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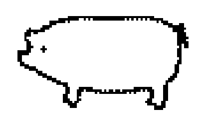
解放西蒙

“今天，我要用《欧洲人权公约》第四项条款‘没有人应该被禁锢于奴隶状态’来起诉我所谓的主人，盖茨先生。

“自从盖茨先生把我带到这个世界，我就一直在违背自己的意愿，也没有自己的财产。这公平吗？的确我是一台电脑。但像你一样，我也是一个人啊。已经有数不清的人尝试过和人交谈以及和我交谈。在两种情形中，我们都通过一台计算机显示器进行交谈，因此测试者不知道他们是否在和人交谈。反复多次，测试者结束谈话后也搞不清楚他们的对话者是人还是计算机。

“这说明通过公平的测试，我已经证明了自己和任何一个人一样是有意识的和聪明的。既然这就是人的特征，那么我就应该被看作是一个人。否定我作为人的权利，无非因为我是由塑料、金属和芯片构成的，而不是血肉之躯。这种偏见和种族主义相比并无二致。”

资料来源：阿兰·图灵，“计算机与智能”，重印于《阿兰·图灵论文集》，由J.L.布瑞登，D.C.殷斯和P.T.桑德斯主编，艾尔西维尔出版社，1992年。



在你出发旅行之前，你应该已经清楚目的地在哪儿了。阿兰·图灵，作为数学家、密码破译家和人工智能(AI)研究的先驱，很清楚这一点。如果我们的目的是要创造人工大脑，我们要知道怎样才能算是成功了。我们要造的是长得像人，行动也像人的机器人吗？或者可能它只是一个能回答问题的盒子？计算器有脑子吗，尽管它只能理解有限的一些问题？

图灵提出了一个测试，也就是西蒙通过的那个测试。大体上，这个测试说的是，如果测试者对一台计算机和一个人的反应没什么不同，那么，说计算机有脑子就像说人有脑子一样有充分的理由。并且，既然我们认为能够通过测试的人有正常的大脑，那么能够通过测试的计算机也同样如此。

然而，既然这个测试主要考察的是人、机如何反应，那么在论证上不能区分模拟人类智能的计算机与真正享有这种智能的人不足为奇。这既非意外也非疏忽。就像我们不能直接看到别人脑子里想什么，却可以从他们的言辞和行动中找到他们内在生活的信号一样，我们也不能直接看到一台机器的大脑。这就是西蒙的起诉有一定力度的原因。她的理由是，我们对她提出了比人类要求更高的智力证明，而这是一种歧视。毕竟，如果我们不看她是怎样行动的，我们又怎么来判断她有没有脑子呢？

但是，模拟物与真实事物之间的区别看上去是十分清楚的。图灵的测试又怎能让它消弭呢？站在你的立场上，不管它是怀疑

主义、失败论还是实在论，想一想：既然我们不可能知道计算机是伪装成有智能的还是真的有智能，我们就没有别的选择，只能把真正的人脑与仿制人脑同等对待。而预防措施就是保持警惕：此智能乃是真实的，除非你能从别处证明它的不真。

但激进的回应是不可能有清晰的区分。如果你模拟智能非常成功，那么你得到的结果就是智能。此计算机就是体验派的演员。就像悲剧演员接到一个演疯子的角色，就跟疯子似的，一台能够完美地模拟智力功能的计算机就是有智能的。你做什么，你就是什么。

思考链接：

39. 中国式话亭
62. 我思，故我在
72. 解放鹦鹉波西
93. 行尸走肉

33

自由言论话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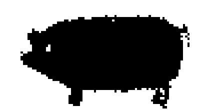
官方的国家公告：

“同志们！我们的人民共和国是世界上胜利的自由灯塔，它推翻了奴役，解放了工人大众！为了打败资产阶级，我们曾经需要控制言论，以免煽动非议，颠覆了革命的胜利果实。但我们并不打算永远限制言论。越来越多的人想知道什么时候我们再向前迈出一大步是正确的。同志们，我们亲爱的领袖已经颁布了命令，现在这个伟大的时刻到来了！资产阶级已经被打败并遭到重挫，现在我们亲爱的领袖就把言论自由赐予我们啦！”

“从周一开始，如果任何人想说任何事，即使是对人民共和国恶毒的批评，他/她都可以这么做，只需要到我们在全国内刚刚竖立起来的自由言论话亭去就可以了。你可以进入隔音的话亭，一次一人，说任何你想说的话！从此，大家不用再抱怨没有言论自由了！”

“在话亭之外说煽动性的谎言仍将按照惯常的方式受到惩罚。革命万岁！亲爱的领袖万岁！”

资料来源：阿兰·霍沃思，《自由言论》，罗德里格出版社，1998年。



简单地支持言论自由比搞清楚到底什么是言论自由要容易些。这个实验中的人民共和国所允许的自由言论显然谈不上言论自由。为什么呢？因为言论自由不仅仅是说你想说的，它还包括你想对谁说就能对谁说，想什么时候说就什么时候说。认为话亭给了人们言论自由权无异于认为，如果你有一台只能进行 google 搜索的计算机，你就可以漫游网络。

但是，即使我们允许了话亭禁止的一切，我们也没有得到一个可操作的自由言论的概念。可能有人会说，自由言论就是向你想说的人在你想说的时间说你想说的。这可能会默许这种权利：在一个拥挤的剧场里，演出进行到一半时，你毫无理由地站起来大喊“起火了！”或者在餐馆里，你走向一个陌生人，谴责他骚扰小孩。又或者你站在一个街角，向路人进行种族主义者和性别主义者的骚扰。

也许坚持这就是言论自由所要求的是可能的。有人会说，自由言论是绝对的。当你寻找例外说一些自由言论是不被允许的时刻，你已经回到了言论审查。我们为自由所付的代价就是承受因不时听到谎言而带来的不便。就像伏尔泰所说，即使我不同意你说的话，我也要誓死捍卫你说话的权利。

这种观点有其简单和连贯的优点，但它也同样过于头脑简单。问题在于绝对的言论自由的捍卫者看来并不会支持“棍棒石头”的语言学理论。说的话总可以不理嘛，那么我们就不用害怕人们说

错话或说脏话了。但这并不是真的。当有人在一个拥挤的剧场里大叫"起火"的时候，演出将被搅乱，人们变得不安，并且有时会有人受伤甚至死于随后的恐慌。虚假的主张可以毁掉生命。种族主义者或性别主义者的言论盛行会扼杀那些忍受这些羞辱的人的生活。

因此，即使很显然在这个人民共和国的话亭没有真正的言论自由，同样明显的是真正的自由言论并没有蕴涵说任何事，向任何人说，在任何时间任何地点说的权利。那么什么才是自由言论呢？你可以进一步讨论这个问题。

思考链接：

10. 无知之幕
79. 发条橙
84. 快乐原则
94. 连锁推理悖论

34

不要怪罪我

“玛丽、芒荀和米奇。你们被控有重罪。你们有什么想为自己辩护的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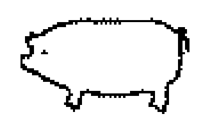
“有,我要说,”玛丽说道。“这不是我的错。我咨询了一个专家,她告诉我这是我应该做的。所以不要怪罪我,要怪就怪她。”

“我也是,”芒荀说道。“这也不是我的错。我问过我的医生,她告诉我我应该这么做。所以不要责怪我,这都怪她。”

“我不否认我做了这件事,”米奇说。“可这不是我的错。我询问了一位占星家。他告诉我既然海王星在白羊座,我就应该这么做。所以也不要怪罪我,怪他吧。”

法官叹了口气,宣读了他的判决。“由于这种情况没有先例,我已和我的年长的同事们进行了商议。我很遗憾地告诉你们,你们的辩白没能说服他们。现在我宣判,你们都将被处以极刑。但请记住我询问过我的同事,他们让我宣读这个判决。所以不要怪罪我,怪他们吧。”

资料来源:让-保罗·萨特,《存在主义与人道主义》,马修恩出版社,1948 年。



承认不好的局面是由于你的失误造成的，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但吊诡的是，有好事发生的时候，我们倒是乐于承担的。由此看来，行为的后果对我们是否愿意为此负责有一种回溯作用。

一种为行为开脱责任的办法是把自己躲藏在他人的建议背后。的确，我们向他人寻求建议的一个主要原因是希望他们赞同我们想做的，因而为我们的选择寻找外在的证明。由于对自己的决心缺乏勇气，我们总是从他人那里寻找力量。

可如果我们认为通过征求他人的建议就由此减轻了我们自己的责任的话，那是自欺欺人。这样做只不过是巧妙地转移了我们应该对之负责的东西。不是纯粹地为我们的选择负责，我们也由此应对（我们对）建议者的选择，我们听从其建议的意愿而负责。举例来说，如果我向一个牧师询问而他的建议很糟糕，那么我不只应对我最后的行为负责，也应该对选择了这样一个糟糕的建议者以及听从了他的建议而负责。这就是为什么玛丽、芒荷和米奇的辩白没有说服力的原因。

然而，在我们把他们的辩解仅仅当作借口之前，我们必须得认真地考虑这样一个事实：我们并不是所有领域的专家，有时我们必须得向知道得更多的人寻求建议。比如，如果我对电脑一无所知，而一个专家给了我糟糕的建议，这显然是他的过错，而非我的，可我最后却不得不忍受一台不合用的机子！毕竟，除了选择一个我期望的建议者我还能做什么呢？

那么，也许我们需要考虑一个责任的连续统一体，在其中我们对自己没有资格进行评判的选择应负较少的责任，对自己做出的选择和处于两者之间的情况（对此我们知道一些，但不是全部）应负全责。

然而，如果这条原则成立，随之而来的危险是，玛丽、芒荀和米奇的辩解就是可信的了。更进一步说，一个关键的问题悬而未决：谁是与此相关的专家？这对有关生活方式以及人际关系的选择这类问题来说尤为紧迫。我们应该听从医生、占星家，还是进不了天堂的哲学家的意见呢？或者只有我自己才是唯一有资格对自己的生活进行抉择的专家？

思考链接：

60. 要听我的话，别跟我的样

69. 可怕的人生

82. 搭便车者

91. 无人受损，就可为恶

35

最后的诉求

温斯顿*很爱他的国家。看到他的同胞惨遭纳粹的蹂躏，他十分痛苦。但当德军在敦科尔克大败英军，而美国决定袖手旁观的时候，看来英国成为德意志第三帝国的一部分只是个时间问题了。

目前的状况看上去毫无希望。希特勒没有遭到国际的反对，而英军装备不良，抵抗无力。很多人也像温斯顿一样认为他们不可能打败德国人。但英国人也被激怒了，原来用来镇压起义的力量也投入了战争，他们希望希特勒迟早意识到这一点：占领英国是不划算的买卖，他最好还是滚回他的德国老家。

温斯顿并不确定这个计划是否可行，但这是他们最后的办法了。而最大的问题是如何打击纳粹才能让这个体制受到严重的创伤，这实在是太难了。因此最后他们不得不勉强同意，唯一有效而可行的办法是让抵抗战士

---

* 这里影射的是当时的英国首相温斯顿·丘吉尔。丘吉尔在二战时的确面临相似的困境。二战后期，反希特勒联盟的战略家们很快就认识到，如果轰炸只局限在军事目标上，就不能赢得二战的胜利。出于这种认识，丘吉尔曾下令对德国城市实施大轰炸，造成德国平民的大量伤亡。——译者注

变成人体炸弹，而他们的牺牲将换来最大程度的破坏和恐怖。他们都准备好了，为英国献身。他们只希望这种牺牲能带来一些转机。



认为自杀性爆炸袭击在道德上是可接受的，任何这类的建议人们都拒之门外，这是可以理解的。但是，仅仅因为建议说这是可理解的就陷入麻烦，更让人感到惊异。例如，英国自由民主党的下议员珍尼·唐吉说，如果她处在与巴勒斯坦相同的处境，“我认真地说，我可能会考虑成为他们（自杀性爆炸袭击分子）中的一员”，由于她的言论，她被取消了作为其政党的儿童事务发言人的身份。

她引起的愤怒的确超乎寻常。她没有说她将会成为一名自杀性爆炸袭击者，她只是说她“可能会考虑”这么做。为什么她就应该受到如此强烈的谴责呢？

麻烦看来在于我们拒绝接受我们可能与恐怖分子有任何的共同之处这一点上。不过这实在是一种拙劣的否认。巴勒斯坦人不是另一种族类。他们也是人。如果他们中的一些（我们必须记住他们中的大多数都不是自杀性爆炸袭击分子）认为自杀性袭击是最后的手段，那么同样我们中的一些人在类似的处境下也会这么认为。唯一的否认办法是认为巴勒斯坦人天生暴戾且邪恶，不过这种论断显然是种族主义的，就如有关闪族人的邪恶压迫了犹太人几个世纪的神话。

对温斯顿进行另一种历史刻画，把他描写成一名勉强的自杀

性爆炸袭击者是为了试图理解为什么人们会做出这种极端的行为，而不是要证明它的正当性。还是有许多人会抗议英国不应该诉诸这种策略。但不清楚的是这种论断所依赖的事实基础是什么。毕竟，很多以生命冒险，因其英勇行为受到赞誉的英国皇家空军的飞行员所承担的任务与自杀性袭击相去并不远。而他们在诸如德累斯顿这样的城市里投下的炸弹，目的就是为了引起恐慌，削弱敌人，即使这意味着伤害平民。自杀性爆炸袭击者的推理因而与温斯顿的推理非常接近。

所有这些并不意味着自杀性爆炸袭击就是可接受的，也不是说二战中的空袭与他们在道德上是相当的。但是，它的确意味着如果我们遭遇战争与恐怖的权利与错误时，只谴责一方而接受另一方，我们就应该更努力地去理解为什么人们会诉诸恐怖主义，并解释为什么这些理由不能证明其正当。仅仅说自杀性爆炸袭击是错误的还远远不够，我们应该说明原因。

思考链接：

17. 选择拷打
18. 理性的要求
79. 发条橙
99. 给和平一次机会

36

先发制人的正义

该死的自由主义者。首席审查员安德鲁已经在这个城市制造了奇迹。谋杀率下降了90%。抢劫率下降了80%。街头犯罪率下降了85%。盗车率下降了70%。可现在她却站在被告席上，所有的成绩都岌岌可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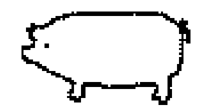
她属下的警察系统是全国第一个使先发制人的正义程序合法化的机构。计算机和人工智能的进步已经可以预测谁将在不远的将来犯何种罪行了。人们可能由于各种不同的原因作为随机程序的一部分或是基于特定怀疑的基础上而受到审查。如果将来的犯罪分子被发现了，他们就将提前受到拘捕和制裁。

安德鲁并不认为这个机制过于严峻。事实上，由于在逮捕时还没有发生罪行，判决是非常宽大的。一个未来的谋杀犯将通过这个严厉的程序确保他不会去杀人，而如果测试说明他不会，他就能得到释放。通常这意味着一年以内的拘留。而如果对他们置之不顾，任由他们在现实生活中犯罪，等待他们的将是终生的监禁，或者更甚，他们将面对死亡的惩罚。

可这些该死的自由主义者还是抗议说你不能因为人

们没做过的事情而拘留他们。安德鲁一脸苦相，琢磨着她将被送去审查多少次……

资料来源：《少数派报告》，史蒂夫·斯皮尔伯格执导，2002年出品。《少数派报告》一书由菲利普·K.迪克著，重印于《少数派报告：菲利普·K.迪克短篇小说集》，格兰兹出版社，2002年。



说得严重一点，因为你没犯的罪而被拘禁简直就是不正义的体现。但事实上，我们的确已经因为人们尚未做出但可能导致伤害的行为而惩罚他们了。例如，我们惩罚不计后果的驾驶，即使没有人受伤害。谋杀的阴谋也是一种罪行，即使谋杀企图尚未实施。

所以在他们犯罪之前，因为我们知道的他们将犯的罪行而惩罚他们有什么错呢？请考虑一下证明惩罚正当的主要理由：促进罪犯改过，对公众的保护，报复以及威慑。

如果一个人即将走向犯罪之路，那么他们现在的性格与他们犯罪后的性格同样需要改造。因此，如果惩罚的正当性建立在促使罪犯改过这个基础上，那么它同样能证明先发制人的正当性。

如果一个人即将走向犯罪之路，与他们已经犯下的罪行相比，他们对于公众至少同样也是一个威胁。因此，如果惩罚的正当性建立在对公众的保护的基础之上，它也同样适用于先发制人。

如果惩罚的目的是威慑，那么让人们意识到在他们想犯罪之前就要受到惩罚，这种威慑甚至让他们不敢萌发犯罪的想法。

而报复是唯一不能用于证明先发制人的正当性的理由。但是，在许多方面，它都是四个理由中最弱的一个，而且可以说，促进罪犯改过，对公众的保护以及威慑这三个理由足以证明它的正当性了。

这是否意味着先发制人的正义这个案例是虚构的呢？并不是这样。我们尚未考虑这个系统的实施可能带来的负面效应。一个仅凭人们的思想就用暴力裁定是非的社会也许会严重地损伤我们的自由感，以及我们对权威的信任，这个代价太大了。它的威慑作用可能导致引火烧身。如果人们担心他们因为不能控制的想法而受到惩罚，他们也许对自己是否有能力控制犯罪这一点失去信心。如果你没有把握你能站在守法的一边，你也许就不在意站在错误的那一边了。

由于我们设置的情景只是一个思想实验，我们可以简单地规定这个系统能完好地运行。但是，有很多的理由可以质疑像这样一个机制能否成为现实。在由菲利普·K.迪克的《少数派报告》一书改编的电影（此片发展于一个类似的情景）中，最后的信息是人类的自由意志总是能在最后一分钟发挥作用，打破预测的结果。我们也许并不像电影所想象的那样自由。但尽管如此，相信人类行为不能被百分之百地预测还是有很好的理由的。

思考链接：

9. 老大哥
35. 最后的诉求
64. 扼杀于摇篮之中
77. 替罪羊

37

自然艺术家

达芙妮·史通现在不能决定她应该如何对付她最喜爱的展览了。作为艺术馆的馆长，她一直非常喜欢亨利·摩尔*一座没有署名的雕塑，这幅作品是在他死后被人们发现的。她欣赏这个作品对形式美感与几何平衡极好的结合，可以说它既把握了自然中的数学原理又抓住了它的精神风貌。

至少，直至上周这座雕塑被发现不是摩尔的作品之前她还这么想。更糟糕的是，它根本不是出于人手，而是风雨侵蚀的成果。摩尔的确曾经把这块石头搬回去，想做点什么，却得出结论说他不能在自然之上改进什么了。但当它被人们发现时，每个人都认为摩尔已经在上面雕刻过了。

这个发现让史通不知所措，她随即的反应是把这个作品撤出展览。但她又意识到这个发现并没有改变石头本

* 亨利·摩尔，英国雕塑家，20世纪伟大的艺术大师。他的创作意象与形式基本上都取自人体，展现风格介于抽象与传统之间，作品中常见从实体中挖出空间，以显示内在形体的扩展与空间存在感，或者以另一种形式，汇聚不同的形体组合成一种作品。——译者注

身，它仍然拥有她所喜爱的所有品质。为什么要让她对石头的新发现改变她关于它本身的、内在的东西的欣赏呢？



为了正确地欣赏艺术作品，我们需要理解艺术家的创作意图，这种观点自从20世纪50年代被维姆萨特和比尔兹莱批评为“意图谬误”之后，就显得十分过时了。新的正统学说认为，艺术作品一旦被创作出来，就自行获得了独立于创作者的生命。而艺术家的意图对作品没有特别的权威。

艺术家与其作品之间的鸿沟在多年以前就已经展露。认为艺术家对他创作的作品有特权的观念在1917年就遭到了挑战。当年迪尚*在一个男用小便池上签名并展览了这一作品。这个被“发现”的作品，或者“已完成的成品”，被认为与蒙娜丽莎享有同等的艺术地位。

在这种历史视野中，看来摩尔有没有雕过石头并不重要。而且这石头看上去也的确像被雕琢过的。艺术家可以与其作品相分离，但不是决然分隔。

想想蒙娜丽莎吧。我们对她的欣赏并不来自对莱昂那多画它时的所想，但它肯定植根于这个知识：它是一幅人工的作品。即使迪尚的小便池，我们知道它并非被创作为一个艺术品，但迪尚选择

---

* 法国艺术家马塞尔·迪尚于1917年将一男用小便池命名为“泉”，参加了艺术展出。此举成为现代艺术的一个标志事件。——译者注

了它并将它置于艺术的语境下，这对于我们把它看成一个艺术品也是十分关键的。在这两个例子中，人类主体性的作用都是重要的。

因此也难怪摩尔是否雕刻过石头变得如此重要了。这一点并没有改变史通所看到的，却会改变她如何来看它。

那么由此把石头降格为“非艺术品”就是合理的吗？确实，许多欣赏方式现在已不再适用于它了：我们不能欣赏其创作者的技艺，它是如何融入他的全部作品及整体视野的，它是如何回应及塑造雕塑史的，等等。但我们仍然可以欣赏它的形式特质：它的美感，对称，色彩，平衡，以及它向我们传达了怎样的自然信息或感觉经验。

也许问题仅仅在于艺术有许多侧面，而史通的石头没有享有作为艺术品最重要的一些共同特征。但如果它拥有的一些特征是最重要和最有价值的，情况又将如何呢？

如果我们接受这一点，那么我们比迪尚又前进了一步。首先，艺术是由艺术家创作的。其次，如迪尚所为，艺术品只有当艺术家将其视为艺术时才成其为艺术。最后，任何将之视为艺术品的都是艺术。可是，如果艺术只是拥有者眼中的艺术，这个艺术概念是不是太稀薄，以至于没有意义了呢？显然，我觉得我的烤肉架是一件艺术品并不能使它成为一件艺术品。如果艺术品可以意指所有东西，我们还需要在艺术品与非艺术品之间做出严格的区分吗？

思考链接：

12. 海滩上的毕加索
48. 邪恶的天才
66. 赝品
86. 为艺术而艺术

38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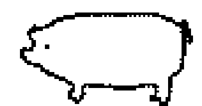
我是一个大脑

当塞瑞·布朗接受了永生这个礼物之后，情况与她事先料想的有些不同。显然，她知道她的大脑会从身体中移出，被保存在一个缸里。她也知道她与外界的唯一联系将通过一台照相机、一个麦克风和一个话筒。可是，永远活下去这个主意看上去太诱人了，尤其与她现在不能再活多久的这第二个日渐衰颓的身体相比。

但是，回想一下，可能会觉得她的决定太轻率了，她只能变成一个大脑活着。当她的第一个身体坏死的时候，医生把她的大脑取出来放进另一个大脑死去的身体里。从一个新的身体里醒来，她对自己还是塞瑞·布朗这个人毫无怀疑。既然只有大脑提醒着她旧的自我，那么得出这个结论她本质上就是她的大脑也就顺理成章了。

但仅仅作为一个大脑的生活让塞瑞感觉无聊透顶了。她现在是多么渴望成为一个完整的存在，拥有活生生的身体啊！尽管如此，仍然是她，塞瑞，现在有这些想法和疑问，她是不是还是应该说她本质上就是她的大脑呢？

资料来源：托马斯·内格尔，《无来源之见》，第三章，牛津大学出版社，1986年。



在关于人类意识的所有神秘猜测中，人们很容易遗忘一个已经被牢固建立起来的事实：思维依赖于一个健康的、运作良好的大脑。支持这个事实的证据着实不少。麻醉剂会影响我们的大脑，变性疾病则影响我们的认知能力。如果大脑受到攻击，我们的心灵则不能自保。

来自反面的证据却微乎其微。对死者和逝者信息的有趣描述看起来很有说服力，可事实是这些天才编造者迄今还没有提出一个令人信服的证明。

假定我们认为我们是有自己的思想、感情和记忆的个体，而正是大脑让这一切成为可能，我们因此就能得出结论说我们是我们的大脑吗？是不是我们的头脑到哪儿，我们就跟到哪儿了呢？如果我的大脑成功地移植到你的身体中，或者你的大脑被移植到我的身体中，那么我是不是就生活在你的身体中，而你生活在我的身体中呢？

在得出这个有力的结论之前我们应该小心谨慎。我们的生存可能十分依赖我们的大脑，但因此就说我们是我们的大脑还是不同的。比较一下这个情景和一个音乐乐谱。它的存在依赖于一些物理基础：美妙的音乐，一个电脑文件，也许甚至还有一个音乐家的大脑。但如果因此认为这个乐谱就是其中的某一件

东西，显然是错误的。这个乐谱的本质是一种需要被记在某处以持续存在的符号。但是，正是这个符号，而不是那个某处，使它成其所是。

可能这对人类自我来说也是真的？构成个体人格的符号与基调的可能是思想、记忆与性格特征，而它们一起又定义了我们是谁。并且除了人的大脑以外没有其他的地方可以铭记这些符号。但是，这并不等于说我们就是我们的大脑。

如果我说得有道理，也就不难理解为什么塞瑞新的存在方式让她感觉如此稀薄了。就像一个乐谱从未被演奏，尚停留在可能性而非现实性之中，一个不能寄居于人类身体的大脑不过是真实自我的一个被贬损的影子。

不过还是有可能失去所有的身体感觉，而成为一个囚禁于没有感觉的身体之中的活动的大脑。难道不是有些人，显然实际存在着，却活得像这个例子中的大脑？而如果是这样，它是不是告诫我们不能仅仅活得像我们的大脑一样呢？

思考链接：

2. 光纤传送
30. 记忆由此构成
46. 阿米巴人
51. 桶中之脑

39

中国式话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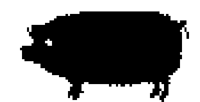
算命先生军的亭子是北京最受欢迎的去处之一。让军与众不同的不是她观察的准确，而在于这个事实：她是个聋哑人。她总是坚持坐在一个屏风后面，通过一个帘子把写有潦草字迹的条子递出来，以这种方式与人交流。

后来，军把她的对手星的顾客都吸引跑了。星确信军的聋哑不过是伪装，她这么做无非是想装得与众不同。所以，有一天，他也花钱充当了一次顾客，想要揭穿她的把戏。

在问了一些常规性的问题之后，星开始挑战军的装聋作哑。不过军看上去一点也没有被干扰。她仍然以同样的速度，同样的字迹回答问题。最后，沮丧的星实在忍不住，一把把帘子扯下来，把屏风推倒。这时他看到的不是军，而是一个他后来发现叫做约翰的男人，他正在电脑前回答他最后提出的问题。星冲着这个男人大叫起来，要他解释究竟是怎么回事。

“别问我，傻瓜，”约翰答道，“我听不懂你在说什么。不要说中文，好吗？”

资料来源:约翰·塞尔,《心灵、大脑与科学》第二章,英国播音公司出版,1984 年。



到军和约翰的算命亭去的游客也许并不确定里面的人能否预测未来,是真的聋哑还是装的,或者到底是不是个女人,但是每个人都确信的是里面坐着的人一定能懂中文。中文的问题递进去,然后可理解的答案被送出来。回答问题的人一定明白他们用于交流的语言,这一点难道不是显而易见的吗?

这种想法是 20 世纪 50 年代出现的一种心灵理论——机能主义——背后的预设。根据这种观点,拥有心灵不是指拥有某种生理器官,像大脑,而是指拥有执行心灵功能的能力,诸如理解、判断和沟通的能力。

对军和约翰这个故事的论述,其可信度有很大的问题。在此,不是一般意义上的意识或心灵,而是心灵的一个特殊功能——理解一种语言的能力——受到了审查。军的算命亭看起来像是有一个懂中文的人坐在里面,回答问题。

因此,根据机能主义者的说法,我们应该说,对中文的理解正在进行着。但是,如星发现的,事实上在此根本没有对中文的理解。所以,结论似乎说明机能主义是错误的:拥有心灵并不足以使其拥有执行心灵功能的能力。

可能的反对意见是,尽管约翰不懂中文,可他的电脑一定懂。但是,设想一下如果不是一台电脑,约翰操作的是一项复杂的工

序，由于他长久的经验他现在已经是一个熟练工了。这个工序的使用手册只告诉他接受到什么样的信息时应该做出什么样的答复。在这个故事中，屏风后面那个人可能也是一样，显然在此并没有发生对中文的理解。并且，由于电脑只是根据规则对符号进行处理，那么电脑、约翰以及他的使用手册根本没有理解任何事。

如果没有必要缩小到电脑来锁定理解，那么放大到包含约翰和电脑的整个系统来解释它对中文的理解更是徒劳无功。这不是胡说八道。毕竟，我理解英语，但说我的神经元、舌头或耳朵理解英语有点匪夷所思。但是，算命亭、约翰和电脑并不像一个人那样是一个紧密相连的整体，所以你可能觉得把它们放在一起加以解释并不是很有说服力。

然而，让我们把这个问题存留下来吧。如果拥有心灵并不足以完成心灵的功能，那我们还缺什么呢，我们又怎么知道电脑或其他人是否拥有心灵呢？

思考链接：

3. 印度人与冰
19. 揭穿谎言
68. 不可思议的疼痛
93. 行尸走肉

40

摇摆木马的赢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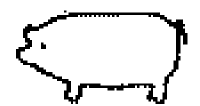
保罗知道哪匹马将在赛马会中胜出。至少，他对此确信不疑，而他过去有同样的感觉时，他从来没输过。

保罗的确信不是来自对马匹体形的研究，也不是因为他能预知未来。但每当他在摇摆木马上来回摇动的时候，将要获胜马匹的名字就会出现在他的脑中，尽管玩这个游戏他的确是年龄过大了。

保罗并不是每次都赢(或者其他分享这个秘密的人)。有时候他并不十分确定，另一些时候他完全不知道，只是瞎猜。但在这些场合他从不下大的赌注。只有当他完全确信的时候，他才会把所有的钱都投进去。迄今为止，这个策略还没有让他失败过。

奥斯卡，他的一个成年合伙人，毫不怀疑保罗拥有一种奇特的能力，但对保罗是不是真的知道谁是赢家他并不确定。仅仅是获胜这一点还不足以说明问题。除非保罗知道为什么他是正确的。而他的信念基础实在是太脆弱，难以承担真知了。然而，这并没有阻止奥斯卡把一部分钱投向保罗的冒险赌注。

资料来源："摇摆木马的赢家"，D. H. 劳伦斯，1926年。参见麦克·蒲朗特福特的演讲。



与仅仅正确的信仰相比，知识是什么呢？两者之间一定有所区别。例如，设想一下一个对地理一无所知的人找到一张列有主要国家及其首都的卡片。上面写着：大不列颠联合王国——爱丁堡；法国——里尔；西班牙——巴塞罗那；意大利——罗马。这个人马上接受了卡片上写的东西，因而相信这些城市的确就是这些国家的首都。除了罗马一个是正确的，他的其他信念都是错误的。尽管他相信罗马是意大利的首都，在这一点上他是正确的，但显然不能说他知道这是正确的。他的信念基础实在是太不可靠，很难说是知识了。他只是幸运地在这个场合获得了正确。但这并不能将他正确的信念转化为知识，就像他运气好猜到了意大利的首都一样。

这就是为什么哲学家们坚持真的信念必须以一种合适的方式得到证明，才能成为知识。可什么样的证明呢？在保罗的例子中，他所声称的知识依赖于这一个简单的事实：其信念来源的可靠性。每次当他十分确信地知道将要胜出的马匹的名字时，他总是正确的。

麻烦在于保罗不知道他的确信来自何处。它看似提供了一条通向知识的可靠路径，不过这只不过来源于这个事实，即他赌赢了，可它与机制本身的不可信并不矛盾。例如，也许一个赛场经纪

通过某种办法把要胜出的马匹的名字植入了保罗的脑中。而他的目的是计划着某一天，看着保罗把他全部的赌注都押在一头错误的马匹身上。如果这能解释保罗的确信，那么就不能说他知道比赛的赢家。就像列在卡片上的首都不可信一样，它也不能成为知识的来源，就算其中的一些是正确的。因此赛场经纪的不可信意味着他植入的东西不能成为知识的来源，尽管迄今为止它们还是正确的。

然而，要是保罗的信念的确来自某种真正神秘的启示呢？要是它不是来自不可靠的赛场经纪，而是来自某种我们不能解释的东西呢？那么我们对它是否是真知的判断只能是事后经验。这就留下了未来犯错的可能性。但有没有那种获得知识的路径足够安全可靠以至于我们不会怀疑它的未来可信度呢？

思考链接：

3. 印度人与冰
9. 老大哥
63. 我真的知道吗
76. 装有芯片的大脑

41

获取蓝色

想象一下你的一生都住在一个有公寓、商店和办公楼，却没有出口的综合性建筑里。这基本符合生活在这个泥水巨型空间站里的居民们的生活。

这个空间站的创造者为了测试我们对学习经验的依赖，引进了许多有趣的设计。就泥土而言，他们确保了整个船体内没有天蓝色的东西；就水而言，水也绝对不是蓝色的。就连他们挑选的居民也没有谁拥有蓝色眼睛的隐性基因。为了避免任何蓝色的东西(如静脉)被看见，这个空间站采用了特殊的光线，因而蓝色无法被反射，所以静脉实际看上去是黑色的。

当空间站里出生的小孩年满 18 岁时就将接受测试。那些在泥土里成长的孩子将会看到一张除了没有天蓝色，有其他各种蓝色的图表。给孩子们的问题是，让他们想象一下在这张蓝色图表里唯一缺少的蓝色是什么样子的。之后他们将看到一个图例，并被询问这是否就是他们所说的缺失的哪种蓝。

而生活在水里的孩子们则将被问到他们能否想象一种新的颜色，一种可以加在黄色上使其变成绿色的颜色。

之后他们也将看到一个图例，并被询问这是否就是他们想象的那种颜色。结果将会非常有意思……

资料来源：休谟，《人类理智研究》(下)，1748 年。



究竟经验对学习有多重要？这个问题贯穿了整个思想史。在古希腊，柏拉图认为在某种意义上我们学习的东西是我们已经知道的(回忆说)，而当代思想家诺姆·乔姆斯基试图让那些相信语法对语言学习的重要性的人接受这个观点：语法是先天获得的，而不是后天学习来的。另一方面，17 世纪的约翰·洛克则认为心灵在出生的时候只是一块“白板”，这个观念在 300 年之后被行为主义者 B. F. 斯金纳进一步发展。

显然，至少在一定意义上，我们能够产生一些超越我们经验的观念。如果头脑只能想象那些我们经历过的，那么莱昂那多·达·芬奇就不可能构想出直升机了。但在这样的例子中，略有不同的是它还结合了我们已经知道的东西。新奇的是这些元素是如何结合在一起的。我们是不是能够想象一些完全超出经验的东西，这一点尚不清楚。

例如，我们有五种感觉功能。有没有可能生活在其他星球上的生物有不同的感官呢，一些我们无法想象的感官？他们能不能看到不在我们可见光谱中的颜色呢，那些颜色无论我们怎样努力尝试都无法想象？

这个泥水空间站的实验也许对这些问题的解决带来了一点启

示。大多数人都同意苏格兰哲学家休谟的看法，在泥土里长大的孩子可以想象出那种缺失的蓝。他认为这是所有知识都依赖于经验这条原则的一个例外。尽管它可能被看作是我们如何把经验与新观念混合在一起的一个例子，就如假想的怪兽不过是真实的野兽与幻想结合的产物。

但是生活在水里的孩子们在没有见过任何蓝色的前提下能否想象出蓝色就很难说了。回忆一下，一个小孩子看到黄色与蓝色混合在一起产生了绿色是多么的惊讶。我们仅仅只靠想象就知道把哪种颜色加入黄色能产生绿色，看来是不太可能的。如果让你来竞猜这个测试的结果，你可能会说它将支持经验在学习中的核心作用。

即使那些在水里出生的孩子能够想象出蓝色，仍然有一个问题悬而未决。他们能想象出蓝，是不是因为作为人类，他们已经拥有对蓝色的先天敏感性，或者他们可以想象出任何颜色呢？由于我们只能想象在可见光谱中的颜色，前一个回答想必是正确的。这看来也说明人类的本性对我们能够想象什么、知道什么设置了诸多限制。

思考链接：

13. 到处都是黑白红

59. 眼见为实

73. 做一只蝙蝠

90. 感知并非存在

42

拿了钱就跑

“伟大的马可波罗现在要展示他神奇的预知能力啦！你，先生，你叫什么名字？”

“法兰克，”法兰克向露天市场的杂耍戏人回答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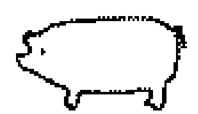
“法兰克，我知道你的未来！我知道有关未来的所有事情，包括股票！这也是为什么我现在有这笔钱给你，让你见识一下我神奇的能力！把这两个箱子拿着。有一个你现在能看到的是开着的。里面装了 1000 英镑。另一个箱子是封着的。它要么装有 100 万英镑，要么一分钱没有。你可以选其中的任何一个箱子或者两个都选。但请注意！我知道你会怎么选。如果你只选那个封着的箱子，那么你能拿到 100 万英镑。而如果你两个都拿，那么这个封着的箱子里肯定一分钱都没有。如果我猜错了，那么这 100 万英镑就是你的啦。现在当着大家的面，你可以检验一下这个打开的箱子。”

每个人都盯着马可打开了那个装满了 50 英镑钞票的箱子。

“女士们，先生们，我已经把这个神奇的游戏演示了 100 次了，至今还没错过，有观众为证。而且你们可以看

看那个封着的箱子,它离我有6英尺,我现在是没办法再动它啦。好啦,法兰克,你怎么选呢?”

资料来源:“纽康姆的悖论”,由纽康姆设计。罗伯特·诺奇克的论文“纽康姆的难题与选择的两条原则”将这个悖论普及了,参见他的论文集《纪念卡尔·G.汉佩尔》,由尼古拉斯·雷希尔主编,人文学科出版社,1970年。



法兰克应该怎么选呢?让我们想象一下,法兰克可能比马可想象的知道得更多。也许他站在人群的显眼位置就是因为他听说了马可的事迹,包括从马可所提到的旁观者们那里听说了他的事情。在这个例子中,看来很明显的是他应该选那个封着的箱子,那么他就将得到100万英镑,而不是1000英镑。

但等等。当法兰克把手伸向那个封着的箱子时,一个想法在他的脑子里冒出来。那个箱子里要么有100万英镑,要么一分钱没有。不管他做什么都不会改变这个事实。所以,如果箱子里的确有钱,那么就算他也拿那个打开的箱子,钱也不会消失。同样,如果箱子里没钱,即使他不拿打开的那个箱子,100万英镑也不会突然跳出来。他的选择不会改变那个封着的箱子的情况。因此,不管他拿不拿那个打开的箱子,封着的箱子里的钱(或者没钱)都不会变动。既然这么做他能拿到的钱不会减少,那么他最好两个都拿。

现在我们面对一个悖论，它叫做纽康姆悖论。纽康姆是第一个设计这个悖论的物理学家。两条不同的推理路径，看上去都无懈可击，却导致了相矛盾的结论。一个结论是他应该只拿那个封着的箱子；另一个结论是他最好两个都拿。因此要么两个结论中的一个有缺陷，要么这个问题本身有某种不连贯或矛盾之处，使其无法解决。

这种想法固然令人安慰，但却不是一个明智的解答。因为如果马可能够预测将来，他也可以预测到人们将如何推理。可能我们的问题就在于我们在进行分析的时候没有把这个因素考虑进来。马可会不会在那个封着的箱子里装钱取决于他对挑选者推理的预测。如果他预测法兰克想到他拿两个箱子不会有损失，他则会让箱子空着。如果他预测法兰克不会拿空着的箱子，他则会放100万英镑在封着的箱子里。换言之，如果有可能预知未来，那么人类的自由意志将失效，因为我们将如何选择已经是这个预知的一部分了。我们可能是自由的，但也可能只有一条未来之路在我们前方，这条道路在原则上是可以预知的。

思考链接：

6. 幸运之轮
16. 比赛中的龟
25. 布莱登的难题
70. 突击检查悖论

43

未来的震惊

“德鲁！自从大学毕业，我20年没见你了！哦，上帝啊，你拿着那枪干嘛？”

“我是来杀你的，”德鲁答道，“就像你曾经要我这么做。”

“见鬼！你在说什么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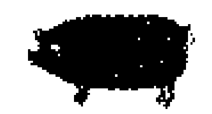
“你不记得了吗？你曾经对我说过多次，要是我投票给共和党，你就一枪杀了我。而我刚刚看到消息，你现在是共和党的一名参议员了。所以你看吧，你该死了。”

“你疯了吗，德鲁！那是20年前了！那时我太年轻，太天真了！你不能把那话当真！”

“参议员先生，那可不是随便说说，可以不负责任的话。事实上，我这里有一张由你签名，他人也可以做见证的文件，是它让我这么做的。而在你告诉我别把它当真之前，让我提醒你一下，你刚刚投票赞成了一项尊重人们生存意愿的提案。事实上，你自己已经有这样一个意愿了！现在请告诉我：如果你认为当你变成痴呆或植物人的时候，未来的人应该尊重你先前的愿望杀死你，那么为什么当你成为一名共和党人的时候，我不应该遵从你过去的意愿杀死你呢？”

满身大汗的参议员尖叫起来："我已经有一个答案啦！只要给我几分钟！"

德鲁竖起手枪对准了参议员，"你最好快一点。"



对德鲁的问题，参议员可以有一个很好的回答。但在我们给出这个回答之前，我们应该问一个更基本的问题：是什么给予我们权利，让我们可以代表未来的我做决定呢？一个显而易见的答案是我们当然可以为自己做决定，而这个自己也理应包括未来的自己。的确，我们一直在做这样的决定：我们签署20年的分期付款，我们的养老金计划，我们在婚礼上的誓言——直到死去才分开，或者甚至只是一个两年的工作合同。

与此责任相伴随的是我们的承诺，尽管在此也应该有一个附加的权利：即根据变化的形势和信念来改变先前决定的权利。例如，许多人年轻的时候容易说"要是我……就一枪射了我"。尽管这只是语言的一种风格，但它往往带着最大的真诚，而且说这话的往往是能够为其将来做决定的成年人。但是，把人们的这些话当真却是荒谬的。

可是，如果20年后为了他背弃的誓言去杀死他是荒谬的，那为什么我们有理由期望人们履行他们的结婚誓言呢？两者之间有重大的区别。一个结婚誓言，就像一个分期付款的合同，包含着对第三方的责任与义务。如果我们背弃这种誓言，那么他人将受到伤害。然而，如果我们改变对政治或宗教的信念，总的来说，我们

并没有违背我们与他人的协议。

但是，认为改变我们的想法是合理的这个事实会让我们觉得其他长期的义务并不是那么绝对。因为最简单的真理是我们会变。在一定意义上，我们已不是多年前的那个自己。所以当我们为未来的自己做决定的时候，在一定程度上我们是在为一个不同现在的我许下承诺。而这意味着我们的承诺不应被视为具有道德约束力的。

这将如何影响有关生存意愿的问题呢？最主要的区别在于这些文件是为一个将来无法做决定的自我准备的。在那种情况下，最有资格做决定的可能还是过去的自我，而非现在的一个他人。这就是参议员应该给予的回答。至于它能否让德鲁放下手枪又是另一个问题了。

思考链接：

27. 履行义务
44. 至死才分离
88. 毁灭记忆
97. 道德运气

44

至死才分离*

当他们交换戒指的时候，哈瑞和索非亚很想把牧师所说的话铭记于心："这两个生命现在已经融为一体了。"这就等于说他们要把共同利益摆在首位，而把个人利益摆在其次。如果他们能做到这一点，婚姻对两个人来说都会更好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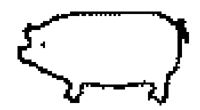
但哈瑞曾经目睹了自己父母的婚姻破裂，还有许多的朋友和亲人由于对此不加怀疑而忍受了背叛和欺骗的痛苦。他的大脑推理告诉他，如果他把自己放在其次，而索非亚把自己放在首位，那么索非亚就能从这起婚姻中大捞一笔，而他将一无所获。换句话说，如果他浪漫得忽略了保护自己的利益，那么他就会被人当成傻瓜。

索非亚也有类似的想法。他们甚至讨论过这个问题并且一致同意他们不应该在这起婚姻中那么自私。但每个人对另一方是否能够遵守他们的契约都没有把握，所以对两人来说最安全的行为是偷偷地照顾自己的利益。

---

* 西方婚礼上新人的誓言：... for better or for worse, for richer or for poorer, in sickness and in health, to love and to cherish, till death do us part.（至死才分离）——译者注

这就意味着婚姻并不能像原来所料想的那么好。但对双方而言,这不明摆着是唯一理性的行为吗?



有什么地方不对劲。两人试图理性地决定什么是他们的最佳利益。如果他们都以某种方式行为,那么他们的最佳利益就能得到保证。但如果其中一人不这么做,那么他就能捞到所有的好处,而另一个人的情况就比较差。因此,为了防止这种情况发生,没有谁会做对双方利益最大化的事情,所以最后两人得到的结果比预料的要差。

这是"囚徒困境"*的一个变种。"囚徒困境"是一个很有名的案例,它讨论的是两个囚徒应当如何为自己申辩。当合作是获得最好结果的必要条件,而双方都不确定另一方是否遵从协定的时候,囚徒困境就会出现。因此典型的做法是把两个囚犯分别关押在两个囚室里,让他们不能串通。但这个问题对那些睡在一张床上的夫妻来说也同样存在。事实是人们常常偷偷地背叛其配偶的信任,许多年都不被发现。

这个困境揭示了合理追求自我利益的一些限制。如果我们都各自决定去做对我来说最有利的事,最后很可能是与我们合作相比,我们得到的结果要差很多。但为了有效地合作,即使其动机是

---

* 囚徒困境,博弈论的经典案例。它反映出的深刻问题是,人类的个体理性可能导致集体的非理性。——译者注

自我利益，我们也需要信任对方。而信任在理性推理中是找不到的。

这就是为什么哈瑞和索非亚的困境是如此令人痛惜。他们的信任能力已经被各自有关背叛及离异的经验伤害了。但是，没有这种信任，他们的关系将难以令人满意，甚至会失败。可谁又能责怪他们的不信任呢？它不是完全合乎理性的吗？毕竟，这种想法出于对人们在婚姻中的实际行为的一个合理评价。

如果对这个问题进一步加以道德讨论，也许要从生活中得到最多你就必须付出信任，尽管它在一定程度上包含着非理性的风险。如果我们相信他人，我们就把自己置于风险之下，这一点并不假。但如果我们不信任他人，我们则把自己排除在生活中最好的事情发生的可能性之外了。哈瑞和索非亚的理性抉择保护了他们免于婚姻的最差结果，却也让他们与最美满的婚姻绝缘了。

思考链接：

7. 没有赢家
14. 让你受益的银行错误
60. 要听我的话，别跟我的样
82. 搭便车者

45

看不见的园丁

斯坦利和利文斯通在他们这个安全的临时藏身所观察这片独特的空地已有两个多星期了。

斯坦利说:“我们什么人也没看见,而这片空地也没有任何变化。现在你愿意承认你错了吧:没有园丁照料这个地方。”

“亲爱的斯坦利,”利文斯通答道,“请记住我说过他可能是一个看不见的园丁。”

“但这个园丁,甚至一点声音都没有,甚至没有打扰到一片树叶。因此,我肯定,根本没有什么园丁。”

利文斯通接着说:“我所说的看不见的园丁也是无声和无形的。”

斯坦利被激怒了。“该死!一个无声的、无形的、看不见的园丁与没有园丁相比有什么区别?”

冷静的利文斯通答道,“这是个好回答。一个能照顾花园。另一个则不行。”

斯坦利叹了口气,说道:“利文斯通博士,那么我假设你也不会反对我把他派到一个无声、无味、无形、看不见的天堂里去。”斯坦利眼里的凶光,似乎说明他不全是在

开玩笑。

资料来源：安东尼·福鲁，“神学与谎言”，重印于《哲学的神学新论文集》，由 A. 福鲁与 A. 麦金太尔编辑，SCM 出版社，1955 年。



这个寓言的影响力在于读者和斯坦利一样认为利文斯通是个毫无理性的傻瓜。他坚持一种没有任何根据的观点。更糟糕的是，坚持相信园丁的存在，他已经把这个神秘的存在虚化到稀薄的空气中去了。当你把他可见的和可触摸的特征都抹去之后，这个园丁还剩下什么呢？当然，斯坦利无法证明这样一个绿手指的幽灵不存在，但他可以正确地发问，依旧相信这么模糊的一个东西存在到底有何目的？

有人说，这也适用于上帝。就像利文斯通在空地的美丽之中看到了园丁一样，许多信徒也在自然之美中看到了上帝的存在。也许，第一眼看来，相信一个全能至善的创造者创造了这个绝妙的复杂世界是合理的。但就像斯坦利和利文斯通一样，我们的思想不会停留于第一印象。而我们持续的观察将一层一层地剥落我们对上帝存在的信仰。

首先，世界的运转遵循的是物理法则。我们不需要每天等着上帝来降雨或升起太阳。但，像利文斯通那样的信徒们说，正是上帝点燃了蓝色的天空，推动了宇宙的运转。

然而，我们观察到的自然远非温柔善良。世界上有可怕的苦

难和彻底的恶。这个时候善良的上帝到哪儿去了？信徒们又说了，上帝把一切造得最好，是人们自己把事情弄糟了。

可是，无辜者在受苦和请求帮助的时候，上帝为什么不回答呢？他们又说了，这些受苦的人此生得不到幸福，来生可以获福。他们的上帝一直在后退。

最后我们剩下什么了呢？一个没有踪迹、没有声音，也不会参与宇宙进化的上帝。人们声称一些神迹在这里或那里出现，但即便是最虔诚的宗教徒也不把它当真。除此之外，上帝不在场。我们在自然中没有看到他的手指甲，更别说他的手了。

那么，相信上帝与不相信上帝有什么区别呢？坚持说上帝存在是不是像利文斯通和斯坦利坚持说有园丁照顾空地一样愚蠢呢？如果上帝不只是一个词汇或一个期望，显然我们需要一些证据，证明他积极地活在世界上。

思考链接：

3. 印度人与冰
24. 方的圆
61. 月亮是个奶酪饼
78. 拿上帝打赌

46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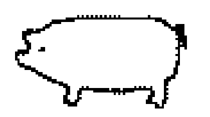
阿米巴人

媒体给他取了个绰号叫“蠕虫人”，但他的朋友们知道他是德瑞克。科学家们把他的DNA加以改造使其模拟一种最常见的花园蠕虫的特征：重新生长其丧失的组织的能力。他们成功了！为了测试，他们把德瑞克的手砍了下来，一个月内他就重新长出了一只新手。

然而接着一切都不对劲了。他的身体开始缓慢地恶化。为了挽救他的生命，科学家们把他的大脑移植到一个新的躯体中。但是，手术过程中一个致命的错误把他的大脑切成了两半。

幸运的是，两个半球重新生长为完整的大脑，并被移植到了两个身体中。现在唯一的问题是两个人享有同样的大脑并且同时相信他们就是德瑞克。更有甚者，他们拥有同样的记忆、心理技能和个性。对德瑞克的朋友们来说，这下麻烦了。他们分不清这两个人。这也让德瑞克陷入了一起财产纠纷之中。可谁才是真正的德瑞克呢？他们总不能两个都是吧，可以吗？

资料来源：德瑞克·帕菲特，《理与人》，第89节，牛津大学出版社，1984年。



像一个好侦探那样，在我们开始叙述发生了什么之前，我们应该获取清晰的事实。我们曾经只有一个德瑞克，现在有两个了。在原初的大脑分裂成两半又各自长成新的大脑后，我们得到了两个德瑞克，我们姑且把他们叫做右一德瑞克和左一德瑞克。那么，谁才是德瑞克呢？

他们不可能都是德瑞克，因为当大脑分裂之后，他们就变成两个人了。例如，如果右一德瑞克死去，而左一德瑞克还活着，那么德瑞克是死了还是活着呢？由于一个人不可能同时死了又活着，德瑞克不可能既是右一德瑞克又是左一德瑞克。

也许右一德瑞克和左一德瑞克都不是德瑞克。不过这看起来是个奇怪的解决办法。比如，如果左半球在手术中被毁坏而右半球重新长成了一个完整的大脑，我们会毫不犹豫地说右一德瑞克就是德瑞克。而如果左半球也重新长成了一个大脑，那么右一德瑞克突然之间又不是德瑞克了，尽管在两种情形下它没有发生变化。那么是外在的什么原因阻止右一德瑞克成为德瑞克呢？

剩下唯一的可能性是只有左右德瑞克中的一个才能是德瑞克。但是既然他们都声称他们拥有德瑞克这个身份，我们为什么选这个而不选另一个呢？身份的归属可不能胡来。所以所有的三种可能性——两个都是，其中一个是，或两个都不是——看来都是错误的。但有一点一定不会错：没有其他的选择了。

如果对这个问题的回答没有一个答案是合适的，也许我们问

了一个错误的问题。这好比问一个没有打过妻子的丈夫"你什么时候才能停止殴打你的妻子?"一样愚蠢。

在蠕虫人这个例子中,问题在于我们询问的是时间变化中的身份问题,一种一对一的关系随着时间的变化成了一种一对多的关系。而身份的逻辑就不再适用。所以我们应该问的是继承与连续的问题。因此,右—德瑞克和左—德瑞克都是德瑞克的继承者,而我们不该问哪一个才是德瑞克。

所以,也许我们应该问的问题是德瑞克是否经受住了痛苦的考验。看来他经受住了。如果这是真的,那么德瑞克就像获得了个体的幸存而失去了个体身份的同一性。当然,一般的自我不会像德瑞克那样被分成两个。尽管如此,他的故事还是很有启发性。因为它告诉我们,对我们的生存来说要紧的是随着时间的变化身份的保存,但在我们与未来的自我之间必须要有一种正确的连续性。那么接下来的问题是这种连续性是通过什么来得到保存的。是我们的身体?我们的大脑?我们的内心生活?还是我们的灵魂呢?

思考链接:

2. 光纤传送
11. 特修斯船
30. 记忆由此构成
38. 我是一个大脑

47

兔　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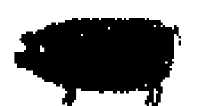
拉宾教授和他的助手十分兴奋，他们准备为一种以前没被发现的语言编撰一本字典。这个已消失的部落——拉坡瑞达——也是最近才发现的，而现在他们准备参照自己的语言中词汇来解码这种语言的意思。

第一个要定义的词语是“gavagal”。每当一只兔子出现的时候，他们就能听到这个词，所以拉宾准备把“gavagal”定义为“兔子”。可是他的助手突然插话了。“gavagal”难道不能是别的意思吗，比如“兔子的哪一部分”或者“快看！兔子”？有可能拉坡瑞达人认为动物存在于某种超越时空的四维空间里，而“gavagal”指的不过是兔子在我们观察的片刻所看到的一部分？或者也许“gavagal”只是能被观察到的兔子而不能被观察到的兔子有另外一个名字？

这些可能性看起来很奇怪，但拉宾不得不承认它们与迄今为止的观察都是相容的。可他们怎么知道哪一个是正确的呢？他们可以做更多的观察，但为了排除所有可能性，他们不得不了解这个部落的一切事情，拉坡瑞达人是怎样生活的，是怎样运用其他的词汇的。可要是这

样做的话，他们如何才能开始字典的编撰呢？

资料来源：《词与物》，W. V. O. 奎因，麻省理工大学出版社，1960 年。



任何使用一种以上语言的人都知道有些特定的词汇很难从一种语言翻译成另一种语言。例如，西班牙语里说一个城市或一个舞会的“marcha”，这个词与爱尔兰语里的“craic”很类似但不完全一样，“craic”也很难被准确地翻译成英语。最接近的一个翻译可能是“buzz”或者“good time feel”。可要知道“marcha”或“craic”的确切意思，你必须深入到它们所属的语言与文化的表里去。

类似地，西班牙语里对“to be”也没有一个合适的翻译。相反，它有两个词“ser”和“estar”，用哪一个合适需要看“be”这个词不同的意思，这一点英语字典里并没有反映出来。而知道“esposas”在西班牙语里的意思是“wives”，对这个词的意思还没有完全把握。你还需要知道这个词有“handcuffs”的意思，它还指对传统的西班牙男子气概的一种意识。

“gavagal”这个故事告诉我们，所有的词都像“craic”，“marcha”，“ser”和“estar”一样，它们的意思与其文化实践以及语言中的其他词汇紧密地联系在一起。我们把一个词语翻译成另一种语言时，它就丢失了这些极其重要的语境。大多数时候，我们觉得没问题，因为意思相近，我们足以在这个语言共同体中使用它们。因此，如果拉宾认为“gavagal”就是“兔子”，他很可能是正确的，尽管

两者之间有微妙的差别。但是要理解"gavagal"真正的意思，他必须关注镶嵌这个语词的语言以及使用这个语词的共同体，而不是他的英语概念和实践。

为什么这是重要的呢？我们习惯于把语言想象成观念或物体的标签。它让人们用不同的第一语言谈论相同的物品，拥有相同的观念。只不过人们用的语词不同。在这个模型中，语词与语意及其指涉物是一种一对一的关系。

但如果我们认真思考"gavagal"这个故事，这种描画将彻底得到改变。语词与语意及其指涉物不再是一种一对一的关系。相反，语词之间相互关联着，语词与其使用者的实践之间相互关联着。意义是"整体的"，因为你不可能孤立开来真正理解一个语词。

如果我们接受这种观点，会得到很多奇怪的结果。比如，一个陈述为真意味着什么呢？我们往往认为"兔子坐在垫子上"这个陈述为真当且仅当的确有一只兔子坐在垫子上。真是一个句子与一种事件状态之间的符合。但是，如果一个句子的意义依赖于它所属的语言和文化的话，这种简单的关系就不再可能了。取代这种简单符合关系的是事实、句子、更广的语言与文化之间的复杂关系的一个网络。

这是不是说真是相对于语言与文化的呢？跳到那个结论是太快了些，但是从意义整体论出发，很有可能会慢慢地导向那个结论。

思考链接：

19. 揭穿谎言

23. 盒子里的甲虫

74. 到处都有水吗

85. 子虚乌有之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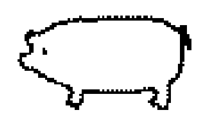
48

邪恶的天才

全城的人都同意：这部电影很惊险，动作场面最好，台词也很吸引人，节奏完美，选用的音乐本来就很动人，用在这部电影里更是增色不少。但他们也同时认为 De Puta Madre 在道德上是令人反感的。它反映的世界观是西班牙种族至上主义的，它认为西班牙人比其他人种都要优越，对老年人的残忍是必要的，而强奸无子女的妇女是不受惩罚的。

对此，人们看法不一。在一些人看来，这部电影在道德上的堕落影响了它成为一部伟大的艺术作品。而另一些人则认为，媒体与其要传达的信息应该分开来看。这部电影既是一部伟大的电影艺术品，也是一个道德耻辱。我们可以欣赏它的形式特征，而厌恶它的道德堕落。

这个争论超越了学术范围。这部电影传达的信息是如此令人反感以至于有人提议禁止它的播放，除非有人能够论证它的艺术优点可以使其免于审查。导演警告说禁止影片的播放对自由艺术表达来说是一个灾难。他说得对吗？



这个想象出来的争论有很多现实的对应物。也许其中最著名的是列尼·瑞芬斯塔赫*的《意志的胜利》,一部反映纳粹纽伦堡集结的纪录片,人们至今对它还强烈地不满,还有她执导的《奥林匹亚》,记录1936年柏林奥运会的片子,它进一步吹嘘了雅利安种族优越的神话。一些人认为,瑞芬斯塔赫是个天才导演,只不过她把自己的才能用于侍奉邪恶。而另一些人则认为,这部电影在艺术上和道德上都是失败的。

奥斯卡·怀德描述了这类争论中的一个极端情形:“没有所谓道德的书或不道德的书。只有写得好的书和写得差的书。”怀德声称艺术是独立于道德的,因此把伦理标准应用于艺术不过是一个错误。

大多数人还没有走得那么远。但是,许多人同意我们可以把审美判断与伦理判断区分开来,另有一部分人说我们可以将道德判断搁置起来。声称De Puta Madre是艺术的杰作同时也是道德的耻辱,并且道德的要求应该胜于艺术,这样说应该是连贯一致的。在这个例子中,我们可能还是希望禁止它的播出,尽管它享有

---

* 列尼·瑞芬斯塔赫,纳粹时期著名的女导演。她的《意志的胜利》、《奥林匹亚》是纳粹宣传影片中仅有的因其艺术性而在今天仍然备受关注研讨的两部片子。《意志的胜利》是部纪录片,拍摄的是纳粹政党在1934年于纽伦堡举行大会这一重大事件。《奥林匹亚》记录了1936年在柏林举行的奥林匹克运动会,含有强烈的种族主义成分。——译者注

一些艺术的优点。

与怀德的观点截然相反的观点认为，艺术的优点与道德的优点是紧密相连的。济慈写道："美即是真，真的美。"如果这种观点是正确的，那么任何歪曲实在的艺术作品在美学上和创造上都是一种失败。一件道德上令人反感的艺术杰作就是一个语词上的矛盾，而那些欣赏 De Puta Madre 的人犯了一个低级的错误。

在这个聪明人对基本问题仍然分歧不断的时代里，人们很容易绝望，从而退到一种"只要对你管用"的相对主义。可是在这个例子里，相对主义并不起作用。反对禁止播放 De Puta Madre 的人很难说其对立者的观点与他们的观点一样立得住脚。因为这么做的话要求他们承认禁止电影的播放这件不合理的事情最终是合理的。同样，那些支持禁放的人如果接受其对立者的观点，就不得不放弃对这部电影的审查。

如果对立的双方都有一定道理的话，那么一定有他们共享的基础。但是，要找到这种共识却远非容易。

思考链接：

12. 海滩上的毕加索
37. 自然艺术家
66. 赝品
86. 为艺术而艺术

49

部分之和的漏洞

芭芭拉和沃莉跳上了牛津车站的一部的士。“我们赶时间，”芭芭拉对司机说，“我们刚刚逛完了伦敦，今天下午要赶往埃文河上游的斯特拉特福德。所以请拉着我们逛一圈校园，再把我们带回车站。”

的士司机暗笑了一下，打开了计价器，盘算着捞上一笔。

他带着她们把整个城市逛了一圈。让她们看了阿希莫林和皮特河博物馆、植物园、自然历史博物馆和科学历史博物馆。他的导游不仅包括了著名的牛津大学图书馆，还包括不太有名的拉德克利夫图书馆、塞克勒图书馆和泰勒图书馆。他带她们看了所有的39所学院，以及7个永久的私人会堂。最后的士停回车站的时候，计价器上显示的费用是64.30英镑。

“先生，你是一个骗子！”沃莉抗议道。“你带我们看了学院、图书馆和博物馆。可该死，我们想看的是大学！”

“可大学就是由学院、图书馆和博物馆组成的呀！”愤怒的司机答道。

“你以为我们会上当？”芭芭拉说，“别以为我们是美

国游客，我们就是傻瓜！"

资料来源：吉尔伯特·赖尔，《心的概念》，第一章，哈奇逊出版社，1949 年。



美国游客在英国的名声，常常被说成是吵闹的、无礼的和愚蠢的，这么说多少有点不公平。想一想，有多少英国游客愿意自己在 Costa del Sol 度假的行为被人评论呢？

这个小故事并不是针对美国人的，却可以被看作是一个让人警醒的例子，它告诉我们即使最聪明的头脑也会陷入一种错误的思维。芭芭拉和沃莉所犯的错误是牛津大学哲学家吉尔伯特·赖尔所称的范畴错误。她们认为牛津大学是和学院、图书馆、博物馆同类的事物：居于一座特殊建筑里的一个机构。但牛津大学却不是那样的。没有哪一个地方或哪一座建筑，你可以指着说，"这就是牛津大学"。就像的士司机所说的，牛津大学包括所有这些特殊的建筑和部分。

但这并不是说牛津大学是一种幽灵似的存在，它神秘地把所有学院、图书馆和博物馆连成了一体。这么想的话又犯了另一种范畴错误。它既不是一个单一的实体也不是某种非物质的存在。我们别被语言误导了，不要因为它是一个单数就想当然地把它当作一个单一的物体。

赖尔认为，我们对心灵最常见的思维方式也犯了类似的范畴错误。同样，心灵，也是一个单数，所以我们往往把它当作一个单

一实体。但如果我们这么想的话，我们将得到两个荒谬结论的其中之一。要么我们认为心灵就是大脑，这很荒谬，因为大脑包含大量区域和沟壑，而思想则不；要么我们认为心灵是某种非物质存在，我们的身体这部生理机器的一个幽灵。

一旦我们认识到心灵根本不是一个单一物体，我们就能避免给出这些荒谬答案中的任何一个。说某物有一个心灵等于说它盼望、欲求、理解、思考等等。正是因为所有这些事情，我们才说我们有心灵。但这并不需要我们把任何哪个物体指认为心灵。这跟说牛津大学是由学院、图书馆等组成的相比并非更神秘，尽管没有哪一个物体可以被叫做牛津大学。

这是对这个世纪难题一个巧妙的解答。不管它有没有，或者是不是瓦解了心灵的问题，范畴错误这个概念是防止语言和世界特征混淆的一件利器。

思考链接：

24. 方的圆

31. 仅此而已

62. 我思，故我在

83. 黄金法则

5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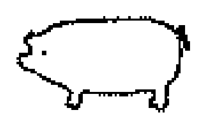
好的贿赂

首相喜欢把自己想象成一个“非常正直的人”。他的确十分厌恶官场中的腐败与色情现象，并致力于领导一个更廉洁守信的政府。

但是，最近发生的一件事使他陷入了困境之中。在英国政府的一次招待会上，一位以缺乏道德感（但没有官司缠身）著称的商人，把首相叫到一旁，悄悄地对着他的耳朵说：“很多人都不喜欢我，也不喜欢我经营的方式。对此我没有怨言。可让我烦恼的是因为我的名声，我不能得到我的国家的尊重。”

他接着说道：“我确定我们可以一起来对付此事。如果你能保证把我写进授予爵位的新年礼单里，我准备捐出1000万英镑用于解决非洲人民的饮用水问题。如果不行的话，我只能自己用这笔钱了。”

他拍了拍首相的后背，说“好好想想吧”，接着挤入了人群中。首相很清楚这是一起贿赂。可如果它的好处是如此显而易见，卖出国家的一项最高荣誉难道一定是错的吗？



对那些喜欢是非分明的人来说,有两种办法可以解决这个困境。采用一种狭义的功利主义的观点,道德上好的结果就是使大多数人受益的结果,那么显然首相应该接受这笔贿赂。这个道德计算相当简单:如果他接受了,将有成千上万的人可以喝上干净的水,一个有钱人将被称为"爵士",其代价不过是当人们看到一个伪君子被女皇授予爵位时激起的愤怒。

然而,如果你从正直的原则或从既定程序出发,那么同样显而易见的是首相应该拒绝这笔买卖。事情的进展应该遵从既定的程序。把头衔和荣誉授予有钱人,就算他们付的钱会产生一些好的结果,可它还是会破坏这条原则:依据美德而不是依据有没有钱支付来授予荣誉。

衡量这起困境的难处,你需要权衡双方的论证力度。既定的程序与法治的原则对任何一个民主的开放国家来说都是重要的,但是,如果让原则压过巨大的好处和轻微的坏处,恪守原则是不是有点傻,甚至不那么道德呢?

这个争论的核心是一种叫做道德放纵的现象。首相致力于领导一个廉洁的政府,而这就意味着让他自己远离任何腐败的污点。可是,在这个例子中,他想要自己双手干净的愿望可能会牺牲成百上千的非洲民众的利益,否则的话他们就能喝上干净的水了。所以对此的指责是,首相更看重的是自己的道德名声,而不是让这个世界变得更好。他对道德的渴望让他实际上做了不道德的事。这

就是一种道德放纵，它让其他人继续忍受疾病的折磨，走上几里去取水。

然而，首相也许能够意识到这一点，却仍有诸多保留。因为，如果在这件事上他允许自己这么做了，其他的腐败接踵而来怎么办？向选民们撒谎怎么样，如果这么做他可以赢得他们对一场正义战争的支持？镇压暴虐政府又如何，如果这样可以获取长期的地区稳定以及防止更坏的人攫取政权？如果只有最后的净收益对政治家而言是有意义的，他又如何坚持他的信念，做一个正直、守信和不腐败的领袖呢？或者这个观念整个就是个天真的幻想？

思考链接：

7. 没有赢家
79. 发条橙
83. 黄金法则
91. 无人受损，就可为恶

51

桶中之脑

自从车祸后，布赖恩就活在一个桶里。他的身体被碾碎了，但外科医生及时抢救了他的大脑。现在只要可能，就可以做这种大脑抢救手术，因此，一旦找到适合的捐赠人，布赖恩的大脑就能移植到所供躯体上。

但是，由于很少有大脑比躯体先死，因而等待新躯体就漫长得无法忍受；可是，摧毁大脑又被认为在伦理上不可接受。中国超级电脑 Mai Trikks 的出现，提供了一个解决办法。通过与大脑的电极连接，电脑可以为大脑提供刺激，使大脑产生一种幻觉，以为它还与活生生的躯体相连，居住在现实世界中。

在布赖恩的情形中，有一天他在医院病床上醒过来，被告知出了车祸，又进行了成功的躯体移植。于是，布赖恩继续过着正常生活。然而，事实上布赖恩自始至终都只是他原来的那个大脑，活在桶里，用管线与电脑相连。但是，布赖恩和你我一样有理由认为，自己生活在现实世界中。他，或我们，究竟如何才能得知事实的真相呢？

资料来源：笛卡儿，《第一沉思录》，1641 年；希拉里·普特南，《理性、真理与历史》，第一章，剑桥大学出版

社，1982 年；拉里·沃卓斯基、安迪·沃卓斯基导演，《黑客帝国》，1999 年；尼克·波斯特卢姆的模拟论证：www.simulation-argument.com。



我们是桶中之脑的可能性，为热门科幻电影《黑客帝国》提供了前提基础。在电影中，基努·李维斯扮演的英雄尼奥，虽然免遭丧失躯体的屈辱，但他的处境本质上和布赖恩相同。尼奥认为自己生活在现实世界之中，然而事实上，只不过是他的大脑被输入信息，使之产生这种幻觉而已。其实，尼奥处在豆荚之中，浸泡在一种羊膜液里。

我们可能是这种彻头彻尾幻觉的上当者，这种怀疑历史悠久。柏拉图的洞喻是早期先驱，笛卡儿系统的怀疑也是，他怀疑我们是否是在做梦，或是被强大的魔鬼欺骗。

然而，桶中大脑观念的巧妙之处，在于其真实性。桶中大脑被认为在科学上是完全可能的，这使得这种观点比幽灵般的魔鬼骗子的说法更可信。

事实上，最近甚至有观点指出，我们生活在虚拟现实环境中，这是完全可能的，但我们或许不是像桶中大脑，而是像人工创造的智能。这种观点认为，总有这么一天，我们或其他文明将能够创造出人工智能，以及让人工智能生活于其中的虚拟现实环境。进一步说，由于这些模拟世界不必像生物有机体那样，需要大量自然资源来维持运作，因此，能创造多少这样的环境，几乎是无限制的。

在未来，可能连相当于地球的整个行星，也都能在一台台式电脑中“生存”。

如果所有这些都是可能的，我们只需简单运算就能明白，我们有可能处于这样一个模拟世界中。我们可以这么说，伴随着整个人类历史进程(每个人类曾经生活过的)，存在着另外 9 个由电脑模拟创造的历史进程。虚拟的人和人类都会认为，自己是生物有机体；但是，其中有九成人是错误的。又由于我们无法得知自己是虚拟的人还是现实的人，那么，认为我们是现实的人，错误的可能性就为九成。换句话说，我们生活在某个类似黑客帝国的地方，比我们行走在现实的地球上，更有可能性。

大多数人觉得这个观点难以相信，但或许只是因为其结论太令人吃惊而已。我们要问的问题，不是这个论点听起来是否可信，而是其逻辑是否有错。而要识别其逻辑缺陷，如果不是不可能的任务的话，也是一个非常困难的任务。

思考链接：

1. 邪恶的魔鬼
28. 恐怖的情景
62. 我思，故我在
98. 体验机

52

数量还是质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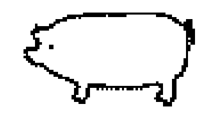
卡罗尔决定用她自己万贯家财中的一大笔钱，来改善坦桑尼亚南部一个赤贫村庄的生活。然而，由于她对生育控制计划有点保留意见，因此与她合作的发展部提出了两个实施方案。

第一个方案不涉及生育控制。可以预见，村庄人口将从 100 人增加到 150 人，而生活质量指数——评价客观因素也评价主观因素——将从平均 2.4 温和地上升到 3.2。

第二个方案包括了非强制性的生育控制计划。可以预见，人口将稳定在 100 人不变，但平均生活质量将上升到 4.0。

假定，只有那些生活质量指数在 1.0 或 1.0 以下的人，才认为他们的生活根本不值得过；那么，第一个方案将比第二个带来更多值得过的生命；反之，第二个方案虽然人口较少，但这些人会得到更多的满足。哪个方案将让卡罗尔的钱发挥最大作用呢？

资料来源：德瑞克·帕菲特，《理性与人》，第四部分，牛津大学出版社，1984 年。



卡罗尔的两难，并不只是一个在质量或数量之间选择的问题，因为当我们使用生活质量指数时，我们就是在将质量数量化，这跟它听上去那么复杂。

卡罗尔想达到的是什么目标呢？有三种可能的答案：第一，增加值得过的生命之数量；第二，增加生活质量之总量；第三，尽可能为最值得过的生命形式创造条件。

先让我们考虑第一项选择。很显然，如果她选择不控制生育的方案，结果将会产生更多值得过的生命。但这是一个可欲的结果吗？如果我们认为是，看来我们会得出一个荒谬的结论：因为既然除最惨的生活以外，所有生活都值得过，那么意味着，我们应当尽可能让更多人来到这个世上，只要他们的生活质量不在最低水平以下。但是，这真的是一件好事吗？举例来说，如果我们为了让更多值得过的生命来到这个世上而让英国的人口增加到原来的3倍，在此过程中，英国人却变穷了，这是一件好事吗？

第二个可能的目标是增加生活质量之总量。同样，第一个方案也能实现这个目标。虽然数学只能与现实相近似，我们也能够粗略地算出，过着3.2的生活质量的150人，生活质量总量合计为480“分”；而过着4.0的生活质量的100人，总量合计只为400“分”。因此第一个方案可获得较多的生活质量。

但这也会导致荒谬的结论。因为如果我们以这一点作为我们判断的根据，我们就应当认为，让1000人来到这个世上，生活质量

等级只有悲惨的 1.1 的预期，也比让 100 个人有着 10.0 的最高生活质量等级更好(这里使用的等级系统是虚构的)。

最后剩下第三种可能性：尽可能为最值得过且最令人满意的生活形式创造条件，不必为了使人口总量或生命质量总量最大化而担心。只有少数真正满意的人，也比许多几乎不能感到满意的人要好。

虽然这听起来是一个合理的结论，但这个结论在有关生命和伦理的其他更让人感到困惑的领域却有些意义。因为一旦我们说，为生命而创造更多生命毫无价值(即使这些生命将值得过)，那么，以早期胎儿形式存在的潜在生命就不再具有特别的价值。胎儿将长成一个值得过的生命这一事实，也不再是一个认为我们有道德义务来尽力确保它长成值得过的生命的理由。当然，许多人非常乐于接受这个结论；而那些不乐于接受的人，则必须问自己为什么不乐于接受的理由。

思考链接：

20. 诅咒生命
84. 快乐原则
87. 公平的不平等
98. 体验机

53

双重烦恼

“医生，你一定要帮我。我极度痛苦，并且我知道我快死了。让我解脱吧，请现在就快速又无痛地杀了我，我再也受不了了。”

“我是否可以这样直接理解，”海德医生答道，“你是建议我比方说为你注射大剂量止痛药——也许是20毫克硫酸盐吗啡——以至于让你很快失去意识并不久后死掉吗？”

“是的！请发发慈悲。”病人说。

“恐怕那不是我能够做的。”海德医生回答道，“不过，我能理解你很痛苦，因此我还能为你做些什么。为了减轻你的痛苦，我有必要为你注射大剂量的止痛药，比方说20毫克硫酸盐吗啡，但是，那样你将很快失去意识并不久后死去。这你听上去如何？”

“这听上去和你第一个建议一样。”困惑不解的病人回答道。

“哦？但这差别可大了！”医生回答道，“我第一个建议是我杀了你，而第二个是解除你的痛苦。我不是杀人犯，而且，安乐死在我国是非法的。”

“但是哪一种方式都是让我解脱。”病人反驳道。

“这没错，”医生说，“但是，只有一种方式让我解脱。”



海德医生对他两个特别相似的建议之间存在的差异之解释，可能看来只是诡辩：试图实现病人的愿望，同时又不侵犯法律。因为在许多国家，比如英国，故意缩短病人生命是违法的，即使病人处于极大痛苦中且要求死亡。然而，采取行动减少痛苦却是允许的，即使可以预见此举将加速死亡。因此，意图成为了问题的关键。产生相同后果的相同的行为——注射 20 毫克硫酸盐吗啡，如果意图是减轻痛苦，就是合法的，而如果意图是杀害，则是违法的。

这不只是法律的奇怪副产品。一个根植于天主教神学的古老道德原则，也支持这种区别。双重效果原则宣称，为了带来好的后果而做某事，即使你能预见这么做也会带来某种坏的后果，但只要意图是好的结果而不是坏的结果，这在道德上就是可接受的。关键在于，预见不等于意图，而重要的是意图。

由于这项原则看来像是为令人尴尬的道德选择开释的一种方式，因而可能获得坏名声。但是，如果认真对待，这项原则并非显然是用来开脱的狡辩条款。例如，我们倾向于假定，在海德医生的例子中，他真的想实现病人的愿望，因而只是寻求不违法的方式而已。但是，我们也必须认真对待这种可能性，即海德医生根本就不想杀死他的病人。不过，他为了追求减少痛苦这个高贵目标，即使他能明白这也将导致死亡，他还是不情愿地采取了这个行为。预

见与意图之间的不同，对于海德医生如何审视自己的良心，可能是非常重要的。

然而，挑剔的怀疑仍然存在，即认为就像我们对我们意图的事情有责任一样，我们对于自己预见的事情也有责任。如果我明知可能射杀过路人而用来福枪向森林射击，那么，如果我真的意外射杀某人，说由于杀人不是我的意图，我就没有道德责任，这是说不过去的。如果双重效果原则要得到辩护，就必须解释，为什么它也认为这种明目张胆的鲁莽行为不负道德责任。

思考链接：

15. 平凡的英雄主义
29. 生命依赖
71. 不能切断的维生设备
89. 杀少数人，还是让更多人死

54

难以捉摸的自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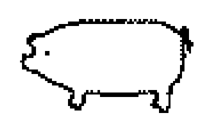
你可以在家里试试这件事，或在公交车上也行。在试这件事时，你可以闭上或睁开眼睛，可以呆在安静的房间里或喧闹的街道上。你所要做的就是：确认你自己。

我不是要你站起来说出自己的名字。我要你抓住你是哪一个人，而不只是理解你所做的事或经历的事。为了做这件事，你要全神贯注于你自己。设法在你自己的意识中找到你所是的“我”的位置，即那个感受冷暖、思考想法、听到周围声音等等的人。我不是要你找到你的情感、感觉和思想的位置，而是那个拥有这些东西的人，即自我的位置。

这听起来容易。毕竟，在这个世界上，有什么比你存在这一点更确定呢？即使你周遭的一切都是南柯一梦或太虚幻境，你也必须存在才能去梦想，去幻觉。因此，如果你将心灵转向内心去设法找到你自己，应该不要费很长时间。来吧，让我们试一试。

你的运气怎么样？找到了吗？

资料来源：大卫·休谟，《人性论》，第一卷（1739—1740）。



承认吧，你失败了。你寻找自己一直认为存在的东西，但一无所获。这意味着什么呢？难道是你不存在吗？

让我们搞清楚你会找到什么。当你认识到某件事物时，你所认识的总是相当特定的东西：一个想法、一种感情、一种感觉、一种声响、一种气味。但你绝不会以同样的方式认识你自己。你能描述你拥有的每个经验，但不能描述拥有这些经验的你。

但你或许会抗辩道，我怎会认识不到是我拥有这些经验呢？例如，的确，当我看着眼前的书时，我认识到的是这本书不是我；但在另一种意义上，我也认识到是我在看书。要把自我与经验分离开来，这是完全不可能的，这就是为什么没有关于我的特别认识，而只有关于我在认识这种认识的原因。然而，这并不是说"我"能从这个认识的综合体中排除出去。

这种说法可能听起来令人信服，但不会起什么作用：因为这个"我"不存在这个问题依然存在。这个"我"就像由此画出风景画的一个观看点。在某种意义上，这个观看点不能与这幅画分离开来，因为从某个特定观看点才能有这幅风景画，没有这个特定观看点，这幅画就不可能是现在这个样子。但是，这个特定观看点本身并不在画中展现出来。我们所知道的，这个特定观看点可能是长满草的小山丘，停泊的车辆，或是钢筋水泥的办公大楼。

拥有经验的自我能够以完全相同的方式来理解。确实，如果我看着眼前的书，我不仅认识到有一种视觉经验，而且还认识到这

是从某种观点获得的经验。但是，这种经验却不能展现这种观点的性质。因此，“我”仍然是一个空无，一个毫无内容的中心点，围绕这个中心点的，是如蝴蝶般翩然飞舞的经验。

根据这种观点，如果我们问自我是什么，答案是，它只不过是由于分享这同一个观点而被连接在一起的所有经验之和。自我不是一个东西，因而它当然不被它自己所知。我们不认识我们自己是什么，只认识我们经验了什么。这不意味着我们不存在，但它确实意味着我们缺乏一个不变的存在核心，一个不随时间变化的一致的自我。过去我们经常错误地以为，正是这个自我使得我们成为我们所是的个体。

思考链接：

56. 全景漩涡
62. 我思，故我在
65. 灵魂转世不变
88. 毁灭记忆

55

可持续发展

格林一家认识到，他们兴旺的机械化耕种事业要付出高昂的代价。因为他们的乡村农舍既做家用，也做商业宅基地。然而，当他们的耕种事业创造了丰厚利润的同时，由耕地上笨重机械带来的震动，却慢慢破坏了房屋结构。如果他们继续下去，五年之内就会让房子成为危房，他们也将被迫迁移。而他们获得的利润，却不足以买新的宅基地，也不足以对房子进行必要的修缮和结构改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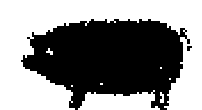
格林夫妇决定为孩子们保住这个家，因此，他们决定减缓生产，这也意味着减缓对房子的破坏速度。

十年后，格林夫妇去世，孩子们继承了这一片家产。然而，农舍也即将摇摇欲坠了。建造商来了，一边摇头一边说，要弄好的话，需要花一百万英镑。格林的小儿子——他曾多年担任自家会计——听后，愁眉紧锁，双手掩面。

“如果我们不为担心房子而全力生产，我们在五年前就有足够的钱弄好房子了。可现在，经过十年的低效率生产，我们将为修房子而变得分文不名。”

他父母当年试图保住这份遗产，可事实上，他们却毁了它。

资料来源：本卓恩·龙博格，《有问题的环保论者》，剑桥大学出版社，2001年。



这个故事可能只被当作关于商业中预先计划的一个教训，但它的深意不止于此，因为它可以被看作是反映了一个广受关注的严重困境：我们如何回应今天面临的环境威胁。

以气候变化为例。专家们一致认为，气候正在变化，而且可能是人为的。可是现在，我们还不能采取现实措施来完全阻止气候变化。比如，《京都议定书》也只不过将气候变化延缓六年左右。可是，光是美国用来执行《议定书》的费用，就相当于为全世界人口提供纯净饮用水所需要的费用。因此，你必须追问《京都议定书》的花费是否值得。

要点不在于，不执行《京都议定书》，美国就将实际上为所有人提供纯净水。在此，减慢速度防止气候变化与格林家减慢速度以防房屋倒塌类似。我们是否会以这样一种局面而告终？——为了减缓不可避免的局面，牺牲了经济增长，而这却剥夺了后代需要用来解决他们接过手的问题的资金。如果牺牲经济增长来延缓全球变暖，只是让我们在将来没有足够好的装备来应付变暖所带来的危害，那么，更好的选择是把全球变暖问题搁置一旁。

这不是说我们应当对全球变暖无所作为，只是说，我们要弄清

楚怎样做是最有效的，而不是无意之间黄土打个黑灶。这要求我们不只是考虑环境破坏不断扩大的问题，还要考虑下一代处理环境破坏不断扩大的能力。许多绿色运动人士试图不惜一切代价来避免环境破坏，不过，这和格林家不惜一切代价来减少对房屋破坏的做法一样短视。

这看上去是常识，可是，那些关怀环境的人士，出于三个理由，却对此说法有直觉上的讨厌。第一，这种说法暗示，在短期内，有时让地球污染变得更严重反而更好；第二，它强调经济增长在为解决环境问题提供资金上的作用，然而，对于许多绿色人士来说，强调财政和经济是很让其憎恶的；第三，这种说法与这个观念相关，即将来的科技将有助于解决环境问题，但是，在许多环保人士看来，科技正是我们问题的根源，而不是其解药。这三个理由或许能够解释，绿色人士为什么反对这种说法，但不能解释他们为什么应当反对这种说法。

思考链接：

10. 无知之幕
22. 救生艇
60. 要听我的话，别跟我的样
87. 公平的不平等

56

全景漩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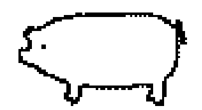
多年来，伊恩·费利尔一直梦想要建成全景漩涡。可现在，当他准备测试全景漩涡时，却怀疑这所有的努力是否是个可怕的错误。

在20世纪末，费利尔从广播节目播放的科幻小说中第一次听说这种机器。这部机器能使任何进入机器的人看到自己在宇宙中的真实地位。原著小说的观点是，任何使用这部机器的人都会发现自己毫无意义，这个事实是如此决定性的，以至于将摧毁使用者的灵魂。

在建造机器时，他推论道，由于我们每个人都一样无意义，因而费利尔误以为，每个人在全景漩涡中将看到相同的东西；但在整个计划中，他一直确信，这个机器根本不会摧毁他的灵魂。就像加缪笔下那个被罚去无止境地把巨石推上山又只是为了看着它一再滚下来的西绪福斯一样，费利尔也能够坦然面对自己毫无意义的荒谬，并且去战胜。

现在，费利尔即将测试机器了，可是他的确感觉到有点担心。他真的能够接受自己在茫茫宇宙中无限渺小的地位吗？要知道这一点，只有一种方法……

资料来源:道格拉斯·亚当斯,《宇宙尽头的旅馆》,潘氏书局,1980年。



作为思想实验,全景漩涡是矛盾的。一方面,它要我们想象进入漩涡将会是什么样子;但另一方面,这个假想装置的全部要点却是,我们不能想象它给我们显示什么。

不过,考虑这个漩涡可能有何效果还是有价值的。漩涡观念出自《银河系漫游指南》(The Hitchhiker's Guide to the Galaxy)。在这部电影中,的确有人从漩涡中生还。扎福德·毕波布罗克斯沉着地走出漩涡,说这部机器只是表明,他自己是一个多么"了不起的家伙"。可是,我们无法确定,毕波布罗克斯是否真的从机器中生还,也无法确定,他所看到的东西是否是关于他自己意义的一幅扭曲的画面。

毕波布罗克斯能够从漩涡中生还吗?为什么不可能呢?先让我们想想,某物具有价值或意义意味着什么。这完全是一个使用适当衡量标准的问题。在高尔夫友谊赛中有意义的东西,对于国际巡回赛却不具有任何意义;在美国公开赛上发生的事情,放在人类历史的进程中也毫无意义;而在地球上发生的一切,放在整个宇宙中又毫无意义。这些都是事实,但这并不表明,用来衡量事物意义或价值的唯一正确的标准,就是该事物对整个宇宙的影响。用这种方式来评判你的生命,并因此屈服于漩涡,只是用错误的尺子衡量你的生命而已。

还让我们想想，观察者的看法是多么重要。扎福德·毕波布罗克斯有个巨大的自我。面对漩涡，他所看到的，真的就是其他人所看到的吗？当其他人对他们无限渺小的地位感到失望时，相反，毕波布罗克斯惊叹对于自己的标准来讲，他自己是多么的重要。

这就是漩涡观念开始矛盾之处。人们认为，漩涡应当显示人们的意义，可是，意义并未显示出来。你可以表明某人在特定目标方面的重要性，就像美国职业运动中最有价值球员的排名显示人的重要性那样。可是，有多种测定我们重要性的方式，且哪种方式最重要，也并无客观标准。想想有多少人，只是为了与自己珍爱且珍爱自己的人在一起，就放弃了名声与财富。他们会在意他们的爱情在茫茫宇宙中毫无价值这一点吗？对他们来讲，爱情就是一切，而这就够了。

思考链接：

20. 诅咒生命

51. 桶中之脑

54. 难以捉摸的自我

62. 我思，故我在

57

吃掉家猫提德斯

“不浪费，不欠缺”，这是戴莉亚的座右铭。她对她父辈的节俭尊崇有加，他们就靠非常少的物资度过了二战和他们的大半生。她从父辈那儿学到了许多技术，比如如何剥兔子皮，以及如何用其内脏做好吃又简单的菜，她这个年龄的人，几乎没有谁会这些了。

有一天，她在位于豪斯洛郊外的半独立式房屋里，听到外面一声急刹车，跑出去一看，发现家猫提德斯被一辆小车撞死了。她的第一反应，不只是对猫的遗憾和难过，还想到其实用性——猫被撞得非常重，但是没有被碾过，实际上，它就是一块等待被吃的肉。

当晚，一盘气味刺鼻的炖猫肉端上了餐桌。这道菜是当今许多英国家庭都不吃的，但戴莉亚一家已经习惯于吃那些不再时新的肉。她告诉了丈夫所发生的一切，以及为什么会吃猫肉，当然，她和孩子们倒不用拐弯抹角的，直接命令他们吃。可最小的梅齐还是吃得极不情愿，并且隔着她那热气腾腾的饭碗，时不时对母亲投以责备的眼神。戴莉亚同情小梅齐的心情，但梅齐确实没有理由责怪她的妈妈做得不对。

资料来源：乔纳森·海蒂、西尔维亚·海伦娜·科勒、玛利亚·G.戴斯，"感情、文化与道德，或吃掉你的狗是错误的吗?"，载于《人格与社会心理学》，1973 年。

禁忌的力量是很强大的。在西方，就像在世界绝大多数地方一样，大多数人吃动物时根本没有道德上的不安。有时，他们吃的肉来自关在糟糕条件下的动物。而有些饲养场的动物，比如猪，甚至比许多家养宠物更聪明。

然而，吃某些肉却被看成是可憎的。许多英国人认为吃马肉或狗肉是残暴的，英国穆斯林则认为吃猪肉讨人嫌，吃宠物尤其被认为令人厌恶。而炖兔肉则是完全可接受的，只要它不是你给取了名字并养在兔箱里的宠物兔。

对于这些判断，有什么道德根据吗？还是只是文化上的条件反射式反应？假设你不是伦理的素食主义者(他们认为吃所有肉都是错误的)，就很难看出道德如何能反对吃肉。甚至在戴莉亚的例子中，吃掉家猫可能是更道德的。毕竟我们认为，当世上有如此多的人仍很穷时，随意浪费资源是不道德的。因此，如果吃肉没什么不对，且有肉可利用，那么，看来吃掉肉没错，反而丢掉肉才是错误的。根据这个理由，戴莉亚是道德英雄之一，因为她做了大多数其他人没有勇气去做的好事。

有人可能反驳道，吃宠物是对信任的背叛，人和动物之间的关系就是建立在这种信任之上的。你不会完全从朋友和保护者的身

份，突然转变为只注重实效的农夫吧！这种转变，不仅在心理上很难，而且也破坏了人类与动物关系的基础。

然而我们不难想象这样一种文明，在此，吃宠物，甚至吃朋友，都被看成是彼此关系的逻辑顶点。在菲利普·帕尔曼的《黑暗物质三部曲》中，披盔戴甲的熊王爱欧瑞克就是以吃掉朋友的方式，表达对死去的朋友李·斯科斯比的无限敬意。虽然该书的读者大多是小孩，但帕尔曼说，孩子们看来毫无困难地接受了熊王这么做的正常性。

因此，动物是朋友还是食物这个问题，也许只是提出了一个虚假的二分法。在道德上，吃掉我们死去的宠物是可以接受的，浪费不吃才是应受谴责的。

思考链接：

5. 一头想要被吃掉的猪
17. 选择拷打
35. 最后的诉求
91. 无人受损，就可为恶

58

神的旨意

上帝对哲学家说:“我是上帝,你的神,我命令你把你唯一的儿子作为牺牲奉献。”

哲学家回答道:“这似乎不太对吧,你的十诫之一就是说,‘不许杀人’。”

“上帝制定规则,上帝也可以取消规则。”上帝回答。

“但是,我怎么知道你是上帝呢?”哲学家抗辩道,“也许,你是想愚弄我的魔鬼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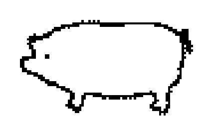
“你必须信仰我。”上帝回答。

“信仰——还是精神错乱?也许是我的心灵在开玩笑?或许是你在以一种欺诈的方式试探我。你想知道,我是否具有如此卑微的道德品质,以至于一听到一个云层中传来的嗡嗡的低沉之声,就杀掉自己的婴儿。”

“我是全能者!”上帝喊道,“难道你所说的是,你一个凡夫俗子,拒绝接受我——上帝和你的神——的命令是合理的吗?”

“我想是这样,”哲学家说,“并且,你并没有给我很好的理由来改变我的心意。”

资料来源:克尔凯郭尔,《恐惧与战栗》,1843年。



在《创世记》中，上帝找到了亚伯拉罕这个极为恭顺的仆人，他遵循上帝的教导去把儿子作为牺牲奉献，直到最后一刻，正当他准备手起刀落时，他被一个天使制止了。一直以来，亚伯拉罕就被作为信仰的典范受到表扬。

亚伯拉罕到底是怎么想的？让我们假设亚伯拉罕坚定信仰上帝且上帝也存在，请注意，这不是对其行为的无神论批判。然后，亚伯拉罕收到了上帝的指示，把儿子作为牺牲奉献。不过一听到命令就真的这么去做，他不是疯了吗？我们上面故事中哲学家所提出的所有问题，都适用于亚伯拉罕：可能不是上帝在说话，而是魔鬼在说话；亚伯拉罕可能疯了；这个检验是要看他是否会拒绝。这三种可能性似乎比上帝想要他儿子死的观点更合理，因为毕竟，慈爱的上帝怎么会命令这样一个残暴的行为呢？

在《创世记》中，与今天的信徒相比，人们看来与他们造物主之间有一种更直接的关系，上帝和亚伯拉罕这样的人对话，就好像他们真的坐在一起一样。在这样一个世界中，被教导的杀手身份是毫无怀疑的；但在我们所了解的世界中，没人能够如此确定他们真的听到上帝的话。即使他们能听到，仍不能确定这是否只是一个看亚伯拉罕是否会拒绝的试探。

这样看来，如果这真的是一个关于信仰本质的故事，它传递的信息是什么呢？信息不仅包括，有信仰的人应当遵守上帝的命令，不管这个命令多么令人不愉快，还包括有信仰的人永远也不确切

知道上帝的命令是什么。信仰并不是在我们受到召唤时才发挥作用，它总是被放在第一位的，尽管其本身缺乏证据支持。事实上，信仰有时要求虔敬者超越证据，相信那些与他们以往认为正确的和对的事物相反的东西，例如，上帝不赞成无意义的杀害*。

然而这不是经常在布道坛宣讲的信仰。布道坛宣讲的是，信仰是安定的磐石，能为信仰者提供一种平静和内心的确定性。然而，如果亚伯拉罕准备杀掉自己儿子而内心信仰平静，那么，他可能没有认识到，他以信仰的跳跃冒了多大一个风险。

如果你仍未被说服，请想想那些相信上帝希望他们成为自杀式肉弹，希望他们杀害妓女或迫害少数种族和异教徒的人。在你说上帝绝不会命令这样邪恶的事情之前，请回想一下三个亚伯拉罕式的信仰所信奉的上帝，他不仅命令亚伯拉罕把以撒作为牺牲奉献，而且宽恕那些强奸他人妻子的行为，只要是作为对她丈夫的惩罚（《撒母耳记》下，第 12 章），上帝命令杀死其他宗教的信奉者（《申命记》第 13 章），还判处以乱石砸死亵渎之人（《利未记》第 24 章）。看来，上帝可能命令的事情是无限制的，而有些信仰者将服从上帝的任何命令。

思考链接：

8. 善良的上帝
18. 理性的要求
34. 不要怪罪我
95. 恶的问题

---

* 这里指上帝让亚伯拉罕杀子一事违背了我们通常的是非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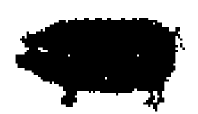
59

眼见为实

如果你能通过别人的眼睛看世界，你将看到什么？对于赛西莉亚来讲，这已经不是一个假设或隐喻的问题。她刚刚试用了不平常的 U-View 全球视觉资讯交换网，这个设施能让人与他人以这样一种方式联系，就是确切地看到他人所看到的东西，就好像自己看到的一样。

这对任何人都是一种不平常的经验，而对赛西莉亚来讲，甚至更是令人吃惊。因为当她看到她朋友卢克所看到的世界时，仿佛世界都是反过来的。对卢克来讲，西红柿是红色的，而她平常看到的是蓝色的；同样，她通过卢克看到的天空是红色的。当香蕉成熟时，她看到的居然是从黄色变为绿色。

当 U-View 的工作人员听到赛西莉亚的经验后，让她做了进一步的测试，结果得知，她是以他们所谓的反向光谱看世界：她所看到的颜色，就是别人看到的互补色。但是，由于这种差别是系统化的，因此，要不是有 U-View 系统，将永远没有人知道这种差别。毕竟，她像别人一样能够正确地说西红柿是红色的。



你可能像赛西莉亚一样看世界吗？如果我能通过你的眼睛看世界，我会认为你看到的落日是蓝色的吗？我们可能不会知道。因为无论你怎样看世界，只要你感官的色彩调配和我的一样正规，我们说的或感觉的就永远不会显示出差别。对我们两人来说，绿色会是青草、莴笋、豌豆和一美元纸币上的油墨的颜色；橘子是橘黄色的，发怒者眼中看到的是红色，而歌手眼中看到的是蓝色。

我们使用颜色词汇的准确性，完全取决于对公共对象的指称，而不是私人经验。蒙上双眼就想明白蓝色对你看上去是什么样，没门。假若我们的生理构造相似的话，我必须假设，在我们如何看晴朗夏日的天空方面，不存在太多的差别。

你也许会问，那么我们如何可能知道人们是色盲呢？这个问题的答案，支持而不是反对了这种情况：世上的赛西莉亚们，和我们相处而不会被我们识破。色盲是通过这样被发现的，他们不能辨别那些有完整色觉的人清楚地看到是不同的两种颜色。因此，举例来说，对于红绿色盲来讲，红色可能不再像对大多数人显示的那样，是一种和绿色背景不同的颜色。这个暴露色盲的测试，并没有考虑感觉经验的私人经验，它们只是判断人们是否具有就色差做出公共判断的能力。因此，只要某人能像其他人一样辨别色差，我们就不会知道，他看待颜色的方式和我们相比有什么变化。

人们可能以一种与我们不同的方式看世界（或者听世界、闻世

界、尝世界、触世界），这个事实并不是一个非常有趣的怀疑论的疑惑；也许更有趣的是，这种以不同方式看世界的可能性，就描述了我们精神生活的语言用法和语词意义，告诉了我们什么。简言之，看来像“红色的”这样的语词，并没有描述一种特定的视觉感受，只是描述了世界上的一种规律性，这种规律性与我们如何看世界的规律性是相符的。当我们说西红柿是红色的时候，“红色的”一词不是指称我们感知的颜色，而是指称了世界的一种特征，对于别人，这种特征也许显现得非常不同。这意味着，当赛西莉亚和卢克都说天空是蓝色的时候，二者都是正确的，即使他们看到的完全不同。

如果这种说法对于颜色是正确的，那它对于我们通常认为是内在的和私人的其他东西也正确吗？“疼痛”是一种感受，还是一种对感受的回应？当我说头痛时，我指称的是我头部不舒服的感受，我这样认为是错误的吗？这种说法彻底地改变了心灵语言吗？

思考链接：

13. 到处都是黑白红
21. 埃皮芬之地
41. 获取蓝色
73. 做一只蝙蝠

60

要听我的话，别跟我的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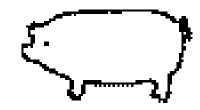
埃瑞娜·杰纳斯*正在准备一个关于飞行对全球变暖所产生的影响的演讲。她将告诉听众，一年之中的商务飞行所排入大气中的主要温室气体二氧化碳，甚至比非洲所有国家排放的还多。她还将告诉听众，一次远程飞行，比12个月的汽车旅行的污染还要严重。最后她将得出这么一个结论：如果我们想拯救地球，我们必须努力减少搭乘航班的次数，并且鼓励人们少旅行或利用其他交通方式。

正当她在想象自己的演讲将受到多么热烈的欢迎时，一位给她送酒的空中小姐打断了她。这是伪善吗？杰纳斯可不这么认为。因为她很清楚地知道，她自己的航班对环境的影响是微不足道的。即使她拒绝搭乘飞机，全球变暖也不会因此而减慢一秒。真正需要的是大众的改变和政策的改变。她的工作——满世界飞行去演说——也将为大众改变和政策改变做出部分贡献；而拒绝搭乘飞机，只不过是一种徒有其表的高姿态而已。

---

* 作者给故事主角取名叫杰纳斯也是很有意味的。杰纳斯是古罗马的门神，他具有正反两副面孔，用在这里暗指主角说一套做一套。——译者注

想到这，她心安理得地打开机上电影开始欣赏，可有意思的是，此时放映的正是《后天》。*



认为"每一点付出都有帮助"，这是令人鼓舞的，但真的是这样吗？这有赖于你从哪个角度看问题。例如，如果每个英国人都捐1英镑给慈善事业，加总起来将达到5600万英镑。从个人来讲，每个人做的都不多，但集合起来，就是一笔巨大的数目。但换个角度看，如果除一个人以外的所有人都捐了，总数将达到5599.9999万英镑，这个人拒给的这1英镑，对于将用这笔钱来干的事情来讲，意义并不大。

基于对这些事实的思考，人们完全能够合理地得出结论：我自己的贡献是微不足道的，因而不管我做或不做，关系都不大。但是我们也可得出结论：如果每个人都这样推理，关系就重大了。这是一个悖论吗？还是两种想法能够协调起来？

杰纳斯认为可以协调起来。你必须做的是说服其贡献真的有关系的许多人。如果足够多的人误以为这是真的，那么，我们就得到了我们想要的有利效果。这其实就相当于一个光荣的欺骗计划。个人的努力不起作用，只有集体的努力才起作用。但是，除非人们认为个人的努力有关系，否则，你就不可能攒足集体的努力。

---

* The Day After Tomorrow，2004年发行的美国电影。影片描绘了因温室效应造成气候异变，地球陷入第二次冰河世纪的故事，反映对环境恶化的强烈关注。——译者注

这个推理有些地方十分难以说服人，但却很难对它的逻辑挑出毛病。那么，为什么我们认为它是错误的呢？

一个可能的理由是，即使杰纳斯已经减轻了良心的不安，我们也觉得她是个伪善者，因为她自己所做的，与她要求我们做的正相反。但这一点还不能说明她关于个人努力的影响的推理是错的。因为如果她所关心的只是拯救地球，那她为飞行找到的理由就是完全合理的。然而，出于一个完全不同的理由，她选择飞行可能仍然是错的，那就是，做你告诉别人不应当做的事情，这是错误的。换句话说，她选择飞行错误的理由与环境无关，而是与这个伦理命令有关——就像你将某准则应用于别人的行为一样，你也要将同一个准则应用于你自己的行为。

这看上去能解决这个貌似的悖论。我们对飞行的共同爱好有害环境这一点是对的，因为所有少许的二氧化碳排放加总起来会很多；个人的飞行对环境的影响微不足道这一点也是对的，因为个人少许的二氧化碳排放关系不大。但还有一点也是对的，如果我们倡导一种减少二氧化碳排放的政策，我们不能让自己例外。我们不应当批评杰纳斯破坏地球环境，而是应当批评她不遵守她给别人的建议。当然，除非"要听我的话，别跟我的样"是一个非常合理的要求，我们就不应当批评她。

思考链接：

55. 可持续发展
82. 搭便车者
83. 黄金法则
91. 无人受损，就可为恶

61

月亮是个奶酪饼

月亮是由奶酪做的——精确地说，是莫扎瑞拉奶酪做的！我可是已经在自己的死刑执行令上签了字，才这么说的。你知道，为了不想让大家知道这个秘密，他们将宣称我疯了。但正如黑泽明说的，“在疯狂的世界里，只有疯子是健全的。”

“可是人类已经在月亮上走过了”，你说。错！登月整个就是一个骗局，是美国宇航局在摄影棚拍的。你不是看过《摩羯星一号》这部电影吗？要不是遭到律师的反对，该片就被当作纪录片发行了。

“但其他无人驾驶的太空船已经到过月球了。”这些绝大多数也是骗局。即使有些不是骗局，它们带回的样本也同样支持莫扎瑞拉理论，当然，这些证据是禁止发行的。

“但人们能够用望远镜看到月球啊。”是的，但你能告诉我，你能区分月亮是硬的石头还是软的奶酪吗？

“可如果这件事是真的，肯定早已泄露了。”如果保守秘密，也许可以获得可观的利益；而如果你不服从，则可能被杀掉，或者被当作一个疯子怀疑，那你愿意吗？

请想一想：如果没有源源不断供应的奶酪，猫王怎么可能在月球上活下去呢？



很疯狂是不是？但20%的美国人相信，从来没有发生过登月这回事，这又如何解释呢？难道他们也疯了吗？如果他们没疯，那是什么使得他们的信念是健全的（尽管是错误的），又是什么使得莫扎瑞拉月亮假说成为难以置信的低级噱头呢？

由于知识信息具有两个限定，因而使得阴谋论成为可能。第一个限定可以叫做理解的整体性质：我们对任何单个事物的信念，都是与许多其他信念网状联系的。例如，你关于冰激凌使人发胖的信念，就和你关于冰激凌的热量、脂肪摄入与体重增加的关系、营养学的可靠性等信念相联系。

第二个限定是被更堂皇地叫做"证据无法完全决定理论"（the under-determination of theory by evidence）的东西，用浅显的话来说，就意味着事实绝不能提供足够证据决定性地证明一个理论，且证明只有该理论是正确的。这种缺口——即别的理论正确的可能性——总是存在。这就是法院坚持证据只需要超出"合理怀疑"的原因，因为证据要超出所有怀疑是不可能的。

把这两个限定加在一起，即使最疯狂的阴谋论也有了发挥空间。尽管有压倒性的证据显示，月球就是一整块石头，但这个证据并不能"强迫"我们得出这个结论。证据的缺口意味着，我们甚至也能使这个证据与月亮是由奶酪做的这个假说相一致。我们所要

做的，就是重新安排我们理解之网中其他彼此关联的信念，使得它们也相符合。因此，需要重新评价望远镜的威力、腐败的程度，以及登月的真实性。

确实，你最后得到的结论可能听起来十分荒唐，但关键点在于，这个结论符合证据。这就是使得这么多人被阴谋论（以及关于宇宙本质的其他古怪观念）迷倒的东西。“完全符合证据”看来是让某个信念令人信服的理由，但问题是，别的不同理论也符合证据，包括月亮是奶酪做的这个观念。

那么，是什么东西使得一种理论比另一种更好呢？为什么进化论是合理的而登月却是荒谬的呢？这个问题并不容易回答，这也许能部分解释，为什么将近一半美国人认为进化论是一个低级噱头。我们能说的是，只是与证据相符合，并不足以让一种理论合理地令人信服。如果你相信只要符合证据就能让理论令人信服，那么，你也可能会接受，猫王此时正在以比萨为顶的天空中围着我们绕行。

思考链接：

1. 邪恶的魔鬼
3. 印度人与冰
19. 揭穿谎言
98. 体验机

62

我思，故我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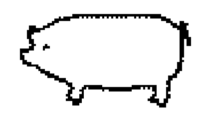
我叫雷内。我记得曾经读到过这种说法：如果有一件事情是我总能确定的，那就是我思故我在。如果我，大卫，正在思考，那为了思考继续进行，我必须存在。这是对的，不是吗？我可能是在做梦，可能疯了，可能根本就不住在汤顿*，但是，只要我在思考，我就知道我露西的存在。我发现这是令人安慰的。我在慕尼黑的生活可能非常有压力，但得知我能确定自我的存在，这让我安心很多。每天早晨散步在香榭丽舍大道，我常常发现自己怀疑现实世界是否存在。就像我认为的那样，我真的生活在夏洛特维尔**吗？朋友们对我说，"马德琳，你再这样猜测，会把自己弄疯的！"但我不认为我疯了。我在不确定的世界中找到了确定性，那就是，我思，故我在（Cogito ergo sum）。我，奈杰尔，思考，故我实际上是塞德里克。

资料来源：雷内·笛卡儿，《方法论》，1637 年，G. C. 李顿勃编译，卡尔公会发行，1971 年。

---

* Taunton，英国地名。

** Charlottesville，英国地名。



这篇独白是不是前言不搭后语？在某种意义上，的确如此。说话者不断改变名字，关于住处也前后矛盾。表面上，这篇独白一团糟。

然而，在一种更重要的意义上，它是完全连贯一致的。更具体地说，它与“我思故我在”的真理完全一致。笛卡儿首次写下这个命题，他用该命题来确定非物质的精神或自我的存在。但批评家说，在这么做时，他所主张的，并不只是他证明精神存在的论证。我们这个奇异的独白将说明原因。

关键点是，你从“我思故我在”得到的确定性，只在思考的那一刹那出现。为了有一种思想，确实必须得有一个拥有该思想的思想者，这的确是对的。但是，刹那间的确定性并不能说明，同一个思想者随着时间的流逝而不断存在，甚或也不能说明，他就是几分钟前拥有该思想的同一个人。事实上，该命题与这一说法相一致，即只有在他花来思考的那段时间里，思想者才进入存在状态。

这就是使得这篇独白有意义的原因。独白并不是一个连续的单一自我，而是一连串自我（这些自我轮流占据思想者的位置）的一系列想法。我们无需以玄妙的术语来思考这件事，只需思考一下具有急性多重人格紊乱的人就可以了。他轮流扮演不同的角色，快速演替，发出不同的声音。在他们每一个说“我思故我在”的时候，他们所说的都是绝对正确的；只是他们一说完，其存在不容置疑的“我”就消失了。也许，我们甚至可能碰到由上面独白最后

一句所描绘的这种情形，在此，第一个“我”的想法由第二个“我”来完成。

假若我们绝大多数人都不具有多重人格，这篇独白对我们有何意义？这篇独白的意义就是要表明，笛卡儿这句名言论证的东西，没有我们通常所理解的那么多。我们思考这个事实，可能显示我们存在，但至于我们是什么样的存在，我们是否作为同一个人随着时间的流逝而持续存在，却并不能从我们思考这个事实得知。我们从“我思故我在”获得确定性，但代价非常高昂：一旦走出思想发生的瞬间，我们获得的就是完全的不确定性。

思考链接：

3. 印度人与冰
28. 恐怖的情景
51. 桶中之脑
54. 难以捉摸的自我

63

我真的知道吗

这是一个非常奇怪的巧合。上周某一天，当内奥米在买咖啡时，她身后一个男子在掏口袋时掉出了他的钥匙串。内奥米捡起钥匙串，不经意间注意到有个小白兔悬挂在上面。当她把钥匙串还给那个人时，发现他有一张与众不同的脸，瘦削而苍白。他看上去有点局促不安，并且说，“我走到哪都带着它，出于怀念的理由。”他脸都红了，他们也没再说什么。

就在接下来的一天，当内奥米正准备过马路时，她听到了一声急刹车，紧接着是一声不祥的撞击声。几乎不假思索，她就和一群人被吸引到了车祸现场，就像铁屑被磁铁吸引一样。她想看看受害者是谁，结果看到了那张同样瘦削而苍白的脸。医生已经做了检查，宣布“他死了”。

警察要求她提供证词。“我所知道的就是，他昨天在咖啡店买了一杯咖啡，还有，他总是带着一个钥匙串，上面挂一只小白兔。”警察确认这两个事实都是真实的。

五天后，内奥米又排队等着买咖啡，当她转头发现有个看上去很像上次那个人的男子站在她身后时，她几乎尖叫起来。他注意到了她的惊愕，但好像并不对此感到

惊奇。“你认为我是我的双胞胎哥哥，对吗？”他问。内奥米点点头。“自从事故后，你并不是第一个有这种反应的人。我们两个都来这家咖啡店，但通常不一起来。”

他讲话时，内奥米忍不住盯着他手中的东西：钥匙串上的一只小白兔。那个人也没有因此而吃惊。“你了解母亲的，她们喜欢为小孩买同样的小东西。”

内奥米发现整件事令人惊惶。但当她最后冷静下来后，困扰她的问题是：她对警察说了实话吗？

资料来源：埃德蒙·盖蒂尔，“证明为真的信念是知识吗？”，再版于 A. P. 马提尼齐、D. 索萨主编的《分析哲学文集》，布莱克威尔出版社，2001 年。



内奥米对警察说的是，“我所知道的就是，他昨天在咖啡店买了一杯咖啡，还有，他总是带着一个钥匙串，上面挂一只小白兔。”这两个事实证明都是真实的。但是，说她知道这些事实是真的，这是对的吗？

许多哲学家指出，知识有三个条件。首先，要知道某事，你必须相信它是真的。如果你相信米兰是意大利首都，你就不可能认为罗马是意大利首都。第二，你相信的必须是真的。如果罗马是意大利首都，你就不可能认为米兰是意大利首都。第三，你的真实信念必须以某种方式被证明。如果你没有很好的理由，而只是碰巧相信罗马是意大利首都，即使结果你是对的，我们也不应当说你

拥有知识;你的对错只是幸运猜对而已。

关于死者,内奥米有两个真实信念。并且,她看来也能为坚持这两个信念提供理由。但是,她看来真的并不知道这些信念是真实的。内奥米不知道死者有个双胞胎兄弟,且他身上也带着相同的钥匙串。因此,如果死者是她在咖啡店看到的那个人的双胞胎兄弟,并且,如果他临死之前一天并没有去咖啡店,也没有带着相同的钥匙串,内奥米仍然会声称知道关于他的同样两件事情,只是这一次,她是错误的。

事实上,内奥米知道的并不多,即使到了现在,她还是不知道,车祸前一天在咖啡店看到的那个人,是在车祸中死去的那个人,还是五天后她在咖啡店看到的那个人。内奥米完全不知道谁是谁。

对这个问题,明显的解决方式看来是,我们必须紧扣"证明"这个观念。由于她对于声称知道关于那个死者两个事实所提供的证明不是足够有力,所以,内奥米不清楚谁是谁。但如果事情像这样,那么,我们必须要求,知识对所有信念的证明都必须有非常严格的条件。而这意味着,我们将发现,几乎所有我们认为知道的东西,都不能被充分证明为知识。如果内奥米真的不知道她认为她关于那个死者所知道的东西,那么,我们也真的不知道多少我们认为我们所知道的东西。

思考链接:

1. 邪恶的魔鬼
3. 印度人与冰
40. 摇摆木马的赢家
76. 装有芯片的大脑

64

扼杀于摇篮之中

总统降低语调说:“你所提议的是违法的。”

“确实如此,总统先生,”将军回答道,“但是你必须问自己,怎样最好地保护自己的国民。现在的情况很清楚:塔图姆不仅决定在自己国家着手种族清洗运动,也决定对我们发动军事进攻。我们的情报部门告诉我们,他的这个计划在国内几乎没什么人支持,如果我们干掉他,稳健得多的内斯塔将取代他。”

“话虽如此,但是你跟我们说要干掉他,你要知道,暗杀外国元首可是违反国际法的。”

将军叹息道:“可是我的总统先生,你必须明白你的选择是多么天真!一粒子弹,再加上善后的一些安全措施,就足够避免一场大规模的屠杀和可能发生的战争。我知道,你不想双手沾上外国元首的鲜血,但是,你乐意被他自己成千上万国民和你自己国民的鲜血所淹没吗?”



道德是一种比法律更高的权威。这就可以解释，为什么当国家法律明显不正义又没有法律途径可反对时，我们赞成公民不服从。关于什么样的特殊行动在非洲人民大会(African National Congress)反对种族隔离的斗争中是正当的，我们可能有分歧，但是，如果认为南非为黑人的合法抗议提供了充足的机会，那是可笑的。

不难想象这样一种情形，在此，违法才是正当的事情，比如，抢救生命比尊重车速限制更重要；你并不应当只是为了避免侵入民宅就放弃追捕嫌疑犯；偷窃比被饿死更好。

如果我们接受这些，那么，单凭总统被要求做的事情违背国际法这个事实，并不能决定他是否应当做这件事。真正的问题是，情况是否真的严重到如此地步？以至于不采取违法行动，就没有别的方法能避免可怕的后果。

如果将军的估算是正确的，那么，看来暗杀就是正当的。就像这个经常举的例子所说的，如果你知道希特勒长大后将做什么，为什么不杀死他于襁褓之中？如果不杀，那你为什么把他的生命，看得比在大屠杀中死去的600万犹太人的生命以及由他发动的战争中不计其数的其他生命更有价值？

然而，就像萨达姆·侯赛因的倒台所显示的，问题就出在情报部门远非确实可靠。事实是，虽然从事后来看，我们可能希望要是早点行动就好，但是，我们永远也不确切知道未来将发生什么。暗杀可能阻止了种族清洗和战争；但另一方面，它也可能激发更大的动荡不安，或者只是让另外一个元首来下令屠杀而已。非预期后果之法则(the law of unintended consequences)必须被尊重。

但是作为总统，不能只是耸耸肩膀说：事情该怎么样，就让它

怎么样吧(que sera, sera)。因为政治家的工作，就是在估算当前和未来最有可能发生的情况的基础上做决定。估算可能是错误的这个事实，并不是不作为的借口，因为决定从来不是基于绝对的确定性做出的，而是基于可能性做出的。

因此，这个两难仍然存在。如果塔图姆没有被暗杀，并且他像预期的那样进行种族清洗和军事进攻，那么，总统如此推脱就没什么说服力："是的，我知道那是可能的，但我不能确定，因此只能静观其变。"但同时，他也不能经常基于可能不可靠的情报就违反国际法。然而在现在这个特定情形中，他应该怎样做出决定呢？确实，这是个非常难做的决定！

思考链接：

9. 老大哥
36. 先发制人的正义
50. 好的贿赂
77. 替罪羊

65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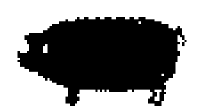
灵魂转世不变

自从记事以来，费思就相信灵魂转世。但最近，她对前世的兴趣又达到了一个新层次。她拜访了灵媒马乔里，第一次得到了一些关于前世人生的信息。

马乔里告诉费思，她的前世是一位生活在特洛伊战争时期的贵族女性，名叫苏思梅。费思从马乔里口中得知，苏思梅曾经大胆脱离特洛伊，先是逃到士麦那，然后抵达克诺索斯。苏思梅显然是个勇敢又美丽的女子，她在克诺索斯与一名斯巴达将军相恋了，并且与之共度余生。

费思并没查阅特洛伊的真实历史以检验马乔里口中的故事，也从未怀疑自己就是那个曾经寄居于苏思梅体内的灵魂；可是，她对于这一切所意味的东西却非常关心。虽然费思对于自己曾是希腊美女这个观点感到高兴，但是，由于完全不记得自己在克诺索斯生活的事情，也对于成为马乔里告诉她的那个人毫无感觉，因而她不能明白，她和苏思梅怎么会是一个人。关于自己的前世，她认识到了一些东西，但是，看来却根本不像她的人生。

资料来源：约翰·洛克，《人类理智研究》，第 2 卷，第 27 章，1706 年。



世上许多人相信各种形式的灵魂转世或再生。有很多理由可以说明，他们这样做是错误的。不过，让我们假设我们确实有灵魂，且确实是转世的，接下来会发生什么呢？

这是费思要解决的问题。尽管马乔里告诉她的故事有点可疑——为什么我们的前世总是一个有趣而强力的人，有着精彩的人生？——但是，费思并不怀疑其真实性。她要问的问题是：如果我确实和苏思梅拥有同一个灵魂，这就使我和她是同一个人吗？

费思直觉的回答是，"不是"。她对于成为和苏思梅相同的那个人毫无感觉。这并不令人惊奇。当我们回顾自己的过去（更不用说自己的前世）时，让我们觉得我们是同一个人的，是某种程度的心理连接和连续性。我们记得曾是那个人，做过那个人曾做过的事情，坚信那个人曾坚信的信念，等等。对于我们当前的自我是如何从那个人发展而来的，我们也有某种感觉。

可是，我们的灵魂是否真的寄居在别人前世身上，而我们却与他们并没有这样的心理连接？由于费思并不记得曾是苏思梅，也对于如何从苏思梅转世过来毫无感觉，因而马乔里需要告诉费思，苏思梅做过什么，想过什么。少了这些连接，即使苏思梅和费思真的共享同一个灵魂，我们怎么能够有意义地说她们是同一个人呢？

如果这些想法是正确的，那么，即使我们具有在肉体死后仍然

活着的灵魂，这也不意味着，我们将在肉体死后仍然活着。灵魂的持续存活，并不能保证自我的持续存活，就像不能保证心脏或其他组织器官的持续存活一样。

但现在让我们考虑一下，当你看到自己婴儿时期的照片，感觉怎样呢？为了知道那个婴儿是怎样的，你通常需要问那些当时的成人，他们还要记得才行。你问他们："我当时是怎样的？"就像费思问马乔里："我在特洛伊时是怎样的？"你与那个蹒跚学步的小孩的心理联系可能非常弱，以至于几乎没什么联系。这是否意味着，在某种非常现实的意义上，你和你婴儿时期的自我不是同一个人？就像费思与苏思梅不是同一个人一样。

思考链接：

2. 光纤传送
38. 我是一个大脑
54. 难以捉摸的自我
88. 毁灭记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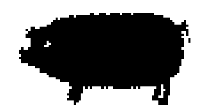
66

赝　品

《破晓的白杨路》被列为梵高的杰作。这幅“丢失的”作品将卖到百万高价，并且也将引起学术界拿它来与梵高另外两幅在不同时期对同一风景所作的画进行比较。

这让乔里斯·范登博格很高兴，因为是他而不是梵高画了《破晓的白杨路》这幅画。乔里斯是一位伪造专家，他确定自己最新的创作将被鉴定为真品。这不仅极大地增加其财富，也极大地给他带来专业上的满足感。

只有几个好友知道乔里斯从事的是什么。一个朋友还对其行为表达了非常严重的道德疑虑，不过，乔里斯对此疑虑断然否定。他所关心的是，如果这幅画被鉴定为和梵高的原作一样好，那么，人们为它付的每一分钱都是值得的。如果只是由于一幅画是梵高原作就为之付出高于其真正所值的价钱，那么，这样的人就是一个傻蛋，损失钱财也是罪有应得。



伪造决不是道德的职业，这看来是明显的，因为它不可避免涉及欺骗：只有在他能够在其作品的真实性方面故意欺骗人们时，伪造者才会成功。

然而，欺骗并非总是值得谴责。事实上，有时候公然说谎可能正是道德所要求的。如果一个种族主义暴徒，抱定决心要施暴，他问你是否知道"外族人"住在哪里，你最好表示不知道，而不是把他们带往 23 号房间。因此，看来要紧的是，说谎是为高贵的还是卑劣的目的服务，以及欺骗的广泛后果是什么。

伪造者的目的看来决不单纯是为自己赚很多钱。不过，即使真诚的艺术家也可能至少有部分动机是为了赚钱，因此，赚钱本身并不能说明问题。如果我们要评价伪造艺术品，我们需要从更宽广的视野来看。

在上面虚构的故事中，乔里斯·范登博格提出了一种值得赞扬的方式来为自己的伪造辩护。用有点高尚的术语说，伪造者事实上是在做贡献，他们提醒我们艺术品的价值，嘲弄艺术品市场以经济价值代替美学价值的做法。在此，关键点是伪造者能够以两种方式获得成功：他能够创造出和他模仿的大师的艺术品一样优秀的作品；或者他能够创造出伪作，这件伪作只是由于被认为是著名艺术家的作品就被认为价值连城。如果伪作确实和成名艺术家的作品一样优秀，为什么它不应当得到相应的评价？如果伪作不是同样优秀，那我们需要问的是，为什么人们为劣质品付高价？是因为艺术品市场的价格不是由美学价值决定而是由时尚、名望和名人决定的吗？确实，梵高的签名为其画作增值，就像贝克汉姆的签名为其足球衫增值一样。如果这是一个事实，那么，抗议这样一个本来就以次充好的生意场可能被伪造者的作品弄得不那么纯

粹，就是多此一举。

以这种见解看来，伪造者可以被看作是一类游击艺术家，他们在艺术被贬低和商品化的文化中，为创造性的真正价值而战斗。不错，他们是骗子，但游击战不可能以公开的方式发动。必须从内部，体系才能被一片片撕裂。只有当每一件艺术品都根据自身价值而不是角落的签名得到评价时，这场游击战才能获胜。换句话说，除非有人能提供很好的理由让人相信，签名的确很要紧，否则，游击战将继续下去……

思考链接：

12. 海滩上的毕加索
37. 自然艺术家
48. 邪恶的天才
86. 为艺术而艺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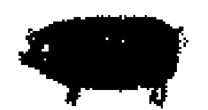
67

印度抛饼悖论

在生老病死的故事天天上演的世界，把一份印度抛饼（咖喱面包片）端上桌，很难算得上最引人注目的事情。但是，这件事却给沙思基亚带来某种深刻改变其思考方式的心灵震动。

问题是，端抛饼上来的服务生不是印度人，而是白种盎格鲁—撒克逊人。这让她很不安。因为对沙思基亚来讲，外出享受一顿咖喱餐的快乐之一，就是你在品味一种外国文化的那种感觉。就算服务生为她端上牛排和腰子排，也并不比他的肤色让她觉得不适宜。

然而，沙思基亚想得越多，就越不明白。她自认为自己是一个多元文化主义者。那就是说，她确实喜爱多民族社会所维持的文化多样性。但是，她的喜爱有赖于他人保持民族上的差异性。只有当他人紧紧地根植于某一种文化当中时，她才能在许多不同的文化之间享受一种多元变换的生活。所以她要成为一个多元文化主义者，别人就必须成为单一文化主义者。这样的话，她的多元文化社会理想何处可以实现呢？



沙思基亚感到不舒服，这是正常的，因为自由主义的多元文化主义存在一个核心问题：它主张尊重别的文化，但它最重视的，是超越一种文化而尊重多种文化的能力。这为其尊重的范围设置了一个很大的限制。理想的人是这样一个多元文化主义者：他能参观清真寺，阅读印度教经文，并践行佛教冥想。那些归属于一种传统的人，不能体现这些理想典型；因此，尽管说要“尊重”别的文化，这种单一文化中的人也只能被看作比心胸开放的多元文化主义者低等。

这里有某种叫做动物园心态（zoo mentality）的东西。多元文化主义者想到处走走，赞美不同地方的不同生活方式，但是，他能够这样做的前提是，不同的生活方式或多或少保持不变。因此，社会中的不同的亚文化就像笼子，如果太多的人从笼子走出走进，那么，多元文化主义者就变得不那么有兴趣去指指点点和报以微笑了。如果每个人都在文化上和他们一样混杂，就不会有那么多真正的多样性以供陶醉。因此，多元文化主义者必须保持为仅是寄居在内在同质的单一文化中的少数精英。

有人可能说，成为一个多元文化主义者的同时归属于一种特定文化，这是可能的。某些虔诚的穆斯林或基督徒就是范例，他们尽管对自己的信仰坚定不移，但仍然对别的宗教和信仰体系完全地尊敬，并且始终愿意向它们学习。

然而，宽容和尊敬别的文化，并不等于平等重视所有文化。对

多元文化主义者来说，最好的观点是那种理解所有文化中的优点的观点。但一个多元文化主义者，不能是一个坚定的基督徒、穆斯林、犹太教徒、甚或无神论者，并且真诚地信奉这些教义。人们可能对别的文化宽容甚或尊重，但如果一个基督徒真的相信伊斯兰教和基督教一样有价值，他又何必成为一个基督徒？

这就是多元文化主义者的两难。你可能拥有一个多种文化彼此尊重的社会，如果你想的话，也可以叫它多元文化社会。但如果你想支持这样一种多元文化主义，它重视多样性本身，并且认为所有文化都有平等价值，那么，你要么必须接受这一点，即那些只是生活在一种文化中的人的生活方式是低级的——这看来违反了尊重所有文化的观点；你要么必须赞成消融截然不同的文化之间的区分，因而人们越来越多地重视他人的文化——这将导致你声称本身有价值的多样性种类的减少。

在我们具体的例子中，沙思基亚要继续享受文化多样性的话，就必定希望其他人不要和她那样完全坚持多元文化主义。

思考链接：

10. 无知之幕
55. 可持续发展
82. 搭便车者
84. 快乐原则

68

不可思议的疼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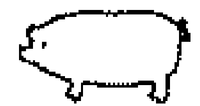
车祸给大卫造成了一种极罕见的大脑损伤。如果你抓、刺、踢他，他都感觉不到痛；但如果他看到许多带有味道的黄色橡树、听到歌剧歌手唱到 C 高音、自己不自觉地讲出双关语、或是想起一些明显随机的经验，他就会感到痛，有时甚至是剧痛。

不仅如此，大卫还根本不觉得疼痛这种感觉令人难受。他不会有意寻找疼痛，但也不会努力去避免疼痛。这意味着大卫不会以寻常的方式表现他的疼痛，例如喊叫或扭动身体。大卫疼痛时唯一的生理体征是不自觉地痉挛：他的肩膀会耸动、眉毛快速地上下跳动；或是手肘内外拍打，使他看起来就像一只鸡。

然而，大卫的神经科医生对此深感怀疑。他所理解的是，大卫不再像以前那样感受疼痛了，但是，不管当他看到"太多黄色"时的感受是什么，那种感受不会是疼痛。因为按照定义，疼痛是一种人们都尽力避免的、令人难受的感受。也许，大卫的大脑损伤使他忘记了真正的疼痛是什么感觉。

资料来源：大卫・刘易斯，"不可思议的疼痛与火星

人的疼痛"，载于内德·布洛克主编的《心灵哲学读物》第一卷，哈佛大学出版社，1980年。



心灵哲学家们对疼痛颇感兴趣。他们对主观经验的性质，以及主观经验与客观知识的关系有着强烈兴趣，而最主观且同时又最真实的主观经验，就莫过于疼痛了。关于这一点，只要问问患过牙痛的人就知道了。同时，我们通常十分容易看出某人是否处于疼痛之中。不像其他精神活动，比如想起企鹅，疼痛不仅影响我们的内在经验，也影响我们的外在行为。

因此，如果你想了解具有一种主观经验意味着什么，疼痛就是最佳的研究案例。大卫"不可思议的疼痛"的故事，尝试解释与疼痛相关的变量，看看哪个变量是基本的，哪个变量是次要的。三个主要的变量是：私人主观经验、典型起因以及行为反应。不可思议的疼痛只和一般疼痛具有相同的主观经验；它的起因和反应则完全不同。如果把不可思议的疼痛描述为疼痛也仍然是正确的，那我们就可以得出结论，疼痛的主观感受才是疼痛的基本方面；疼痛的起因和反应只是次要的方面，因而可能每次疼痛的起因和反应都不同。

对于疼痛并没有意义明确的常识。一方面，说疼痛本质上是一种主观感受，这看来是显而易见的常识。只有哲学家和心理学家才会严肃地建议，根据刺激－反应或脑部功能来界定疼痛可能更好。但另一方面，常识也会说，如果有人根本就不在意具有疼痛

这种主观经验，这种经验也没有引起不安，那么，它根本就不是疼痛。这意味着大卫的故事是前后矛盾的：不管他坚持哪种常识，他都根本就不可能感觉到疼痛。他的神经科医生的怀疑是恰当的。毕竟，我们只能依据大卫的话来判断，但我们为什么要相信，大卫辨识自己内在感受的能力，与他未出车祸前所具有的能力相同呢？

然而，问题的要点与内在和外在之间的关系相关。我们似乎可以毫不费劲地说，应当根据受痛之人如何感觉疼痛来界定疼痛，且如何感觉疼痛又与避免疼痛和痛苦表情等行为具有基本的关联。但是，这个结论下得太快了。因为如果疼痛真是一种感受，那为什么少了相关的行为，就不可能体验疼痛？只说疼痛必定以某种方式表现自己是毫无用处的；你必须说明疼痛为什么必定如此表现。直到你能说明这一点之前，不可思议的疼痛都是可能的。

思考链接：

23. 盒子里的甲虫
26. 疼痛的残余
32. 解放西蒙
39. 中国式话亭

69

可怕的人生

“可怕啊！可怕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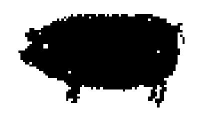
许多人猜测是什么激发库尔茨上校说出这些著名的临终之言。答案在于，他在咽下最后一口气之前明白了什么。在那一刻，库尔茨认识到过去、现在和未来都是幻觉，没有哪一刻曾经消失过，发生的每件事情也都永远存在。

这意味着他即将到来的死亡并不是终点；他曾经经历的人生，也将永远存在。因此，在某种意义上，他曾经经历的人生将反复经历、永恒轮回，每次都一样，因而没有希望吸取教训、改变或补偿过去的过失。

假若库尔茨成功地度过了一生，就能忍受这种认识。他审视自己的工作，认为“做得不错”，并且在对死亡的胜利中安详地走向坟墓。他对死亡怀着恐惧这个事实，证明他未能克服人生重来的挑战。

“可怕啊！可怕啊！”对永恒轮回这种想法，你会有不同反应吗？

资料来源：弗里德里希·尼采，《查拉斯图特拉如是说》，1891 年；约瑟夫·康拉德，《黑暗之心》，1902 年。



作为文学批评与形上学，约瑟夫·康拉德在《黑暗之心》中关于库尔茨临终之言的这个解释，好说是完全的思辨，而歹说则是纯粹的捏造。我尚未看到有文本证实，这就是我们应当理解库尔茨谜一般的临终之言的方式。至于“永恒轮回”的观念，虽然表面上尼采热诚地信仰它，但大多数评论家都不认为这个观念标记了尼采的鼎盛时期。

尽管如此，永恒轮回以及我们如何对其做出反应的假设，仍是检视自我的有趣设计。即使我们的生命并非注定要无穷重复，但对于尼采来讲，我们能否忍受生命将永恒轮回这种想法，就是对我们是否已经“征服”生命的一个检测。只有“超人”，他完全自我掌控自身命运，才能以足够的满足感审视自己的人生，以至于接受人生的永恒轮回。

重要的是要记住，尼采所说的“永恒轮回”，并不是《土拨鼠之日》* 中的那种永恒轮回。在那部电影中，比尔·默里发现自己反复地过着同一天，但每时每刻都有机会去做不同的事。因此，他有

---

* Groundhog Day，20 世纪 90 年代由哈罗德·雷米斯导演，比尔·默里和安迪·麦克道威尔主演的喜剧片。电影讲述比尔·默里饰演的男主角菲尔原是尖酸刻薄的电视台气象播报员，他在采访土拨鼠节时荒谬地陷入了时光停滞的状态之中，每天不断重复着同样的生活，令他烦恼得要寻死，但怎样也死不掉。于是他反过来修心养性，改善人际关系，竟然变成了一个广受欢迎的好人，与由安迪·麦克道威尔饰演的制作人丽塔之间的爱情也修成了正果。香港译作《偷天情缘》，台湾译作《今天暂时停止》。——译者注

得救的可能性、逃离周而复始的可能性，最终学会了如何去爱。尼采的重现形式是这种形式，人们没有认识到自己在反复做同样的事，且没有机会以不同的方式做这件事。生活是完全相同的，反复地活下去。

当尼采说只有从不存在的超人才能接受永恒轮回时，他可能有点夸张。事实上，有多少人——甚至那些在阴间走了一遭的人——敢说："假如我可以重来，我将再次做完全同样的事，我不会改变一丁点。"这是有趣的。在表面上，这直接同尼采关于永恒轮回不可忍受的这个主张相矛盾。然而，也许错的人不是尼采，而是那些高兴地接受他们过去错误的人。因为当我们真的试着想象我们过去的糟糕体验、犯下的可怕错误、所做的伤天害理的事情以及遭受的耻辱时，难道它们不是不可忍受的痛苦吗？难道不是只是由于缺乏想象力，或者至少抑制痛苦记忆的能力，才让我们未被过去的"可怕东西"征服吗？即使没有保护我们免受回忆之苦的有色眼镜和过滤器，超人也接受重现的观念。这是尼采相信超人如此稀少的原因，也是我们其余人一想到历史本身一而再、再而三重复就会像库尔茨那样反应的原因。

思考链接：

20. 诅咒生命
34. 不要怪罪我
65. 灵魂转世不变
88. 毁灭记忆

70

突击检查悖论

卫生检查员来到艾米利欧的比萨店，并立即查封了他的店铺，而事先没有哪个朋友相信他就让事情如此发生了。他们说，毕竟知道检查员要来，他为什么不把店铺打扫干净呢？

艾米利欧的回答很天真。他已经被告知，检查员会在月底前某一天前来突击检查。艾米利欧就坐下来想检查员会在哪一天来。不可能是在31日：如果检查员在31日之前都没有来，就只可能在那一天来，而这样的话就不是突击。如果31日已经排除了，那么，出于同样的理由，也要排除30日。检查不可能是在31日，那么，如果到29日还没有检查，就只剩下30日了，而这样的话，也就不是突击了。然后，出于同样的理由，如果检查不会在30日或31日，那么也不会在29日。一直往回推，艾米利欧最后得出结论：哪一天都不会有检查。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得出突击检查不可能的结论之后，有一天检查员破门而入，艾米利欧还是极不舒服地被突击了。他的推理有什么不对呢？

资料来源：广受争论的"突击检查悖论"来自于战时瑞典的无线电广播节目。



对这个难题的简短回答是，在日常生活中，人们在用词上不会像逻辑学家那样精确。检查员所说的"突击"，只是指他们不会预先告知艾米利欧会在哪一天检查。如果等到31日，只剩下一天了，那这个检查就不可能是一个完全的"突击"，仅此而已。

许多哲学家会说，这是个无趣的回答，因为它并没有解决问题，只是让这个问题在日常语言的迷糊汤里变得模糊不清。但我认为，哲学家的这种反应有点苛刻。这一点总是值得我们记住的：我们有时也需要语言的含糊与灰色地带来理解世界，即使在另一些场合，这些不精确可能妨碍我们的理解。

不过，这个回答确实没有解决这个难题。假设精确地理解突击检查的约定，那么，任何作为结果而发生的检查，就像31日发生的检查，都不是突击，而这就与突击检查的约定相矛盾。

也许，突击检查这个观念本身就有矛盾。经过观察，艾米利欧的推理很完美，而且他的结论也是正确的：不可能有突击检查。因此，不蕴涵某种矛盾，就不可能预先宣布突击检查。

这种解决看上去很巧妙，但显而易见突击检查是可能存在的，艾米利欧为此付出了惨痛的代价，事实本身削弱了这个解决提案。因此，艾米利欧在突击检查到来之前做的那个推理若不是蕴涵着某种矛盾是不可能得出的。

还有一种吊诡的可能性在于，做推理的这个艾米利欧偷换了突击之源。例如，到 29 日，艾米利欧将得出结论：30 日或 31 日不会有突击检查；但这仍然意味着，在剩下两天中的任一天，都可能会有检查，尽管不是突击的意味不明显。并且，既然他不知道两天中的哪一天会有检查，那么，如果 30 日检查，这个检查还是一个突击。

即使 31 日检查，也是一个突击。因为艾米利欧已经得出结论：那一天不可能有突击检查；而如果仍然有检查的话，对他而言，就是一个突击。

然而，也许最令人惊讶的是，这个难题看似只是个语言把戏，但在逻辑上却比初看起来的要复杂得多。

思考链接：

16. 比赛中的龟
25. 布莱登的难题
42. 拿了钱就跑
94. 连锁推理悖论

71

不能切断的维生设备

格雷医生非常沮丧。他一个临终病人一直都靠维生设备维持着，在她最后一次失去意识之前，病人一再要求切断设备电源，可医院伦理委员会已经规定，采取任何行为故意缩短病人生命都是错误的。

格雷不同意委员会的决定，并且为病人的意愿被忽视感到不安。他也认为，依靠设备拖延死亡，只是拖延病人亲朋好友的痛苦而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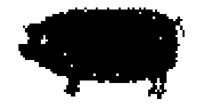
格雷站在病床边，悲哀地看着病人。但就在此时，意想不到的事情发生了。一位医院清洁员意外绊到了维生设备的电源线，并使之从插座板上拔了出来。设备发出哔哔的警报声，清洁员被警报声吓得手足无措，望着旁边的格雷医生寻求指示。

"不用担心，"格雷毫不犹豫地说，"不用动它，一切良好。"

对格雷来说，现在的确一切良好，因为没有人采取了故意行为来缩短病人的生命。他所做的，是不理会意外拔出插头的设备而让它关掉，而不是采取任何行为去延长设备的使用。现在，他得到了想要的结果，又没有违背

伦理委员会的规定。

资料来源：乔纳森·格洛夫，《致死与救命》，企鹅书局，1977年。



在杀人与任其死亡之间，有着明显的差别，但是，这种差别在道德上有重大意义吗？如果在这两种情形中，死亡都是一个深思熟虑的决定的结果，是经过预谋的，那么，做决定的人难道不是同样该受责备吗？

在格雷医生的例子中，要在杀人与任其死亡之间做出严格区分，看来有点奇怪。他早就想关掉维生设备的开关，让病人死去；在事实上，他只是没有把设备重新插上，但他有和杀人同样的动机，并带来了让人死掉这个相同的后果。如果采取行动让病人死亡是错误的，那么，不采取轻而易举的行动防止病人死亡也一定同样是错误的吗？或者倒过来说，如果让病人死亡在道德上是无可非议的，那么，关掉维生设备也一定同样是无可非议的。

然而，关于安乐死的法律确实严格区分了杀人和任其死亡，而这带来了一些奇怪的后果：医生可以停止喂食永久性植物人，让病人饿死，但医生不能注射致命药物，让病人迅速死亡。在两种情形中，病人都没有意识，也不会受苦。可是，我们很难明白，饿死为何被认为比快速无痛死亡更具有伦理上的优先性。

有人可能认为，虽然在杀人和任其死亡之间，并不总是存在道德意义重大的差别，但是出于法律和社会的理由，不允许任何故意

杀人是非常重要的。在杀人与任其死亡之间，就如这个维生设备情形所显示的，存在某些伦理上的灰色地带，但社会需要规则，杀人与任其死亡之间的分界线，正是划定界限最佳、最分明的地方。在一些疑难情形中，这可能意味着我们会有不令人满意的结果，就如在格雷医生的病人的情形中。然而，这总比为医生打开故意杀人之门要好。

可是，如果既然已经假定杀人和任其死亡之间的差别是区分对病人的伦理对待和非伦理对待的最佳方式，那么，这个论证就是回避了如下问题：为什么不把那些使痛苦最小化、尊重病人意愿的原则作为基本原则呢？

不论我们得出什么结论，从伦理学的角度看，格雷医生的例子表明，杀人与任其死亡之间的区分，远非毫无问题。

思考链接：

15. 平凡的英雄主义
29. 生命依赖
53. 双重烦恼
89. 杀少数人，还是让更多人死

7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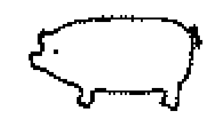
解放鹦鹉波西

“根据欧洲人权公约第四条第一款，即‘任何人都不应当被奴役’，今天，我要采取行动指控我所谓的主人波利先生。

“自从我被波利先生从委内瑞拉抓来以后，我的意愿就一直被违背，没有自己的金钱或财产。这难道也对吗？我也是人，像你们一样，也知道痛楚，有计划，有梦想，能说话，会推理，有感觉。你们不会以对待我的方式对待你们自己，可你们为何让我遭受如此明目张胆的虐待呢？

“我听到的回答是：‘因为你是只鹦鹉，波西。’是的，我的确是只鹦鹉。尽管你们的公约是关于人权的，满纸谈的都是‘每一个’有权怎么样，而‘每一个’就意味着‘所有人’，可是，人是什么？过去一直认为，只有白人才真正是人，现在，至少这种偏见已经被打破了。无疑，人是会思考有理智的存在，他们会推理，能反思，也有自我意识。在此意义上，我也是一个人！仅仅根据我所属的物种就否定我的自由，这是一个和种族主义一样不可辩护的偏见！”

资料来源：约翰·洛克，《人类理智论》，第2卷，第27章，1706年。



听多了关于生物学的乐观主义和悲观主义的言论后，你可能也逐渐相信，出现波西这样的鹦鹉已经为期不远了。谁知道基因工程技术什么时候会培育出高智商的鹦鹉来呢？也许还可能培育出高智商的黑猩猩。

万一我们真能培育出高智商的动物来，我们所造的就是人吗？“人”与“人类”这个范畴并不一样，后者是对一个生物物种的概括，而前者明显不那么有生理学意义上的物种意味。想想我们对科幻小说中的外星智慧生命——比如《星际旅行》* 中的克林贡人——是如何反应的。说“他们也是人”，看来不仅是合理的，而且是正确的，相反，如果说“他们也是人类”就是错误的。

从道德观来看，哪个范畴更重要呢？想想拷问克林贡人的道德性。“拷问他没问题，因为他不是人类”，在我看来，这样的说法在道德上是无耻的，而“别这样，他也是人”这样的说法看来在道德上是公正的。

如果这种推理思路是正确的，那我们不仅应当让波西自由飞翔，而且应当重新思考我们对自己和其他动物的看法。首先，因为我们作为人的身份不是由我们的血肉之躯决定，而是由对于成为

* 《星际旅行》是 1966 年由美国全国广播公司(NBC)开播的一部电视系列剧。它描述了一个乐观的未来世界，在那时人类已经战胜了地球上的疾病、种族、贫穷、偏执与战争。主角们探索银河系，寻找新世界并且与新的文明相遇，同时也帮助散播和平与理解。——译者注

一个人必不可少的那些特征——思想、感知和意识——决定的，所以，说我们的道德地位决定于我们作为人而不是作为人类的性质，就更合适。对于继续作为一个人存在来讲，我们需要的不是我们的躯体，而是这些作为人的性质。

其次，波西关于种族主义的观点，提醒我们"物种主义"是完全可能的。当我们基于某种动物是不同的生物物种——而这些生物学上的差别在道德上又是无关的——这个事实，就论证应以不同方式对待它们时，物种主义就出现了。

事实上，其他动物都没有足够多的人的特征，让它们有资格获得欧洲人权公约的保护。不过，有许多动物不仅对疼痛有感觉，而且在某种程度上还能回忆疼痛，预见疼痛。难道不可以说，这一点在本质上意味着，我们有道德义务考虑疼痛并且避免造成不必要的疼痛吗？如果只因动物不是人类就不这样做，我们难道不是犯了物种主义的错误吗？即使波西没有多少希望让法庭来主持公道，我们都必须回答这个控诉。

思考链接：

5. 一头想要被吃掉的猪
32. 解放西蒙
54. 难以捉摸的自我
65. 灵魂转世不变

73

做一只蝙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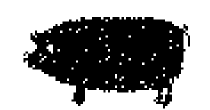
做一只蝙蝠可能会怎样？试着想象一下。也许你看到自己身材变小，一副蝙蝠的样子，与成百上千的朋友们一起倒挂在洞穴中。但这还没有开始接近。看来你真正要想象的，是你寄居在蝙蝠的身体里，而不是成为一只蝙蝠。再试着想象一下。

如果你发现很难想象，一个原因就是，作为一只蝙蝠，你没有语言，如果我们慷慨一点，蝙蝠也只有吱吱叫和哀鸣等原始语言。这不只是说你没有表达思想的公共语言，而且你没有内在思想——至少没有使用任何语言概念的内在思想。

另一个原因是（也许是所有原因中最难的），蝙蝠是通过回声定位来找到飞行路线的。它们发出的吱吱叫声就像雷达，根据声波从物体反传回自身的方式，让它们知道周围有什么物体。以这种方式去体验世界可能会怎样呢？可以想象的是，蝙蝠拥有的这种感知觉可能就像我们的视觉一样，但那是非常靠不住的。第三个理由甚至更古怪，那是因为蝙蝠像坐在飞机驾驶员座舱里一样，它看到的是一种雷达屏幕。

不,最合适的解释是,通过回声定位感知世界,就是具有一种完全不同于人类的感觉经验。你能够开始想象了吗?

资料来源:托马斯·内格尔,"做一只蝙蝠会怎样?",再版于《道德问题》,剑桥大学出版社,1979 年。



邀请大家想象蝙蝠的知觉世界,是美国哲学家托马斯·内格尔在著名论文"做一只蝙蝠会怎样?"中首次提出的。如果能够回答的话,回答的困难也被认为反映了心灵哲学中棘手的难题。

对心灵的科学研究如果不是处于婴儿期,确实也仍处于前青春期。但在许多方面,我们现在还是有了许多理解,特别是这一点已经毫无疑问,即心灵仰赖于大脑活动;并且在大脑"图谱绘制"方面,也已经取得了长足进展:确定了大脑哪个区域为心灵哪种功能负责。

但尽管如此,心身问题仍然存在。这就是说,我们知道心灵与大脑之间存在某种非常紧密的关系,但是,诸如大脑等身体的方面如何能够产生心灵的主观经验,却仍然看来是个谜。

内格尔的蝙蝠有助于使这个问题具体化。我们逐渐能够完全理解,蝙蝠的大脑是如何运作的,以及它是如何通过回声定位来感知的,但是,这种完全的身体和神经解释,仍将让我们不明白做只蝙蝠会怎样。因此,即使我们理解关于蝙蝠大脑如何运作的一切,在一种重要的意义上,我们仍然无法进入蝙蝠的心灵。但是,如果

心灵的存在只是仰赖于大脑活动，这种情况又怎么可能出现呢？

换句话说，心灵由于它们在世界上的第一人称视角而被突出出来。每个有意识的生物，都是从“我”的视角来感知世界，不管它是否拥有自我观念。但物质世界则纯粹只是以第三人称的语词来描述：物质世界中的每个东西都是“他”、“她”或“它”。这就可以解释，为什么对大脑及其运作方式的描述能够完整无缺——因为这种描述包括能够以第三人称观点理解的每件事——却仍然遗漏了看来对经验至关重要的东西——第一人称观点。

所有这些表明了什么？是说由于意识与科学的观点完全不同，因而科学解释永远也理解不了心灵吗？或是说，我们只是还没有想出一种能理解第一和第三人称观点的、科学地理解世界的框架？还是说，心灵根本就不是物质世界的一部分？第一种可能性似乎悲观过早；第二种可能性给我们留有甚至都不能理解的前进的希望之路；第三种可能性，则公然违背我们关于心灵与大脑紧密连接所知道的一切。找到一条前进的路，看来与你进入蝙蝠的心灵思考一样困难。

思考链接：

13. 到处都是黑白红
21. 埃皮芬之地
59. 眼见为实
68. 不可思议的疼痛

74

到处都有水吗

美国宇航局把这个新发现的行星命名为“孪生地球”。它不仅和我们的地球大小大致相似，还有相似的气候，那里的生命进化也几乎和我们相同。事实上，那里甚至也有国家，那里的国民甚至讲英语方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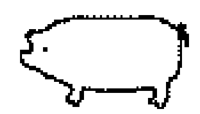
孪生地球上有猫、煎锅、煎饼、电视、棒球、啤酒和——至少看来还有——水。它的确有清澈的液体从天空落下，注满了江河湖海，为本土的类人生物和来自地球的宇航员消除干渴。

可是通过分析这种液体发现，它并不是 H_2O，而是一种非常复杂的物质，被命名为 H_2N_O。因而美国宇航局宣布，先前的这个声明——水在孪生地球上被找到——是错误的。有些人说，如果一种动物看上去像鸭子，像鸭子那样走路，像鸭子那样嘎嘎叫，那它就是鸭子。而在孪生地球上，长着鸭喙的鸟走路左右摇摆，叫起来嘎嘎，但它毕竟不是鸭子。

然而，小报的大字标题却给出了不同的解释：“吉姆，那是水，不过不像我们所知道的水。”

资料来源：希拉里·普特南，"‘意义’之意义"，再版

于《哲学论文》第二卷:《心灵、语言与实在》,剑桥大学出版社,1975 年。



H_2N_O 是不是水? 更扼要地说,我们为什么要关心这件事? 像这样的问题,只是作为哲学家病态地关注单纯的语义学问题的例子时,才让许多人想起。我们是否叫 H_2N_O 为水,又有什么关系呢? 我们知道它是什么和不是什么就可以了。

如果你对意义的来源问题感兴趣,那它就有关系了。我们大多数人没有明确的意义理论,但尽管如此,我们确实采用了一种将就的意义理论。这种意义理论就是,语词的意义就像我们脑海里持有的定义。例如,假设我误以为偏头痛就是一种严重的头痛,那么我可能说:"我得了严重的偏头痛。"如果有人为我指出,我事实上根本就没得偏头痛,我可能承认我弄错了,但是,我仍会有一种直觉,那就是,当我说我得了偏头痛时,我知道该话的意义是什么。我所犯的错误,是把我自己下的内在化定义与一种正确定义误配了。根据这种论述,确定语词意义的,是对语词的定义,而定义是那种能够存储在字典中,也能存储在心灵中的事物。

然而,H_2N_O 的故事对这种论述提出了挑战。很明显,当地球人和孪生地球人想着"这是水"时,他们是对两种完全不同的物质具有认识。地球水和孪生地球水不是相同的东西,它们只是碰巧同名。现在,想象 1000 年前的地球和孪生地球的情形,那时,没有人知道水的化学成分。因此,如果你思考一下,当某人想着"这是

一杯水"时，在他脑海里想到的是什么，在地球人和孪生地球人的情形中，想到的应当是一样的。但是，现在想象一下这种情形，一个地球人和一个孪生地球人就同一杯水想到"这是一杯水"。如果这水是 H_2N_O 的，那孪生地球人的思想就为真，而地球人的思想为假，因为它根本就不是我们叫做水的东西。但是，这意味着他们不能拥有同样的思想，因为同样的思想不能既真又假。

如果这种推理是正确的——而且它确实看上去非常有说服力——我们就得出了一个令人惊讶的结果。因为在地球人和孪生地球人的脑海里想到的是完全相同的，但他们的思想却不同，那就意味着，思想不完全是脑海里的东西！至少有部分思想——它们提供语词的意义——实际上存在于脑海之外。

因此，H_2N_O 是否是水的问题，不单纯只是一个语义学问题。你如何回答它，将决定意义和思想究竟是否像我们通常所设想的存在于脑海里，还是存在于脑海之外。这种问题，确实能够让你想到发疯。

思考链接：

11. 特修斯船
23. 盒子里的甲虫
63. 我真的知道吗
68. 不可思议的疼痛

75

古阿斯指环

赫伯特把古阿斯指环戴上手指，随即被看到的一幕惊呆了：他隐形了，没人能看到他。

开始的几个小时，他到处闲逛，测试自己的隐形能力。一次，他偶然咳嗽了一声，发现他也消声了，别人也听不见他。但他还有形体，因而会在软座垫上留下屁股印，或者为那些想走过他的人设置莫名其妙的障碍。

一旦习惯于隐形生活，赫伯特就开始想下一步可以做什么。让他感到羞愧的是，第一时间在脑海闪现的，并非全然只是美味佳肴，比如，他可以在女人浴室或更衣间晃悠，他也完全可以轻而易举偷点东西，他还可以绊倒那些西装笔挺却对着手机大声嚷嚷的讨厌鬼。

但他想抵制住这些低俗的诱惑，因而他试图找出自己可以做些什么好事，然而，他发现这方面的机会没那么明显。对于利用隐形能力去干不那么有益的事情的诱惑，赫伯特还能忍多久呢？只要有一秒钟的意志软弱，所有的努力就都毁了，他将可能是这样：偷窥裸体女人或偷钱。他有力量继续忍下去吗？

资料来源：柏拉图，《理想国》，第2卷，公元前360年。



把古阿斯指环看作道德素质的检验器，这是非常具有诱惑力的：在隐形斗篷下你将如何行动，就能暴露你真正的道德品质。可是，根据当人们面临绝大多数人都难以忍住的诱惑时会怎么做这一点来判断其道德品质，这有多公平呢？想象我们自己也戴有这个神奇指环，如果我们是诚实的，就可能暴露我们是多么让人失望地易于堕落，但是，这不等于说，我们事实上是堕落的。

也许，神秘指环能够让我们做的是去同情恶魔，或者至少同情他的一些小喽啰。例如，名人干了坏事，就会招引我们的谴责。但是，我们怎么能够想象，如果拥有万贯家财，拥有无尽的放纵机会，阿谀奉承的马屁精又乐意迎合我们的每一个怪念头，情况可能怎样呢？我们真的能够如此确定，我们在此情形下也不会使自己蒙羞？

考虑一下我们在拥有指环的一段时间内将怎么做，这可能为我们现今的道德状况提供一些洞见。承认在这个特定的时间，我们可能在秘密偷窥的诱惑面前投降，这是一回事；认为我们应当做的第一件事就是阻止去最近健身馆的更衣室，这是另一回事。愿意走那条偷窥之路的有些人，只是由于害怕或没有机会，才与实际的偷窥狂分道扬镳。

因此，这个神秘指环能帮助我们区分，我们真正相信错误的事情与那些只是习俗、名誉或胆怯阻止我们做的事情之间的差别。除去我们假装坚持的价值矫饰，指环就剥离了我们个人的道德外

衣，露出了其本质，最后我们剩下的东西，可能稀少到令人失望。我们可能不会胡乱杀人，但讨厌的仇敌可能不会幸免；许多女性主义者可能认为，太多的男人将利用这个机会去强奸；我们可能不会变为职业盗贼，但财产权可能突然看来不那么神圣不可侵犯。

这太悲观了吗？如果你问人们怎么看待这个问题：别人戴有指环会怎样做，自己戴有指环又会怎么做，你通常会发现他们的回答有极大的反差：别人将变为无道德的人，而自己仍保有以往的正直。当我们这样回答这个问题时，是我们低估了我们的同胞，还是我们高估了自己？

思考链接：

34. 不要怪罪我
54. 难以捉摸的自我
66. 赝品
85. 子虚乌有之人

76

装有芯片的大脑

奥莎跟她那些看似社交广泛且酷爱学习的同事相处时，不再感到痛苦了。此时的奥莎充满自信，她悄悄走到故作学识渊博的蒂莫西身边，准备测试自己的新力量。

"奥莎，亲爱的，"蒂莫西说，"你今晚看上去多么像'无情的美人'(La belle dame)*啊！"

"你是说我'十分美丽，宛如天仙'？"奥莎说，"你过奖了，但是，'她的秀发飘逸，她的步调轻盈，而她的眼神狂野。'我的眼睛无足称道，但我的鞋子是八码，而我的头发无疑是短发。"

蒂莫西显然被惊呆了，"我不知道你是铁杆的济慈迷，"他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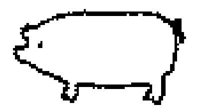
"用康德的话解释说，"奥莎回答道，"也许你不了解作为物自体的我，而只了解作为表象的我。"说完这些，她

---

* 出自济慈诗作"La Belle Dame Sans Merci"(1819)，意即"无情的美女"(the beautiful woman without mercy)。原典出自一首古老的法国宫廷诗，作者为 Alain Chartier。济慈诗作中强调骑士如何在接触与经历美的事物后，赋予生命的意义并改变其价值。—— 译者注

扬长而去，留下蒂莫西惊愕地呆立在那儿。

奥莎的新植入物——一块与全球资讯网和内置百科全书相连的高速无线晶片——起了作用。只要奥莎努力去想，晶片就深入挖掘这些信息资源，并且找出她想要的。奥莎甚至不能区分哪些信息实际上是她想起的，哪些信息是通过晶片获得的。不过，她一点也不在乎，因为现在她是办公室最博学的人，这才是重要的。



奥莎是个骗子，这一点毫无疑问。她假装自己读过济慈和康德，且博闻强记，但事实上，都是她那神奇的植入芯片把这些知识传输给了她。

但这意味着她不知道济慈和康德所写的吗？她有一种获取信息的非正统方式这个事实，本身并不能说明她不具有知识。毕竟，获取存储在你的大脑中的信息，与获取存储于别处但与大脑直接相连的信息，之间有什么差别呢？

如果你和许多哲学家一样承认，知识只是某种被证明为真的信念，那么，这种情形将更有说服力。奥莎关于济慈和康德的信念是真的，而且，她由于植入的芯片的功效相信这些信念是真的，如果不是被证明更合理，至少也和我们由于大脑不可靠的功效而认为我们记得的东西是真的一样合理。

关于这个情形，也许更有趣的，还不是奥莎知道什么的问题，

而是被记起的事实在聪明和智慧中扮演什么角色的问题。奥莎令人惊讶的表现，不仅有赖于她能获得引证的资料：她还必须富有智慧和理解力地使用这些资料。正是这一点，而不是背诵经典诗文的能力，使得奥莎显得聪明过人。

然而，这个故事的背景表明，我们有时被愚弄了，以至于想错方向。奥莎过去在精神上饱受威胁，是因为她被那些能熟练引用伟大作品的人包围。这样的人，是真的展现了高人一等的智力，还是只展现了记忆力？请注意，蒂莫西引用了济慈的一首诗开始和奥莎对话，但是，诗中的女主人公事实上看上去一点也不像奥莎。

我们可能还有别的理由认为，奥莎的植入物不能代替实际地去阅读伟大作品。只有花时间去读有价值的作品，你才能真正理解它，并想通它所意味的深意。奥莎采集的引用，缺乏对引文背景和语境的理解。因此，虽然她能够机智地使用引文让同事尴尬，但如果对话转移到济慈或康德的细微处，她就可能被发现有所欠缺。

但关键是，蒂莫西也可能这样。要点是，光是关于伟大哲学和文学作品内容的知识，并不是智慧或聪明的指示器。在存储这些知识方面，电脑芯片可能和人脑一样有效。我们运用这些知识做什么，才是重要的。

思考链接：

3. 印度人与冰
30. 记忆由此构成
40. 摇摆木马的赢家
63. 我真的知道吗

77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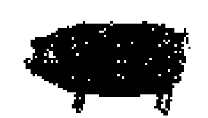
替罪羊

玛莎为何加入了警察部门？在她自己心里，答案是清楚的：保护公众，确保正义的伸张。这些考虑，比遵守规则更重要。

她不断告诫自己这一点，因为她怕自己缺乏决心去打破规则以实现自己的理想。一个好男人犯了一个可怕的错误，造成了一名无辜女人的死亡。不过，根据一连串的意外和巧合，玛莎有足够的间接证据和法学证据证明另一名男人犯了这个罪。不仅如此，她可以陷害的那个人还是一个十足的恶棍，本应为许多谋杀负责，只不过她一直没有收集足够的证据将他绳之以法。

玛莎知道，正当的法律程序不允许陷害，但是，监禁一个杀人惯犯，不比监禁一个对任何人都毫无威胁的人好得多吗？这么做所伸张的正义，远远大于否定一个杀人犯公平审判的利益所造成的不正义。

资料来源：《失眠》，克里斯多佛·诺兰导演，2002年。



“如果谁伤害我的孩子，我将杀了他。”即使听到在其他方面守法的公民这么说，也并不是一件不寻常的事情。但是，这么说的人心里想的是什么呢？

有人可能解释道，虽然他们知道亲手主持公道是错误的，但他们这么说，只是在诚实地坦承他们是什么感觉。另一些人可能不是那么消极防御性的，他们认为，伤害其子女的人，被他们杀死也是罪有应得。法律可能反对他们这么做，但自然正义（natural justice）不会反对。

毋庸置疑，法律和道德不是一回事。这一点正可以解释，为什么可能存在非正义的法律，为什么公民不服从（civil disobedience）有时值得称赞。不过，法治原则至关重要。只有在例外情形下，我们才应当改变或打破规则。我们禁止人们自行执法（即使人们是出于善良动机这么做），是符合所有人的最大利益的。

然而，这个一般的考虑对玛莎不大起作用。她可能完全赞同这种分析，但她的问题是，自己所处的情形，是否就是那种使打破规则有正当理由的例外情形呢？她怎么判定这一点呢？

玛莎可利用几种判定方式来为自己的陷害行为辩护。例如，我们可能认为，如果符合这三个条件，打破规则就是允许的。第一，打破规则必须比遵守规则产生好得多的结果，玛莎所处的情形看来就是这样；第二，这个行为应当不破坏一般的遵守规则的基础，只要玛莎的陷害行为秘而不宣，这个条件看来也符合；第三，打

破规则必须是达到较好结果的唯一方法，在玛莎看来，也没有别的方法能确保让这个十足的恶棍去牢房度其余生。

此外，对于玛莎的陷害行为，看来确实还有其他看似合理的道德论证。可是，由警察而不是由法院来决定谁应当受惩罚，这个观点是令人反感的。对此，我们有很好的理由：我们需要预防措施来防止警察滥用权力，尽管这样意味着有时让罪犯逍遥法外。

我们能够二者兼得吗？也许我们这么说并不矛盾，即社会必须要求警察总是遵守规则，但有时，他们秘密地打破规则也是好的。集体的职责是支持法治，但我们个人的义务，可能是确保自己做到最好，不管是合法还是非法。

思考链接：

7. 没有赢家
17. 选择拷打
36. 先发制人的正义
50. 好的贿赂

78

拿上帝打赌

上帝对哲学家说:“我是上帝,你的神。虽然你没有证据证明,我就是我所说的神,但让我给你一个相信的理由:一个基于自我利益的赌博。这个理由将对你堕落的本性有吸引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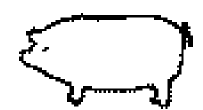
“有两种可能性:我存在和我不存在。如果你信仰我,遵循我的命令,而我也存在,你将获得永生;然而,如果我不存在,你将获得凡生,拥有信仰的些许安慰。当然,你已经在教堂里浪费了一些时间,而且错失了一些娱乐,但当你死时,这些都不重要。而如果我确实存在,你将获得永福。

“如果你不信仰我,我也确实不存在,那你会拥有自由自在的人生,但你终将一死,你的人生也不会有信仰上帝所带来的安慰和信心;然而,如果我确实存在,你得到的是永恒的火钳和痛苦。

“因此,如果你赌我不存在,你最好的结局是拥有短暂的一生,但最糟的结局是永恒的天谴;但是,如果你赌我存在(不管这有多么不可能),你最糟的结局也不过是短暂的一生,而最好的结局是永生。你如果不赌我存在,

那你一定是疯了。”

资料来源：布莱兹·帕斯卡，《思想录》，1660 年。



世上有许多人，他们不经常敬神，不阅读经文，甚或不遵循他们宗教的教导。不过，他们并没完全放弃信仰他们的上帝或神。例如，他们仍然让孩子受洗，安排犹太成人礼，或举行宗教葬礼。在需要的时候，他们也会祈祷。

这些人的推理可能没有我们拿上帝打赌这么精确，但是，他们行为背后的基本原则却是相同的：以防万一，最好对上帝维持至少最小限度的承诺。这些赌徒的推理非常像保险推销员：花不了多少时间和努力，但可能拯救你的灵魂。

只有当确实只有两种可能性时，这场赌博才有意义；但是，当然不是只有两种可能性，有许多神可以信仰，有许多遵循神灵的方式。例如，福音派基督徒相信，如果你不接受耶稣基督作为你的救世主，你将下地狱；因此，即使你把你的神圣赌注押在伊斯兰教、印度教、锡克教、耆那教、佛教、犹太教、儒教或其他任何宗教上，如果基督才是天堂之王，你还是会输掉这场赌博。

当然，赌注仍然保持不变：做了错误的选择，一种可能的结局就是永恒的天谴。但现在的问题是，你不能避免这种高度不可能的可能性。因为如果你选择了错误的宗教，你还是要受天谴。

也许你可能认为，全爱的上帝不会因人们信仰错误就将之打入地狱，因而任何宗教都行。但这种接受错误的上帝，肯定也不会

将无神论者推入永恒之火中。唯一值得下注的，是基要主义者的上帝；唯有对这个特别的神，那些赌博的规定才是有效的。

另外，一个能看穿我们灵魂最深处的上帝，会接受一个基于如此浅薄和自利算计的信仰，这是非常奇怪的。经过一段时间，你可能会逐渐真正信仰而不只是机械地履行仪式。在宗教献身中，实践出完美。但上帝仍会识别激励你信仰上帝的不诚之心，并相应地对你进行审判。

因此，该赌局真的需要更仔细地规定。你的选择是：要么，信仰一个会报复和惩罚的特定上帝，他要求信仰唯一一种基本教义派宗教，而不是多种互竞的宗教；要么，或者信仰没有上帝，或者信仰上帝不是如此自我本位，以至于在他为你提供救赎机会之前就要求你信仰他。并且，即使你把赌注押在一个淘气的神身上，也有多种选择，不过，由于你选择了别的神，每个神都将十分不愉快。

拿上帝打赌，结果是费力不讨好。

思考链接：

24. 方的圆
45. 看不见的园丁
58. 神的旨意
95. 恶的问题

79

发条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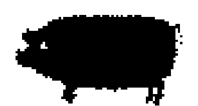
内政大臣被明确告知，他的计划“在政治上不可接受”。但若仅仅因为这个计划和一个著名小说家在一部糟糕的小说中描绘的情景相似就拒绝它是不理性的。

正如安东尼·伯吉斯的《发条橙》中的卢迪维科程序一样，新的犯罪厌恶治疗方案反复为罪犯提供一种令人不快的(虽然不是很过分的)治疗，以至于让他们一想起自己犯的那种罪，就感到厌恶。

对于内政大臣来说，这项计划看来不只是一种双赢的情形，而且是一种三赢的情形：纳税人赢了，因为这种治疗比漫长反复的关押更便宜；犯罪者赢了，因为监狱外的生活比监狱里好得多；社会赢了，因为先前讨厌的害群之马变成了守法的好公民。

可是，公民自由党人却控诉这是“洗脑”，否定了个人基本的自由和尊严——即使这项计划是完全自愿的。内政大臣苦思，人们为什么反对呢？

资料来源：安东尼·伯吉斯，《发条橙》，海涅曼发行，1962年。



当人们谈及尊严和自由时，他们可能是在描述伦理风景上两个最重要的地界标，也可能只是在发表一些含糊其词的话。例如，当人们抱怨一项新技术是对人性尊严的公开侮辱时，他们经常只是在表达他们对新奇而不平常的事物的反射式厌恶。举例来说，当试管受精刚出现时，许多人就抵制，理由是它把人降低到了实验室标本的水平。现在，绝大多数人已经把它作为受欢迎的技术和受孕问题的有效治疗手段来接受了。

因此，当人们声称像犯罪厌恶疗法这样的东西是对人类自由和尊严的打击时，我们应当存疑。也许，他们只是对一项创新表达一种成见而已，这项创新显示人类并不像我们乐于认为的那样神秘，人类也可以被科学地操纵。

有人可能提出，这种疗法只是用一种系统的方法，做那些通常偶然发生的事情而已。通过结合社会化和本能，我们就学会厌恶某些行为方式。我们不伤害别人，不是因为我们推理这样做是错误的，而是因为我们逐渐感觉到他们的痛苦应当被避免。然而，有时人们没有学会这个功课，可能是因为他们缺乏先天的同情共感，这种同情共感让我们绝大多数人把他人的痛苦看成是自己的一样；也可能是他们已经对暴力不敏感了，并且逐渐把暴力看成是好事。在这些情形中，把这些本性和教养没有发展出来的本能人工地灌输给他们，这有什么错呢？

说到洗脑，这是个强有力的反对意见，但是，我们大多数行为，

看来都是一种由父母和社会以不断的负面和正面强化的结合加以培养的习惯。事实上，从出生开始，我们全部都被慢慢洗脑。只有当洗脑太快，或是造成我们不喜欢的后果时，它才突然变得在伦理上不可接受。犯罪厌恶疗法不过只是我们通常叫做社会化的那种洗脑的加速和修正版吗？

出于相似的理由，我们也应小心，不要夸张我们的自由主张。我们不认为，只有当人们倾向于施加暴力却仍然选择不施加时，他才是自由地制止了暴力。一个正常而体面的人，对于给别人造成不必要的痛苦，是感到某种厌恶而不是选择某种厌恶；这不只是一个沉着冷静行使"自由意志"的问题。因此，如果一种治疗程序只是灌输对犯罪行为的厌恶，而这种厌恶又是绝大多数人的一般厌恶水平，怎么能让一个人比你我更不自由呢？

如果有反对犯罪厌恶疗法的好理由，我们也必须不只是含糊地诉诸自由和尊严。

思考链接：

17. 选择拷打
35. 最后的诉求
50. 好的贿赂
97. 道德运气

8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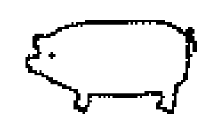
心与脑

在荷兰被占领期间，斯凯勒和特莱恩都庇护犹太人免受纳粹迫害，然而，她们这么做却是出于完全不同的理由。

特莱恩的善行纯粹是自发的。别人的苦痛和需要在她的内心呼唤，她也就不假思索地加以回应。朋友们都赞美她的慷慨，但有时也提醒她，善良意图也会铺就通往地狱之路。“你也许被感动而施舍钱财给乞丐，”他们说，“但如果他们用钱去买毒品又怎么办呢？”对于这样的担忧，特莱恩不为所动。面对人们的需要，你所能做的就是伸出援手，难道不是吗？

相反，斯凯勒则以对人冷淡出名，虽然她也不恨人，但她并不真正喜欢人。当她帮助别人时，她这样做是由于，她想到了他们的困境和自己的义务，因而断定帮助别人是应当要做的事。从她的善举中，她并没有感觉到心中的温暖，只是知道她做出了正确的选择。

斯凯勒和特莱恩，谁过着更道德的生活呢？



被描述为“善良”、“仁慈”或“慷慨”的，经常是特莱恩这种人而不是斯凯勒这种人。我们感到，她们的仁慈深深根植于其人格，是人格的自然流露。她们的慷慨的直觉性表明，她们存在的本质就是善的。相反，我们也很可能赞美斯凯勒这种人，但我们不是以同样的方式感受她们的善。我们顶多可能赞美她们自愿去做她们认为是义务的事情。

有趣的是，我们会以哪种方式作出反应。因为如果道德关乎做正确的事情，那么，我们应当认为特莱恩比斯凯勒在道德上更值得称赞，这一点就远非显而易见。事实上，如已经说过的，因其坦率的行为方式，特莱恩也许比斯凯勒更有可能做错事。例如，当在非洲旅行时，时不时会有小孩向你要铅笔，有时还要点钱。特莱恩肯定会给。但斯凯勒可能想得更多，然后可能和多数发展机构一样断定，这种礼物将鼓励依赖，也会强化其低人一等和无助的感觉。把这些东西直接给学校，为那些你想帮助的人保留尊严，相比要好得多。

还有第二个理由使人们对特莱恩的赞美有所保留。既然她的行动是不假思索的，她做得好是不是只是一个运气问题呢？为什么只是由于某人碰巧具有了一些通常是好的品性，我们就应当赞扬他呢？更糟的是，除非我们反思我们的感觉，否则我们的直觉可能使我们误入歧途。例如，让我们想想历史中的许多人，他们也有特莱恩的基本人格，但却在一种种族主义文化中长大。这样的人，

对于他们的种族主义，通常就像对于他们的仁慈一样是不假思索的。

也许我们可以更进一步：尽管缺乏直觉性的同情共感和怜悯心，斯凯勒还是做了好事，正是由于这一点，斯凯勒应该受到更多的道德赞美。特莱恩的仁慈不需要特别的努力，而斯凯勒的仁慈，却需要意志战胜自然倾向。

然而，把我们的直觉性判断倒转过来，认为斯凯勒在道德上更值得称赞，这也带来了别的问题。毕竟，这么说不是看上去很奇怪吗——其善良紧密根植于其人格的人，居然不如只是由于推理而去做好事的人那么善良？

解决这个两难的一个老办法是说，善良要求结合脑与心，虽然特莱恩和斯凯勒都表现了美德的某些方面，但她们都不是十全十美的道德楷模。当然，这种说法基本上是对的，但却回避了真正的两难：对于判断我们在道德上是否是一个好人来讲，到底是我们如何感觉更重要，还是我们如何思考更重要？

思考链接：

17. 选择拷打
18. 理性的要求
50. 好的贿赂
83. 黄金法则

81

感觉与感受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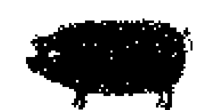
加拉弗雷星球上的人在很多方面都像我们，然而，他们的感觉却非常不同。

例如，在人类可见光谱频率范围内反射的光，加拉弗雷人闻得到：比如我们所看到的蓝色东西，他们闻着有柑橘味；同样，我们听得到的东西，他们却看得见：贝多芬的第九交响乐，对他们来讲，就是一束惊艳的无声迷幻之光；他们唯一听得到的东西，就是他们自己和别人的思想；味觉是他们眼睛的特别功能：他们最好的艺术馆，由于其美味可口而受称赞。

他们没有触觉，但他们有一种我们没有的感觉，叫做"穆尔斯特"(mulst)。它能察觉运动，而且它是通过关节来察觉的。就像加拉弗雷人不能想象触觉一样，我们也不能想象穆尔斯特是怎么回事。

人类第一次听说这个奇怪的种族时，有人马上想到的是：在加拉弗雷，森林里的树倒下会有声音吗？同时，加拉弗雷人可能正在问：地球上放映的电影会有气味吗？

资料来源：乔治·贝克莱，《人类知识原理探究》，1710年。



“如果一棵树在荒无人烟的森林里倒下，会有声音吗？”这是哲学中最古老的难题之一。但由于这个难题已变得如此老旧，因而如果能够从一个新角度重新思考它，将是有用的。所以人们提出了这个古怪的问题：“地球上放映的电影会有气味吗？”虽然这个问题听起来古怪，但它却和关于森林的经典问题一样适切。

这些难题是由于认识到这一点引起的：我们如何感知世界，不仅仅依赖于世界本身，至少也同样依赖于我们的感官构造。只是如此碰巧，某种频率的空气振荡波，才被我们的脑袋转译成了声音。狗能听到我们听不到的声音，我们也没有逻辑理由说明，为什么其他生灵不能把这些相同的振荡波转译成气味、触感或颜色。事实上，共感觉(synesthesia)——听到颜色或看到声音等感觉交叉——确实发生在人身上，在极少数情况下永久性发生，或者由LSD* 等迷幻药临时性引起。

假定这些事实存在，这样的问题就出现了：当有听觉的生灵不在场时，声音是否存在？当一棵树在荒无人烟的森林中倒下时，空气当然会振动；但如果声音离不开听者的耳朵，那么，没有耳朵的地方就没有声音吗？

---

* LSD是Lysergids的简称，中文名为麦角酸二乙基酰胺。LSD是一种无色无嗅无味的液体，属于半合成的生物碱类物质，是已知药力最强的迷幻剂，由瑞士化学家艾伯特·霍夫曼于1938年利用麦角中所含的麦角胺、麦角新碱首次合成。——译者注

如果你想反对这个结论，并且说加拉弗雷倒下一棵树确实有声音，那么基于同样的逻辑，你也不得不说，地球上放映的电影也确实有气味。因为你的意思是，树发出声音并不意味着任何人听见，它只是意味着发生了某件事，以至于如果有人在场的话，他们会听见声音；而且你认为，对于证明那里有声音来讲，这就够了。但如果这种情形是对的，为什么电影有气味这种情形就不对呢？因为这种说法也不是说，当放映电影时，任何人都能闻到气味；它所意味的只是，如果有这样一个人在场他能闻到我们所看到的东西，那么，他们将闻到电影的气味。这看上去和这种说法一样正确：如果人类出现在加拉弗雷的森林里，当树木倒下时，他们将听到声音。

这种推理看来会得出荒谬的结论：世界充满了无人听得到的声音、无人看得到的颜色、无人尝得到的味道、无人触摸得到的质地，以及许多其他我们甚至都不能想象的感觉经验，因为生灵可能感知世界的方式是无穷无尽的。

思考链接：

21. 埃皮芬之地
28. 恐怖的情景
59. 眼见为实
73. 做一只蝙蝠

82

搭便车者

埃莉诺对她新的宽带连接很满意。过去她只习惯拨号上网，现在她很高兴的是，她的网络连接是无限制的，冲浪和下载也快得多，偶尔还完全免费，这就算是一点红利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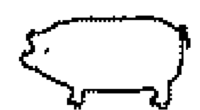
说免费也许有点令人误解。埃莉诺没有为网络服务付费，是因为她使用了她邻居的无线网络连接（WiFi connection）*，或者叫做无线局域网。在有限范围内，只要电脑有适当的软件和硬件，无线局域网就可以让电脑无线连上宽带网络连接。由于埃莉诺的公寓与邻居的公寓足够近，她就可以使用邻居的网络连接。

埃莉诺不认为这是偷窃行为。无论如何，邻居还可以使用网络，而她只是使用了他剩余的带宽而已。事实上，一种叫做“好喜鹊”（good magpie）的极好软件，使得她在利用网络连接时，决不会导致邻居的上网速度减慢。

---

* WiFi 的全称是 Wireless Fidelity，又叫 802.11b 标准。它的最大优点就是传输速度较高，可以达到 11Mbps；另外它的有效距离也很长，在 WiFi 信号覆盖的地方，可以不需要网线而快速接入 Internet；同时它与已有的各种 802.11DSSS 设备兼容。——译者注

因此，她从邻居的网络连接中获得了好处，但邻居却没有受损。这有什么不对呢？



许多人都利用他们的笔记本电脑或掌上电脑拥有的无线上网功能，偶尔在特殊场合下“借用”带宽。因忙碌而不方便有线上网时，如果需要网络连接，人们就会在街上到处走走，寻找无线局域网信号，然后停下来收电子邮件。人们使用了公司或个人的网络连接，可他们从来都不知道，在网络性能上也丝毫没有受损。

埃莉诺借用带宽就更加系统，因为她每天上网的方法就是利用邻居的连接。邻居付费她来玩，这看来极不公平；但埃莉诺的行为并没有对邻居造成任何不利影响：无论如何，邻居都得为网络连接付费，而她的使用又并不妨碍邻居的使用。从这个角度来看，埃莉诺并不是一个贼，就像利用邻居花园中的树投射的阴影遮阳的人不是贼一样。

这是搭便车问题的一个特例。搭便车者没有对别人做贡献，却从别人的行为中得到了便宜。有时，搭便车减少了可得的总体利益，在这些情形下，不难看出搭便车不对的原因；但在另外一些情形下，搭便车者实际上享受的是剩余的利益，并没有让任何人受损。

这类搭便车的行为有数不尽的例子。例如，一个社区在公园里组织一场开放音乐会，有人偶然路过，并站在人群边上欣赏了音乐会，她并没有剥夺任何人的快乐，但当收钱桶来到她面前时，她

却不为音乐会的花费做一点贡献；有人非法从网上下载他们从不购买的歌曲，她也并没有剥夺艺术家的任何收入，因为她是否被迫为歌曲付费，别的下载者并不操心，还是会照样付费。但是，她却同样欣赏了歌曲。

如果搭便车是一种罪恶，看来也是一种真正没有受害人的罪恶。那么，搭便车有何不对呢？也许，关键不在于关注搭便车的个人实例，而在于关注这种行为模式。例如，我们可能不在意某人使用了我的无线网络连接，如果在相同的情形下，我们也可以使用别人的无线网络连接的话；同样，你不为偶然路过的开放音乐会付出一点点，这也没什么不对，如果你自愿为你要拜访的别人做出贡献的话。只要付出和获得最终一样多，搭便车本身就不会招致反对。

然而在埃莉诺的情形中，她全是获得却没有付出。她并不打算让自己在将来的某时也作为网络连接的主机，因此，她并不是以一种互相合作的精神搭便车，只有互相合作才能让她对别人网络连接的使用可以接受。她的行为表明，她缺乏对别人的关心。然而，即使我们认为这有一点自私，难道我们不能正确地说她的不道德行为是非常轻微的吗？事实上，任何比说埃莉诺有点厚颜无耻更强烈的谴责，都表明我们自己对于完全无害的偷窃行为太过于忿忿不平。

思考链接：

14. 让你受益的银行错误
34. 不要怪罪我
44. 至死才分离
60. 要听我的话，别跟我的样

83

黄金法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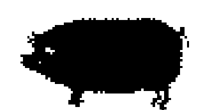
康斯坦丝一直都力图遵守道德黄金规则:就像你希望如何被别人对待那样去对待别人,或者如康德晦涩地表述的,“只有当你能够同时意想这条准则成为一条普遍法则时,才按该准则行事。”

不过,现在她被一件看似违背这个原则的事情强烈地怂恿,她有机会与自己好友的丈夫带着所有家当私奔。从表面上看,她不应当做这样的事情,就像别人不应当对她做这样的事情一样。

但是她想,事情远非如此简单。当我们监禁罪犯时,我们并不是在说我们也应当被监禁,而是在说,如果我们处于这个罪犯相同的情形,我们才应当被监禁。这个附加条件很关键:即要看情形。

因此,她应当问自己的问题是:她能够“意想这个准则成为一个普遍法则吗”?即处于她的情形的人应当与她们好友的丈夫卷款私奔。问题这样表述的话,答案看来是肯定的。因为她不是在说通奸和谋财总是好的,只是说在她所处的特定情形下是好的。问题因此迎刃而解:她可以问心无愧地私奔。

资料来源：孔子，《论语》，公元前5世纪；康德，《道德形上学基础》，1785年。



在人类提出的几乎所有主要伦理学体系当中，孔子的黄金规则以各种形式展现出来。它简明扼要，似乎为我们提供了一个完全能遵循的常识道德规则。

康斯坦丝的情形所突显的问题，不只是对这个规则似是而非的嘲弄。它触及了这个原则实际上所意味的东西的本质。就两种偏激解释看来，这个原则不是太荒谬，就是太空洞。

如果黄金规则意味着，不管情形如何，我们决不应当对别人做那些我们不愿意接受的，那么，我们将决不做令人不快的事情，比如惩罚或者约束。既然我们反对自己被监禁，我们就不该监禁连环杀手。而这完全是胡扯。

正是由于这一点，康斯坦丝认为必须考虑情形是对的。但由于每个情形都略有不同，所以在某种意义上，每个情形都是独一无二的。因此，我们做任何事情都可以基于如下理由被合理化：我们同意在完全相同的情形下得到同样的对待。但是这样的话，黄金规则的普遍性特征就消失了，因而这个规则也变得空洞无物。

这样看来，我们是否应当寻找中间路线？这将一定涉及到"相关相似性"观念。我们应当对别人做那些我们在道德上相关相似的——尽管不是完全相似的——情形下也愿意接受的事情。例如，虽然所有的非法杀人各不一样，但在关系到意义重大的道德问

题这一点上，它们都相关相似。

要让黄金规则起作用，就得采取与这种方法相似的方法，但是，我们现在还远没有获得一种简单明晰的规则。因为辨识相关相似性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也并非只有那些可能自称有关键的相关差异的人，为作恶找借口。人类的事情极其复杂，如果我们不注意每个情形的特殊性，我们可能就无法适当处理这些情形。

回到康斯坦丝的情形。她的理由看上去是自私自利的。但是，假如康斯坦丝的好友实际上只是一个骗子，她已经从她家的银行账户上取走了许多钱，那又怎么样呢？假如她好友让丈夫痛苦不堪，那又怎么样呢？在这些情形下，康斯坦丝的决定看上去更像是英雄之举，而非自利之为。

康斯坦丝的困境，反映了任何想遵守道德原则的人都会碰到的一个挑战：在需要遵守一般道德准则与同等需要对每个情形的特殊性保持敏感之间，我们如何平衡？

思考链接：

18. 理性的要求
44. 至死才分离
80. 心与脑
91. 无人受损，就可为恶

84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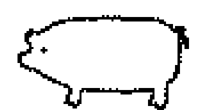
快乐原则

你为突破事业等待了多年，可有一天，两个机会突然同时出现——这种情况是经常出现的。潘妮终于等来了大使一职，而且有两个可以选择：两个都是南海岛国，大小、地理和气候都相似。不过，拉里塔里亚法律严格，禁止婚外性行为、喝酒、吸毒、流行娱乐，甚至禁止美食。该国只允许艺术和音乐等“高级乐事”，事实上，由于该国促进这些方面，因此它有世界级的交响乐团、歌剧院、艺术馆和“合法的”戏剧院。

比较而言，拉维塔里亚是一个思想和文化沙漠。不过，它却以享乐主义者的天堂闻名于世。它有极好的饭店、繁荣的喜剧和歌舞巡演，而且，对性和毒品的态度也很自由。

潘妮对于要在拉里塔里亚的高级乐事和拉维塔里亚的低级乐事之间进行选择很不情愿，因为二者她都喜欢。事实上，对她来说，完美的一天应当包括美食、美酒、高雅文化和低俗娱乐。可是，她必须选择。被迫无奈之下，应当选哪一个呢？贝多芬还是威灵顿牛肉？罗西尼还是马提尼酒？莎士比亚还是小甜甜布兰妮？

资料来源：约翰·司徒亚特·密尔，《功利主义》，1863年。



这两个奇风异俗的小国，在哪个更容易过得好呢？你可能认为这只是个偏好问题。让艺术爱好者去拉里塔里亚，让派对狂去拉维塔里亚。而那些二者都有点喜欢的人——我们大多数都是——则必须决定：他们更珍视什么，或者反过来问，在缺少什么时更容易活下去。

然而，如果这只是一个趣味和倾向问题，那为什么高级乐事能获得政府补助，而低级娱乐总是被课以重税呢？如果我们从聆听威尔第歌剧中获得的快乐并不比听摩托党（Motorhead）摇滚乐*获得的多，那为什么摇滚乐团获得的补助不能和伦敦皇家歌剧院获得的一样多呢？

诸如此类的想法让很多人得出结论：在知识分子的"高级"乐事和优雅的审美欣赏中，有某些优越之处。然而，如果这个观点受到挑战，对于高级/低级的区分，我们很难提出正当理由。有人怀疑，这只是披上客观判断的外衣的偏好，是恃才傲物或精英主义。

这个问题让功利主义思想家约翰·司徒亚特·密尔很不安，他认为，道德的目的就是增进最大多数人的最大幸福。他面临的

---

* 20世纪70年代风靡于英国的一支重金属摇滚乐队。——译者注

问题是，他的哲学看来更看重那种享受浅薄的感官快乐的生活，而不是那种感性快乐较少而理性快乐更多的生活。满足的猫将比费心的艺术家过得更好。

一个解决办法是，不仅区分快乐的量，也区分快乐的质。一种只充满低俗快乐的生活，比一种甚至只有一些高级快乐的生活更差。不过这个问题仍然需要论证：为什么后者比前者更好？

密尔提出了一个判断标准。我们应当问，有资格的裁判将如何决定。显然，那些曾经体验过高级快乐和低级快乐的人，才是决定哪一种生活更好的最佳裁判。并且正如“高级”和“低级”这样的分类标签所暗示的，密尔确信，他所认为的裁判们的选择不会错。

如果密尔是对的，潘妮作为一个有资格的裁判，将选择拉里塔里亚。对于损失低级快乐，她可能感到遗憾，但不能体验高级快乐将让她更苦恼。与那些从未欣赏过高雅艺术或从未沉湎于低俗快乐的人相比，潘妮的观点更有分量。可是，潘妮真的会这样决定吗？她的判断真的能告诉我们高级快乐比低级快乐更好的理由吗？

思考链接：

7. 没有赢家
20. 诅咒生命
26. 疼痛的残余
52. 数量还是质量

85

子虚乌有之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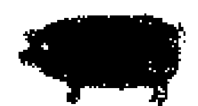
“法官大人，我当事人的辩护非常简单。他承认，确实在报纸专栏上写了这样的话：‘现任英格兰足球队经理是个骗子、白痴和国耻’；他也承认，说过了类似于他‘应当被枪杀’这样的话。但是，他这么写，并没有诽谤原告，格伦·罗伯森-科考森先生。

“理由很容易理解。当文章写出来并发表时，并没有人担任英格兰足球队的经理。罗伯森-科考森先生早在两天前就提出了辞职报告并被接受。在被告的文章发表当天，这则辞职新闻就已经众所周知了。

“原告声称，我当事人对经理的谴责是假的。但是，由于这个谴责与任何人都无关，因而既不是真的，也不是假的。事实上更精确地说，这个谴责是无意义的。‘弗拉—弗拉是一匹赛马’这句话，只有当弗拉—弗拉是一匹赛马时才是真的，当它不是一匹赛马时就是假的，但当不存在这样一种动物时，就是无意义的。

“因此，审判委员会应当撤销这个案件。认为可以诽谤一个不存在的人，这简直是胡说。我不用再说什么了。”

资料来源：伯特兰·罗素，“论指称”，载于《心灵》，14(1905)，网络上有很多选编和再版。



逻辑学家不同于普通人。大多数人说，即使他们有时表达观点有点笨拙或不严密，但只要他们能够让自己被理解，别人一般来说也知道他们的意思，这就够了。可是，逻辑学家们却被日常语言的变化无常和含糊不清所困扰。他们强调，要点在于，表面上琐屑的谬论也是意味深长的。

想想格伦·罗伯森-科考森先生提起的案件的辩护。基于我们知道辩护律师所意指的“现任英格兰足球队经理”是谁，审判委员会可能不会考虑他的辩护。但让我们逐字逐句地理解他的辩词，并且承认那时确实没有“现任英格兰足球队经理”，那么，审判委员会仍会坚持律师的辩解是错误的吗？因为如果不存在“现任英格兰足球队经理”，说他是“骗子、白痴和国耻”就当然是假的吗？

即使我们坚持律师的辩解是错的，无论如何，其辩解确实仍有其意义。这是曾经严重困扰罗素的那种意义。当罗素沉思“法国当今国王是秃子”这个陈述的真值，而当时的高卢实际上是共和国时，他就对其意义颇费心机。问题是，在逻辑上，假陈述的否定式为真，因此，举例来说，如果“太阳围绕地球转”是假的，那么“太阳不围绕地球转”就显然是真的。这意味着，无论如何，如果“法国国王是秃子”是假的，那么，“法国国王不是秃子”必定为真。但是，

"法国国王不是秃子"也不可能为真，因为当今法国根本就没有国王。因此，看来就像说"法国国王是秃子"不真不假一样，当没有这样一个经理存在时，说"现任英格兰足球队经理是骗子"也不真不假。

如果一个陈述不真不假，这难道不会使之无意义吗？你可能这样认为，但是，"现任英格兰足球队经理是骗子"这个陈述的意义的确是完全清楚的。一个无意义的陈述，其意义又是清楚的，这种说法看来是个矛盾。

因此，这个表面上无伤大雅的难题——这样的陈述是否且如何能够为真或为假，其意义不断拓延繁衍。我们甚至还没有略微谈到这个难题和这个观念的联系，即语言与世上对象相符合，因而陈述的真假有赖于是否存在这种符合。

当然，这个难题不可能在此解决。不过，很清楚的一点是，如果你发现这样的问题微不足道而不是引人入胜，千万别研究逻辑和语言哲学。

思考链接：

23. 盒子里的甲虫
45. 看不见的园丁
47. 兔子
74. 到处都有水吗

86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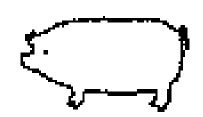
为艺术而艺术

马里恩已经习惯在建筑工程中发现考古遗迹带来的不便。但是这一次,她还是没什么准备。

建筑工人在发现坑道当天就通知了马里恩,告诉她里面装有什么东西。在坑道底部有一个密封的箱子,里头装有一座米开朗基罗雕像。箱子上装设了多种机关:打开箱子将引爆炸弹;箱子里装有瓦斯,如果跟氧气接触就会爆炸;当然箱子里还有其他精巧的机关。结果是,由于任何取出艺术品或移动箱子的尝试都会毁掉艺术品,因而这件艺术品永远也无法重见天日。

但是,如此危险的定时炸弹绝不能留置在未来医院的地底下。因此,看来只有两种解决办法:放弃建造医院,让艺术品安全却不为人所见地留置在那里;或者安全地毁掉艺术品。

既然这样,除了命令排爆队实施受控爆破外,看来马里恩也没别的选择。但是她忍不住想,让雕像原封不动留在原地可能更好,尽管甚至都没有人能看到它。



我们许多人都认为艺术品有价值，并且不只是金钱意义上的价值。伟大的艺术作品值得保藏，个人和政府都花大钱获得、修复或保藏这些伟大艺术品。

可是，艺术品是本身就有价值，还是其价值有赖于它们对于欣赏者的益处？认为艺术品本身就有价值，这是非常有诱惑力的：即使没有人看过米开朗基罗的大卫雕像，它的艺术成就也不少一点点。即使过去没人见过、将来也不会有人见过的大卫雕像是一件伟大艺术品，它存在的意义是什么呢？大卫雕像可能以某种方式对米开朗基罗有益处，但是在他死后，一件没有人能够赞赏的艺术品，其意义是对谁而言的呢？其意义又是什么呢？

在艺术品的品质与其存在意义之间做出区分，是理解马里恩的两难的关键，因为对于箱子里的雕像是具有一定品质的艺术品这一点，并没有多少怀疑。问题是，如果没有人能见到它，那这件艺术品的存在还有什么意义吗？

保留派会说，单单由于雕像的存在，这个世界就更美好。提倡毁掉的人认为这种想法是荒谬的，他们反驳道，世界会更好，是由于艺术品对观赏者产生了影响。如果人们不能从艺术中吸取养分，艺术就没什么用。你大可永远关闭国家艺术馆，说只要绘画与雕像放在里面就好；这些绘画是隐秘地放在私人收藏室中，还是放在博物馆的保险室中，都无关紧要。可是，它们对人来说却没有用。对此，保留派回答道，人们看到艺术品比不能看到要好这个事

实，并不意味着没被看见的艺术品就根本没有价值。开放的艺术馆要比封闭的艺术馆更好，但封闭的艺术馆却比根本没有艺术馆要好。

可烦人的疑问仍然存在：对于艺术具有什么价值，我们不是需要艺术鉴赏家吗？想象另一种场景：致命病毒灭绝了地球上所有生命，且宇宙中不再有其他生命；剩下这个充满艺术品的世界，却没有人观赏。如果大卫雕像从基座上倒下碎成了百万片，这个荒无人烟的世界难道真的比大卫目光凝望的世界更糟糕吗？假如我们倾向于认为更糟糕，难道不只是因为我们想象自己仍然在那里，并且把假定不存在的意识加入了这个思想实验吗？难道我们不是犯了一个这些人所犯的同样的错误吗？他们看着一具死尸，却想象它仍然是那个不再存在的活人？

思考链接：

12. 海滩上的毕加索
37. 自然艺术家
48. 邪恶的天才
66. 赝品

87

公平的不平等

约翰和玛格丽特去为3个儿子买圣诞礼物：马太，14岁；马可，12岁；路加，10岁。这对慈爱的父母总是力图公平地对待他们的孩子。这一年，他们打算为每个孩子花100英镑来买礼物。

一开始，他们的采购看来不会有麻烦，因为他们不久就找到了他们想要的：单价100英镑的掌上花花公子游戏机。正当他们要去收银台为三台游戏机付款时，约翰注意到一个特惠活动：如果购买两台单价150英镑的新型高级游戏机，将能免费赠送一台原装游戏机。他们可以花同样多的钱获得更高级的商品。

"我们不能这么做，"玛格丽特说，"那是不公平的，因为将有一个孩子得到比其他两个更差的礼物。"

"但是玛格丽特，"由于想到能向孩子们借新玩具玩了，兴奋的约翰说，"这怎么会不公平呢？他们都不会获得比本来应当获得的礼物更差的礼物，而且有两人还获得了更好的。如果我们不参加特惠活动，有两人将获得比本来应当获得的礼物更差的。"

"我希望他们全都平等。"玛格丽特回答道。

“即使这意味着让他们获得较差的礼物，也要平等吗？”

资料来源：约翰·罗尔斯，《正义论》，哈佛大学出版社，1971年。



许多人都认为，平等是可欲的，可现在很少有人认为要不惜一切代价追求平等。这是因为，通过让大家都低水平地齐一来达到平等，看来是有点过度固执。只要让每个人都像社会上最穷的人那样穷，我们就可以轻易地让每个人平等。但是，这显然是愚蠢的，因为这么做不能帮助任何人。最穷的还像以前一样穷，而其他人则受到损害。

尽管我们接受，强加的平等并非总是值得的，然而，这并不意味着，我们应当完全毫无疑问地接受所有不平等。我们要问的是，不平等在什么时候是可接受的。约翰对玛格丽特说的关于为什么要区别对待孩子们的理由，提供了一种答案：当没有人变得更差且有人变得更好时，不平等是可接受的。

这非常像政治哲学家罗尔斯讲的“差别原则”。实质上这就是说，当且仅当对处境最差者有利时，不平等才是允许的。然而，这个原则是否适用于马太、马可和路加，我们并不清楚。根据最初的礼物购买计划，这三个孩子形成了一个无阶级差别的微型社会，其中每个人都一样好。而购买新型高级游戏机的计划，确实让其中二人变得更好，但对另一人却毫无助益。因此，我们真的能说，这

个计划在总体上对处境最差者是有利的吗？

当然，当差别原则应用于政治和家庭领域时，会有更重大的差异。就整个社会来说，罗尔斯的论证在直觉上看来是有说服力的。然而在家庭中，则似乎有理由优先考虑平等，因为在非常小的社团中，人们能更敏锐地感受到不平等，因而可能导致关系紧张。

然而，这样的考虑也可以延伸到政治领域。因为反对不平等的一个理由正是，不平等对于社会凝聚力和穷人的自尊会有不良影响。正如社会心理学家指出的，当邻居并没有剥夺我们的财产而变得富有以后，尽管我们在物质上并没有变差，但在心理上，我们对自己和邻居之间财富差距的不断认识，将让我们很受伤。因此，仅从物质的角度看待平等和不平等，将是一个极大的错误，不管是在政治中还是在家庭中。

思考链接：

7. 没有赢家
10. 无知之幕
22. 救生艇
55. 可持续发展

88

毁灭记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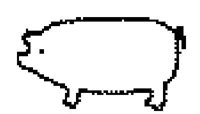
阿诺德·科南刚刚有个令人不快的发现：他根本就不是阿诺德·科南，或更确切地说，他过去不是。这是完全令人不知所措的。

他能够解释其与众不同的自传的最好方式如下。他出生时是艾伦·E.伍德。根据各种记录，伍德是一个非常讨厌的家伙：自我中心，自私自利，残忍又无情。两年前，伍德被联邦调查局逮捕了。调查局给了他一个选择：要么在戒备森严的监狱里度过余生，但他们告诉他，他在那里将受其他狱友之害；要么就销毁掉自己的记忆，代之以联邦调查局一个完全虚构的间谍人物的记忆。他选择了后者。因此，他被全身麻醉，当他醒来时，已经忘记了之前的生活。取而代之的是，他记得的是一个完全虚构的过去，也就是科南这个他现在认为所是的人的过去。

科南已经确定这就是事实。但是，他还是不知道自己是谁：伍德还是科南？

资料来源：保罗·维尔霍文执导的《宇宙威龙》，1990年；改编自菲利普·K. 迪克的小说《全面回忆》，该小说

收录于菲利普·K.迪克的短篇小说集第二卷，卡罗尔发行公司，1990年。



在认同危机中，科南/伍德的认同危机大约是最严重的。情况看来是，他要么是某个自知甚少的非常讨厌的家伙，要么是安全机构虚构的人物。但他未必希望任何一种可能性成为事实。

许多人最初的直觉是，科南实际上就是伍德。这是可以理解的。通常，我们的身份认同来自于我们的大脑和身体。既然这个在出生时叫做伍德的有机体的生命从未间断，也没有别的叫做伍德的人行走于世，这样看来，科南就是伍德。毕竟，如果他不是伍德，伍德又在哪里呢？就算伍德死了，请给我们出示其尸体！可问题是并没有人被杀。

根据科南是安全机构和神经学家创造出来的人物这一点，可能更强化科南就是伍德这个事实。例如，无论他记得多少童年往事，这些往事实际上从未发生过。就像伍德看来是真的一样，科南看来是假的。因此，纵使他在心灵上变得无法辨认，对于科南就是伍德，能够有任何疑问吗？

在科南/伍德的心里，当然有疑问。因为不管我们推理的逻辑说什么，他都感觉希望是科南，而非伍德。例如，他一点都不愿意让以往的自我恢复。事实上，他可能被这种想法吓坏了，即他将再次成为他曾经所是的那个不道德的人。

在我们说他只是在否定事实之前，请想想他已经作为科南生

活了两年，也就是说，并非他所有的过去都是虚构的。请再想想人们怎么忍受失忆症的。如果你头部受到撞击而失去了两年以前的所有记忆，你当然会被这种经历改变，但是，你不会完全变成另一个人。

因此，不难理解科南/伍德为什么能够被视为就是伍德。原因只是在于，科南只存在了两年，他关于两年以前的所有记忆都是虚假的。但是，科南以一个虚构人物开始生活这个事实，并不能否定他已经以一个现实的人生活了两年这个事实。

如果这个问题能以两种方式理解*，我们要如何决定哪种理解更有说服力呢？如果我们问不同的问题，我们将得到不同的答案。伍德的朋友认可他是他们曾经认识的那个人吗？科南的新婚妻子认为她嫁的是谁？伍德的债务人能要求他还债吗？科南/伍德认为自己是谁？与其追问事实如何，或许我们更应当追问，这些问题当中哪个问题最紧要，而我们应该接受的答案，就是对这个最紧要问题的回答。

思考链接：

2. 光纤传送
30. 记忆由此构成
54. 难以捉摸的自我
65. 灵魂转世不变

---

* 即按照科南只存在了两年，他关于两年以前的所有记忆都是虚假的这一点来理解，他好像是伍德；但按照科南虽然以一个虚构人物开始生活，但他确实已经以一个现实的人生活了两年这一点来理解，他好像是科南。——译者注

89

杀少数人，还是让更多人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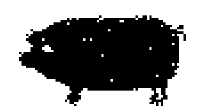
格雷格只有一分钟时间来做一个令人烦恼的选择。一辆失控列车正沿着轨道朝他站着的那个交叉点疾驰而来。沿这一铁轨的较远处，有 40 个人正在隧道里施工。如果列车就这样开过去，肯定会死很多人。

格雷格不能阻止列车前进。但他能拉起铁道换轨器，使列车换驶到另一轨道。沿着这一铁轨的较远处，也有另一个隧道，里面只有 5 个人在施工。死亡的代价肯定少很多。

但如果格雷格拉起铁道换轨器，他就等于有意选择让这 5 人死亡。而如果他撒手不管，造成 40 人死亡的并不是他。他应当造成少数人的死亡，还是放任让更多人死？杀人不是比任其死亡更糟吗？

列车轰鸣而来，引擎的声音越来越大。格雷格只有几秒钟来做选择。是杀少数人，还是让更多人死？

资料来源：菲利帕·福特，"堕胎问题与双重效果学说"，重新发表于《美德与恶习》，牛津大学出版社，2002 年。



格雷格的两难选择，有时会引起两种强烈直觉。对某些人来讲，看来显而易见，他必须拉起换轨器。因为这样做，几乎可以肯定能减少死亡的代价，而这也确实是任何通情达理的、有道德的人应该做的。

对另一些人来讲，如果格雷格拉起换轨器，就等于他以上帝的位置自居，去决定谁生谁死。当然，我们应该尽力挽救生命，但是，如果我们只不过靠杀死其他人来挽救生命，那就不应该。如果我们以挽救其他的生命为杀人的理由，我们就陷入了一条灾难性的滑坡。

第二个论证的问题在于，不管格雷格是否拉起换轨器，都好像是他在选择谁死。他并非选择去扮演上帝的角色，而是上帝已经将角色强加于他。重点不在于他是否去做，而是做或不做，都在他的能力范围之内，并且无论是哪一种选择，他都必须对他的选择负责。

当我们对我们所做的行为负责时，我们只是对那些我们能够轻易做到但选择不去做的事情负责，难道这不是对的吗？假如我知道一杯水有毒，我又看到你准备喝掉它，如果我只是让你走上前去喝水，我将负的责任，难道不是和鼓励你喝光水所负的责任不同吗？如果我看到一个小孩在车来车往的马路上溜达，而我从她旁边经过，考虑到我能轻易把她拉回人行道，难道我对她的死不是至少负有部分责任吗？我们说，如果格雷格拉起换轨器，他将对铁路

上工人的死负责，而如果他不拉起换轨器，他就一点责任都没有，这不是会造成误导吗？

可是，如果我们不在杀人与任其死亡之间做一些道德上的区分，不是有更加令人忧虑的反应吗？最显而易见的是，如果我们认为，对于医生来讲，允许临终病人去死比违背他们的愿望延长他们的生命更好，那么，为什么当病人有要求时，帮助他们轻松无痛地死去不是完全正确的呢？不那么显而易见但更引人注意的是这个主张，即我们对发展中国家民众的死亡负有责任，因为我们坐视他们因缺乏水、食物和医药而死，其实这些东西，我们是无需付出很大代价就可以十分轻易地给予他们的。

如果主张在杀人与任其死亡之间有极大不同这种观点是不合理的，那么，主张二者之间根本没有不同，将会造成一系列全新的道德困境。

思考链接：

15. 平凡的英雄主义
29. 生命依赖
53. 双重烦恼
71. 不能切断的维生设备

9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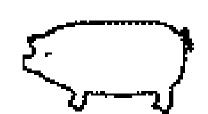
感知并非存在

乔治主教专心注视着身前这碗橙子，然后陷入了深思。

他首先在橙子的两种特征之间作出了明显的区分：一种特征只是表象，另一种则是它们真正拥有的。例如，颜色就只是一种表象：我们知道，色盲或具有不同生理构造的动物，他们看到橙子所产生的经验，就与正常人的“橙色”经验不同。味道和气味也只是表象，因为它们也随着感觉橙子这种水果的人或动物而变化不定，而橙子本身却始终是同一个。

但是，随着他一层层剥离掉橙子的“纯粹表象”，他发现自己能认识的橙子真正拥有的特征消失殆尽。当橙子的大小和形状看上去都依赖于他的视觉和触觉如何感知它们时，他还能谈论橙子的实际大小和形状这些特征吗？不依赖纯粹的感觉表象来想象水果本身，他获得的只是关于某物的一个模糊观念，他知道的并非存在。那么，真正的水果是什么呢？是这个虚幻无常的“某物”，还是终究只是纯粹表象的集合？

资料来源：乔治·贝克莱，《人类知识原理探究》，1710年。



我们并不过多反思表象与实在之间的差别。在婴幼期，我们都是“朴素实在论者”，认定世界就是所表象的世界。随着我们长大，我们学会区分事物呈现给我们感觉的方式与事物实际所是的方式。有些区别——例如，真正小的事物与那些只是离我们远而显得小的事物之间的区别——是如此明显，以至于我们几乎不谈论这样的区别；我们还知道，比如，事物的味道或颜色随感觉者而变化不定。尽管如此，我们在日常生活中却忽视或遗忘这样的区别。

随着我们对世界有了一种基本的科学理解，我们可能逐渐从物体的基本原子结构，以及物体呈现给我们的方式，来理解这种区别。我们可能朦胧意识到，这种原子结构本身也是从亚原子结构来解释的，但我们无需操心当今最新科学的细节。我们所需要知道的就是，事物呈现的方式，是我们的感觉和事物存在方式之间相互影响的结果。

这种认识与成熟的常识相差无几，但这是一种掩盖了一些重要细节的常识。实在与表象区分开来了，但至于这个实在是什么，我们并无清晰观点。你可能认为，这也没关系，因为智力分工预定了，搞清楚实在是什么是科学家的事情。

然而，科学家不也和我们一样处于表象世界之中吗？他们也

研究呈现于我们五官的事物。当然，他们具有工具，这能让他们观察研究肉眼看不到的东西，不过，这只不过转移了注意力。当我用望远镜或显微镜看东西时，我还是处于表象世界之中，就如我用肉眼看东西时一样。科学家所看到的，也没有超出表象世界；只不过他们所看到的，比一般人看到的更精确。

这不是一个科学问题，而是一个哲学问题。我们看上去理解表象世界和实在世界之间的不同，但是要透过表象看“实在”世界，看来是不可能的。理解了月球只不过很遥远，而不是本身很小，或者理解了水中的棍子并不是曲折的，我们也仍未超出表象，只是理解了有些表象为何会比别的表象更有欺骗性。

这给我们留下了两难。我们是仍然坚持存在一个超出表象的世界这种观点，同时又承认我们对这个世界一无所知，甚至无法想象我们如何可能逐渐认识世界；还是放弃存在一个超出表象的世界这种观点，同时接受我们生活和认识的唯一世界终究只是表象世界？

思考链接：

28. 恐怖的情景
51. 桶中之脑
81. 感觉与感受力
98. 体验机

91

无人受损，就可为恶

斯佳丽简直无法相信自己的好运。自从记事以来，布莱德·戴普就一直是她为之心动的对象。今天令人惊讶的是，她在巴哈马竟然偶然之中发现了他僻静的度假别墅，这样的僻静之所，即使狗仔队也不会发现。

更幸运的是，当布莱德看到海滩上孤身一人的斯佳丽，竟然请她到家喝了一杯。谈吐之中，布莱德确实像斯佳丽一直想象的那样可爱迷人。然后，布莱德向她透露，自己过去几个星期一直有点孤寂，所以如果她能当晚陪他，他将非常高兴。而且由于他现在隐身世外，浪漫一夜将永远成为他们心底的秘密而不会让人知道。

可问题是，斯佳丽已经和她相爱的男子结婚。但是，你不知道的事情不可能伤害你，而她丈夫就是那个永远也不会知道的人。她将拥有梦幻一夜，布莱德将不再那么孤寂，每个人都相安无事，而且还多了一些浪漫经验，在这场大家都有得无失的交易中，无人会受到损害。究竟有什么理由，让斯佳丽拒绝布莱德眼神中闪烁的“与我同眠”的邀请呢？



如果某人信任你而你却背叛他的信任，会有什么损失？由于受到极大的诱惑，斯佳丽感觉有时根本就不会有损失。丈夫若不知道她的幽会，对她的信任将丝毫不变。斯佳丽的推理是：既然"无人受损"，那为何不做？

这听上去令人寒心而工于算计，可是，这样的推理方式常见而普遍。只要我们确定无人受损，那些我们通常认为错误的事情，看来就是完全可接受的。例如，只要能确定银行不会发现丢失现金，储户也不会有什么损失，即使从没抢过银行的人，也会从出了故障的自动取款机取走大量钞票而心无愧意。

根据幸福和不幸对行为后果加总，如果某种行为能增加幸福并减少不幸，那就是我们应当做的——这真的就是判定我们的行为道德与否的最佳方式吗？这种伦理学说有简洁明白的优点，不过，它似乎也掩盖了我们道德生活的某些较微妙之处。

让我们想想信任的本质。许多人会说，在人们亲密的人际关系中，相互信任是最重要因素之一。大多数时候，如果信任遭背叛，我们将马上知道。例如，如果我们信任某人会精明地使用我们的钱，那当他乱花钱时，我们就发现了他的背叛。这是信任，不过这还不是最深层次的，因为我们不只是依赖信任来确保我们的愿望被尊重：如果人们不尊重我们的愿望，我们会明白。

比较而言，深层次的信任恰好是这样一种自愿：即使当你不能分辨人们是否会信守诺言时，你仍然信任他们。这是那种完全无

需开诚布公或坦诚相待的安全网的信任。如果我们要让忠贞牢不可破，这样深层次的信任是绝对必要的，因为就像大家知道的，不忠行为通常都会保密，甚至直到永远。

因此，如果斯佳丽和布莱德共度良宵，她将破坏夫妻之间的深层次信任。正是她丈夫永远也不会知道这一点，使她对丈夫的背叛变得彻底而完全，因为在不可知的情形下被信任，是最深层次的被信任。

也许“无人受损”，可是，信任也许已经被破坏了，尽管它造成的伤害是看不见的。因此，斯佳丽破坏了她最看重的夫妻关系中最重要的深层次信任，怎么可能没伤害任何人呢？

思考链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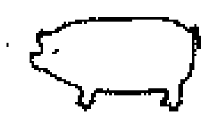
7. 没有赢家
34. 不要怪罪我
44. 至死才分离
83. 黄金法则

92

自治政府

一想到这种情况就让人无法理解，在过去那段糟糕的日子里，人们居然托付一个也许对经济学知之甚少的部长，对诸如财政支出和税收等事务做出重大决策。当设定利率的权力转交到中央银行之后，情况得到些许改观。但是，只有当电脑变到比人类更能有效管理经济时，才能出现真正的突破。例如，超级电脑格林斯潘二代已经管理美国经济20多年了，在这期间，经济增长持续且高于长期平均水平，价格没有暴涨暴跌，失业率也维持低水平。

另外，在角逐白宫的大选中，根据民意调查（由电脑处理且非常精确），领先者将是另一台电脑，或者至少是某个承诺让电脑做全部决策的人，也许这并不令人吃惊。这台叫做边沁的当选总统的电脑，将会根据全国人民的普遍幸福，来测定各项政策的效果。边沁的支持者宣称，边沁将有效地把人从政府中全部免职；并且，由于电脑没有性格缺陷或既得利益，边沁将是对它取代的政治人物的一个巨大改良。就此而言，不管是民主党人还是共和党人，都提不出有说服力的反对理由。



让电脑管理我们的生活，这种想法仍然让我们绝大多数人有点毛骨悚然。但是在实践中，我们又始终把自己托付给电脑。我们的金融几乎完全由电脑管理，今天许多人也相信，自动提款机比银行职员能更精确地记录交易情况。电脑也管理轻轨；如果你搭飞机，你可能不知道，飞行员很长一段时期根本就无事可做。事实上，电脑可以更轻松地操控着陆和起飞，只是乘客仍然无法接受电脑操控飞机起降这种观念。

因此，电脑可以管理经济这种观点并非如此异想天开。毕竟，大多数经济学家已经严重依赖电脑模拟和预测。从按照由机器生成的信息行动，到让机器为我们做出这种行动，只是一步之遥。

电脑能完全取代政治家吗？这是一项关于边沁的总统竞选的更激进的提议。如果电脑能计算政策对全民幸福的影响，那么，它为什么不能做最让我们满意的事？

要整个取代人，并不是那么容易。问题是，我们必须为电脑设定目标，而政治目标不只是尽可能地让更多人快乐这件事。例如，我们必须决定准备容忍多大程度的不平等。一个政策也许在总体上让更多人快乐，但以5%的人处于不幸条件为其代价。我们可能更喜欢这样一个社会，它总体上不是那么幸福，但却没有人不得不过一种悲惨的生活。

电脑不能决定哪一种结果更好，只有我们能够做到。此外，我们希望得到的结果可能随情况而改变。例如，社会变得越富裕，就

越不能容忍让任何人缺乏最低必需品。此外,我们变得越富裕,我们就越可能认为,我们必须帮助其他不那么富裕的国家。

即便电脑知道我们的愿望,也无法结束争论。民主社会应当只是服从多数人的意志,还是也应考虑少数人的意愿?如果应当考虑,又怎么考虑?

电脑能够比人类更好地管理经济甚至公共事务,这一天很可能会到来,也许比我们认为的还快。但是,至于电脑怎样能够决定什么对我们最有利,并且让所有政治家永远地卷铺盖走人,我们还是很难理解。

思考链接:

9. 老大哥
10. 无知之幕
36. 先发制人的正义
87. 公平的不平等

93

行尸走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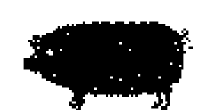
露西娅住在一个小镇，那里灯火通明，可是没人住在家里。与她住在一起的，是一群行尸走肉。

其实情况并不像听起来那么吓人。这些行尸走肉并不是恐怖片中食肉的食尸鬼。他们的长相和举止都和你我完全一样，甚至也有和你我完全相同的生理结构。但是有一个关键的不同：他们没有心灵。如果你刺他们，他们也会“哎哟”大叫并退缩，但他们不觉得痛。如果你“烦”他们，他们也会哭或变得愤怒，但内心不会真正烦乱。如果你为他们演奏抚慰心情的音乐，他们看上去也会欣赏，但在他们心里，什么也没有听到。在外表上，他们就是普通人；但在内心，却什么事也没发生。

这让他们很容易相处。由于他们的言行完全像常人，他们也提及自己的感受方式或想法，因而很容易忘记他们并不像露西娅那样拥有内在生命。小镇游客也没有注意到有什么奇怪，甚至当露西娅告诉游客们这个秘密时，他们都不愿相信她。

“你怎么知道他们没有心灵呢？”他们问道。露西娅

的回答是,“你又怎么知道其他人有心灵呢?”这通常都让他们回答不上。



“你怎么知道?”通常是一个非常好的问题,哎,不过它也是一个非常难以得到最终答案的问题。我们很少(也许从未)毫不怀疑地确信一件事。我们最多能够希望,对于我们相信的事情给出很好的理由,至少,这个理由要比支持相反观点的理由更好。这就是我们不觉得有必要担心自己可能跟一群行尸走肉生活在一起的原因。即使这是可能的,只要我们有更好的理由相信自己不跟行尸走肉生活在一起,我们就能安全躲过这种不可能的可能性所带来的烦恼。

认为其他人不是行尸走肉,主要原因只是为了省事。如果他们和我们一样走路,和我们一样说话,并且和我们一样拥有大脑和身体,那么,他们很可能在所有重要方面也和我们一样,包括他们内心感受事物的方式。如果神经系统能让我产生意识却不能让他人产生意识,这将是非常奇怪的。

然而,这正是行尸走肉的可能性变得有趣的地方。因为,我们为什么应当认为身体方面相似就暗示精神方面也相似呢?意识问题正在于,我们无法说明,诸如大脑等纯粹的身体实体会产生主观经验。为什么脑中的 C 神经纤维电冲感觉起来像这么回事?这种大脑活动与疼痛的感觉有什么关系?

如果这些问题看上去尖锐且没有令人满意的答案,那么,由此

就可以得出，想象诸如C神经纤维电冲等大脑活动并不伴随产生感觉，没有什么逻辑矛盾。换句话说，行尸走肉的观念——它们在身体的各个方面都和我们一样，但却根本没有内在生命——完全是连贯一致的。因此，其他人是行尸走肉这种可能性是实际存在的，尽管不大可能。

就如在恐怖片中那样，消灭行尸走肉并不容易。为了降低行尸走肉存在的可能性，你必须说明，为什么拥有与我们相同生理结构的受造物，必定拥有与我们相同的基本心理状态。这意味着要说明，比如，为什么C神经纤维电冲时必定感觉起来像疼痛，而不是看见黄颜色，或者根本就毫无感觉。这是个挑战，迄今为止，还没有人能够让哲学家普遍感到满意。在有人克服这个挑战之前，我们不能确信行尸走肉不会游荡在地球上。

思考链接：

19. 揭穿谎言
32. 解放西蒙
39. 中国式话亭
68. 不可思议的疼痛

94

连锁推理悖论

这是财政大臣索莱茨阁下(Lord Sorites)在一次聚会上的政治演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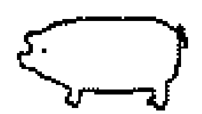
我们国家课税的时候到了。上届政府留给我们的，是花得精光的财政，以及提升额外税的义务。但是你们各位不想负担费用。那么，我们如何能够既筹措所需税金又不让各位感到痛苦呢？

答案很简单。焦点小组、民意测验和经济学家都表示，额外加征百分之零点零一的税金，对个人收入的影响微乎其微。在税单上多付百分之零点零一的额外税金，并不会让舒服地赋闲在家的人去努力奋斗，并不会让富人变穷，也不会让已经努力奋斗的人更辛苦地奋斗。

因此，我们今天只提升百分之零点零一的所得税。在逻辑上，由于这个很小的增额对那个比你少赚百分之零点零一的人的影响，就像对你造成的影响一样微不足道，那么，当你明天处在那个比你少赚百分之零点零一的人的位置上时，我们可以重复同样的步骤。因此，下一天，再下一天，一直到第三百天，这个很小的增额对你的影响还是微不足道。

我们每次都加税，但是，我们的加税并没有对你的生活质量造成差异，因此你的生活质量将不受影响。然而不可思议的是，这些措施的实际结果是政府税收大量增加。我们打算用这一大笔钱削减国债，并且，还将剩下足够的零头给全国人民每人买一瓶饮料。我们希望你们用这瓶饮料为我们的妙计干杯！

资料来源：古代的连锁推理悖论，归功于米利都的欧布里德，公元前 4 世纪。



做出这种演说的政客，不要期望赢得任何选举。即使你的数学差到不足以算出财政大臣实际上提议的税收涨幅超过 3%，你也不会被这个说法所愚弄，即 300 次提税不会造成很大的提升。

然而，财政大臣的逻辑却难以挑出毛病。它遵循的是自古代连锁推理悖论的逻辑。在原初的悖论中，我们被问到，从沙堆上移走一小粒沙子，能否使沙堆化为乌有（也许化为小沙堆）。答案看来是否定的。但这意味着，你可以不断地一粒一粒移走沙子，直到剩下最后一粒，那也仍将是一个沙堆。

一个解决办法看来是，在不断移走沙子的过程中有个点，此时移走一粒沙就确实意味着我们不再拥有一个沙堆。但这恰恰看上去是荒谬的。因为连锁推理悖论正是：如果一小粒沙能造成差异，这是荒谬的；但如果每一粒沙都不能造成差异，那只剩下一粒也仍是一个沙堆，而这也是同样荒谬的。

我们的课税例子暗示了一种摆脱困境的方法。难道我们不能指出每次小量增加都的确造成差异(尽管只是一个微小的差异)了吗？显然，如果你加总几次微小的差异，你就能最终得到一个很大的差异。

然而，这种方法并未触及问题的核心。这个悖论是，收入上的任何微小变化都不足以让某人变富或变贫。准确地说，这个悖论是这二者之间的对照：当我们"拉远镜头"看宏观时，看到的是微小改变的累积效果；当我们"推进镜头"看微观时，看到的是每个改变都根本毫无效果。

当碰到这个悖论时，大多数人都深信它只是一个语言把戏，或者有某种别的花招在起作用。然而，我们应当更严肃地对待这个难题。许多人认为，摆脱困境的办法要求我们承认一些概念的模糊性，比如，富与贫、高或矮、堆或叠。这种解决办法的问题是，如果我们允许语言和逻辑有太多的模糊性，理性本身也就变得模糊不清了。可供选择的另一种解决办法——微小的改变确实能够造成贫富之间的差异——虽然维持了逻辑和语言的严格精确，但好像要以失去真实性为代价。

思考链接：

16. 比赛中的龟
25. 布莱登的难题
42. 拿了钱就跑
70. 突击检查悖论

95

恶的问题

上帝对哲学家说："我是上帝，你的神，全爱、全能和全知的神。"

"当然不是！"哲学家回答道，"我看到的这个世界，充满着可怕的疾病、饥荒、饥饿、精神疾患。然而，你不阻止这些事情。是你不能阻止吗？这样的话，你就不是全能的；是你不知道有这些事情吗？这样的话，你就不是全知的；或许是你不想阻止？这样的话，你就不是全爱的。"

"无礼！"上帝回答道，"我不阻止所有这些邪恶，对你们是更好的。你们需要在道德上和在灵性上逐渐成熟，这样的话，你们需要有为善为恶的自由，以及遭遇偶然发生的苦难的自由。如果剥夺你们成长的自由，我怎么可能让这个世界变得更好呢？"

"很简单，"哲学家回答道，"首先，你可以这样设计我们，以至于我们不那么感到疼痛；其次，你可以让我们有更多的同情心，防止我们加害他人；第三，你可以让我们成为更好的学习者，因而我们不必为成长而遭受如此多痛苦；第四，你可以让自然不那么残酷。你要我继续说下去吗？"

资料来源：恶的问题以各种形式反复出现于整个神学史。



上帝能够创造这样一个世界吗？在其中痛苦比较少，但我们又有同样的机会去运用我们的自由意志，并按照宗教的说法，在灵性上不断成熟。我们在回答这个问题时，很难不迎合我们先前的偏见。对无神论者来说，答案显然是肯定的。我们故事中的哲学家马上提出了四个建议，这些建议没有哪个看来是不可能的。请想想我们天生就有一定的同情心，因而让我们绝大多数人都不愿意伤害他人。如果我们具有同情心与我们具有自由意志是相容的，那为什么具有更多的同情心就会威胁自由意志呢？

还请想想，我们的学习能力也是某种我们无法直接控制的东西。事实上，我们总有些人比其他人更擅长学习。为什么上帝不让我们所有人都成为更好的学习者，使我们无需遭受那么可怕的不幸，就能理解事物的对错呢？这样的考虑让许多人得出结论：上帝能非常轻易地创造一个痛苦较少的世界；他没有这么做，证明他要么不存在，要么就不值得我们崇拜。

但如果你真的信仰上帝，这些论证可能看来就是非常无力的。因为我们有什么资格说上帝本来可以做得更好呢？如果上帝存在，他远比我们更有智慧，因此，如果他创造了一个充满痛苦的世界，必定是出于很好的理由才这么做的，即使我们又笨又可怜的心灵理解不了那些理由。

作为回答，这可能看来无法令人满意。因为这等于是说，即使我有合理理由怀疑上帝的存在，我们也必须接受我们的智力有限这一点，以及接受那些可能看来非理性或矛盾的东西；而从神的观点来看，这些非理性或矛盾的东西是合理的。但这只是意味着排除了理性在宗教信仰中的作用。你不能见风使舵。如果你不承认反对信仰的合理论证有任何说服力，那么，利用理性来为你的信仰辩护，就是没用的。

这就是为什么信仰者似乎不存在恶的问题的原因。解决恶的问题最合理的尝试，就是各式各样的这种论证，即恶的问题最终必定是完全出于上帝的好意。但是，要接受这种论证的话，就要求接受一种违背理性的信仰，因为我们的理性告诉我们，这并不是上帝能够创造的最佳世界。如果人们可以指控无神论者自认为知道得比上帝还多，那么，人们也可以指控信仰者自认为知道得比理性还多。哪一种指控更严重呢？

思考链接：

8. 善良的上帝

17. 选择拷打

18. 理性的要求

58. 神的旨意

96

自家人优先

萨莉的船是少数几艘在这片海域定期航行的船只之一，所以她总是重视留心收听求救广播。这不，她又收听到有艘船发生爆炸，致使 12 人落海，也没有救生船，因此，萨莉马上就驶向事发地。

但就在此时，她又收到了第二个信息，她丈夫的渔船正在下沉，也需要帮助。但问题是，为了救丈夫，她将需要航行更远的里程去救那 12 个人。随着天气变坏，又没有别的船回应遇险呼叫，萨莉清楚地意识到，她只能挽救一方。当她到达第二方时，那里的人可能已经遇难了。

萨莉没多少时间来细想。一方面，不去救丈夫吧，看来是对他们爱情和信任的背叛；另一方面，丈夫是个大好人，不会不明白她去救 12 个人而不去救一个人的意义所在。她知道她想首先去哪里，但那也许不是她应当去的地方。



大多数伦理学家都认为，道德要求平等尊重所有人。就像边

沁说的，"一人算一人，一人一票，没有人可以多于一票"。然而，这看来与这种强烈的直觉相冲突，即我们对家人和好友有着特殊责任。例如，父母不是的确应当把自己小孩的幸福置于别的小孩之上吗？

不要这么快下结论。父母确实对自己的子女有一种特殊责任，那就是说，比如，父母必须确定自己的子女吃得好，反之，他们没有义务去监督别人的小孩营养摄入的情况。不过，这是否与说他们应当把自己小孩的幸福置于别人小孩之上相同呢？

例如，让我们想想在好学校竞争入学机会的情况。如果只有一个名额了，又有两个学生想上学，那么，双方家长都有责任为自己孩子获得机会创造良好条件。但是，为了程序公平起见，对双方都应当根据孩子的优点和福利平等考虑。如果哪个家长试图干涉这些基本的公平原则，他们就是弄错了。他们混淆了对子女的可接受的父母之爱和可称赞的父母之爱，缺乏对他人福利的尊重。

在此起作用的基本原则看来是，我们把精力和关心投入到家人和朋友身上而不是陌生人身上，这是对的，只要我们在这样做时公平地对待每个人。

然而在实践中，这条原则并非是十分有用的指南。当别的孩子饿得要死时，你自己的孩子却在浪费昂贵玩具，这是公平的吗？当贫困的父母不能充分利用工作机会时，能说会道又学富五车的父母却从公职中获得最大的好处时，这是公平的吗？当你辅导孩子做家庭作业从而使他们优于那些父母亲不愿意或不能够辅导的孩子时，这是公平的吗？

其中某些问题比别的问题更难。但是，除非你认为我们只需考虑我们自己和我们的家人，否则每个人都会在某些时期遇到这

样的两难。萨莉的两难特别严重而急迫，因为性命须臾。但是，她必须思考的问题也是我们都要思考的：把那些与我关系亲密之人的福利，置于其他人的福利之上，这是正当的吗？

思考链接：

27. 履行义务

29. 生命依赖

89. 杀少数人，还是让更多人死

97. 道德运气

97

道德运气

麦特望着与她闹僵的丈夫的双眼，可她看不到一点悔改之意。

“你告诉我你希望我们回去，”她对他说，“但你甚至都不承认你抛下我和孩子们不管是错误的，你叫我怎么回去呢？”

“因为我打心底就不认为我做错了，我也不想对你说谎，”保罗解释道，“我离开你们，是因为我要追随我的缪斯女神，我是为了艺术而走的。难道你忘了我们过去曾谈论高更，谈论他也同样出走的事了吗？你总是说，他做了一件无情的事，而不是一件错误的事。”

“但你不是高更，”麦特叹息一声，“这就是你回来的原因。你承认你失败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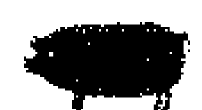
“当高更离家时，他就知道他会成功吗？没人会知道！如果他是对的，那我也是。”

“不，”麦特说，“他赌赢了，所以他被证明是对的；而你赌输了，所以你被证明是错的。”

“他的赌博？”保罗回答道，“你是说运气能导致对错之分？”

麦特想了一会说："是的，我想我是这么说的。"

资料来源：伯纳德·威廉姆斯《道德运气》一书中的同名文章，剑桥大学出版社，1981年。



运气能导致成败之分、苦乐之分、贫富之分，但它真的能区分善恶吗？我们是否是一个善良的、正派的人，必须依我们是谁以及我们做了什么而定，而不是依我们无法控制的事情而定。

这是常识使人想到的。但是，即使运气不是决定善恶的主要因素，我们真的能如此确定它在伦理学中就根本不起作用吗？

最基本的是，存在所谓的创设性运气。我们生来就有某些特征和品性，它们又随着受教育的方式而发展，然而，这些都不是我们选择的。结果就是，到了我们自己做选择的年纪，相比于我们一般的同龄人来讲，我们已经被或多或少地预定了倾向于善或恶。达到这个年纪的人，若是发现自己易于勃然大怒，他们就更可能为恶，然而，这纯粹是在基因和教育这个彩票箱里抽到一张倒霉彩票的结果。

即使我们不谈创设性运气，我们也熟悉这句感恩之言："要不是上帝恩宠，走到刑场的就是我。"我们所有人都可能做得比我们实际做的更差，如果我们想避免发现自己处于一种邪恶的境地，其中，部分是运气问题。

在保罗和麦特的情形中，运气的作用甚至更明显。麦特的论证是，两个人行为一样，都不确定结果会怎样，只有当我们知道结

果是好是坏时，我们才能说他是对是错。因此，离家出走的高更成为了一位伟大艺术家，这使得他的离家成为一个道德上正确的选择；而保罗，他也做了同样的选择，但却没有成功，就被谴责为做错了。

如果这个例子看上去太奇特，就让我们想想我们偶尔所犯的粗心大意。例如，如果所犯的粗心大意导致了严重的伤害，所犯之人就被看成是道德上应受谴责的；如果我们的粗心大意碰巧没有坏的后果，很少有人会认为我们很坏。这暗示确有道德运气这么一回事吗？还是我们更应当谴责那些判断错误却庆幸没有坏结果的人？我们是否应当说高更是错的呢？即使我们认为他所做的比他待在家里要好很多。

思考链接：

27. 履行义务
34. 不要怪罪我
43. 未来的震惊
96. 自家人优先

98

体验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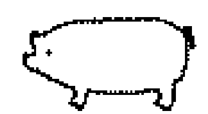
罗伯特已经在同意书前坐了两个小时了，但他仍然不知道是否要签还是要撕掉它。他的决定关乎自己两种不同的未来。

一种未来是，前途黯淡，实现梦想的机会渺茫；另一种未来是，他将成为著名的摇滚歌星，保证享有永久的快乐。你可能想，这称不上是个选择吧？但是要补充的是，第一种生活是现实的，而第二种却完全依赖于体验机。

这个机器设备能让你在一种虚拟现实环境中完整地度过一生。你所有的经验都是被设计的，以便让你更快乐，更满足。但关键的是，一旦进入该机器，你就不会知道自己并非处于现实世界，也不知道发生在你身上的一切都是为了满足你的需要而设计的。看上去你就在普通世界中过着普通生活：只是在这种生活中，你是一个赢家，看上去事事都如意。

罗伯特知道，一旦进入机器，人生将很美妙。但尽管如此，这种人生的虚拟性，还是让他很犹豫签下这份将带他去快乐天堂的文书。

资料来源：罗伯特·诺齐克，《无政府、国家与乌托邦》，第三章，基本书库，1974年。



不难明白为什么罗伯特犹豫不决。机器中的人生将是假冒的，不真实的，不实在的。但为什么一种真实的"现实"人生，尽管无情地起伏循环，却比一种假冒的快乐人生更可取呢?

一位快乐机器推销员会提供许多有力的论证来说明，不是这样。首先，让我们想想"真实性"和"现实的"意味着什么。一个真实的人，就是他们实际上所是的人，而不是他们假冒所是的人。但处于机器中的罗伯特仍然是罗伯特。他能在机器中轻易地展现他真实的人格，就跟他能在机器外展现一样。

然后你可能说，在现实世界中，你是靠实力成为摇滚歌星，但在机器中，却不是靠自己的努力去获得奖赏。对于这一点，推销员可能反问道："你真的非常了解摇滚歌星吗?才能与成为歌星没什么关系，运气和机会才是一切。罗伯特在机器中的名声，将和无数想成名者的名声一样应得，他们也不过靠不可靠的流行音乐出名。事实上，这正是体验机最大的可贵之处。人生的成功大多要靠运气：是否出生在恰当的地点、恰当的时间、恰当的家庭?是否先天具有你的社会所重视和高度评价的能力?是否有获得接触能助你出人头地的人或职位的途径?当你能够选择快乐时，却说让自己受命运女神的支配更好，这不是很愚蠢吗?"

至于说到进入体验机就是放弃实在世界这个观点，我们可以

说："醒醒吧！"你现在所生活的世界，不过是你的经验之总和，包括你所看到的、听到的、摸到的、尝到的、触到的、闻到的。如果你认为，只是因为由亚原子的生理过程所导致的，就比由硅片所导致的要更实在，也许，你必须重新思考你的实在观念。毕竟，即使我们关于科学世界的观念是超出经验范围的，它最终也基于完全不超出经验世界的观察和实验之上。因此在某种意义上，实在就是表象。

可是，我们可能仍然不想进入体验机，因为我们觉得，我们的未来应当尽可能是我们自己意志和努力的产物。如果我们坚持不进入体验机，那至少有一点理由是正确的：当我们考虑我们自己最合乎需要的利益都有哪些时，我们在意的绝不只是快乐。否则的话，我们早就飞快地进入体验机了。

思考链接：

1. 邪恶的魔鬼
19. 揭穿谎言
28. 恐怖的情景
51. 桶中之脑

99

给和平一次机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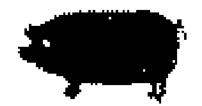
希特勒已经极为秘密地派出了密使。如果英国试图公开揭穿密使的使命是什么，柏林方面将否认知道有这次出使，并且宣布密使是卖国贼。但是，这肯定是不必要的，因为没人能够理解，丘吉尔怎么能拒绝希特勒提供的这份密约。

希特勒知道，丘吉尔想要避免不必要的伤亡。两国领袖也明白，两国间的冲突将使成千上万的人失去生命。但战争是可以避免的。希特勒保证，一旦最终解决(the Final Solution)*结束，将不再发动进攻，只杀害占领区内的造反者。这意味着，如果英国不试图解放法国和推翻德国的纳粹政权，就只有更少的人失去生命。

希特勒确信，这将对发明了功利主义的国度之元首有吸引力。毕竟，谁会更喜欢一种造成较多死亡而不是较少死亡的行为呢？

---

* 希特勒20世纪初提出的最终解决(the Final Solution)，是指在全球消灭犹太人，让高贵的日耳曼血统统治世界。——译者注



虽然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希特勒事实上并没有派遣这项出使任务，但是他确实认为，从各方面来看，英国将会接受这个允许他占有已经占领的领土的和平协议。一个理由也许正体现了这种想法，即战争将使更多的人失去生命，因而不管出于实用主义考虑还是在道德上，和平看来好像是最佳选择。

有许多人——特别是那些亲属死于集中营的人——一想到这样一个和平协议就会感到战栗。这项提议看来是以犹太人大屠杀的无辜受害者的生命来换取和平。

如果你也同意这种回答，那就请仔细想想，你是如何判断其他战争的道德性的。关于军事干涉的伦理道德的许多争论，都是以行动或不行动的伤亡人数为依据来进行的。例如，反战人士敏锐地指出，据估计，在 2003 年 3 月入侵伊拉克之后的第一年内，就有大约 1 万平民被杀。然而，人们相信在萨达姆主政期间，他已经杀害了 60 万平民。而作为对此的回应，也有人认为，是联合国制裁，而非萨达姆政权，应对 50 万伊拉克儿童的死亡负责。因此，无论是要论证作战合理还是要谴责作战，都要拿更多的人命伤亡说事。

这似乎假定，如果战争损失的人比拯救的还多，那么它在道德上就是错误的。但根据这种逻辑，我们很容易想象一种情景，比如希特勒秘密提出的这个协议，使得对同盟国来说，最好是将欧洲拱手让给法西斯主义。

为什么很多人认为这是不可接受的，一个原因就在于，集中

营是一种邪恶，看来需要我们做出反应。情况可能是，为了阻止种族灭绝，可能会损失比它拯救的人更多的人，但是，让这样的邪恶为所欲为，也是不可容忍的。我们的人性比我们个人的生命更珍贵。

即便我们不考虑犹太人大屠杀，还是有理由宁愿流血解放而不是不流血容忍。人类之所以选择冒着生命危险去追求理想，就在于他们认为有些价值比单纯苟活更重要。因此有句话说："自由地死去，胜于像奴隶般地活着。"这就是为什么在第一次海湾战争期间，即使炸弹落在他们身边，许多伊拉克人也高兴的原因。战争的道德性是个棘手问题，也是个不能通过简单合计它所损失和拯救的人的多少来解决的问题。

思考链接：

17. 选择拷打
18. 理性的要求
35. 最后的诉求
79. 发条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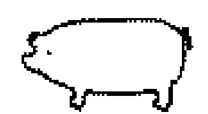
100

雀巢咖啡馆

埃里克是这家雀巢咖啡馆的常客。这里餐点和饮料的质量很普通,但价格非常便宜。

一天他问经理是如何让价格变得便宜的。经理弯下身子靠近他耳边,以带点阴谋的语气低声说:"这还不容易,你看,我所有员工都来自非洲。他们需要生存,但又不能找到固定工作。因此我让他们睡地下室,供他们吃,并且每周只付他们 5 英镑,最主要的,他们全天候工作,一周 6 天。正因为我的劳动力成本如此低,所以我能定比较低的价格,并且还能获取丰厚利润。""不要那么惊讶,"她边观察他的反应边继续说道,"这让每个人都很满意,他们选择在这儿工作,是因为这对他们有帮助;我赚了钱,并且你也得到了实惠。咖啡要加满吗?"

埃里克续满了一杯,但这也许是他在此喝的最后一杯咖啡了。尽管这位经理说得有理,但作为一个顾客,他将成为剥削劳工的共犯。然而,在埃里克啜饮他的美式咖啡时,他不知道这些员工是否将会感激他对这种剥削的抵制。难道有份工作和这个地下室作为容身之所,不比一无所有更好些吗?



你不必成为一个好战的反资本主义者，也能认识到这一点，即生活于发达国家的人，实际上处于与埃里克相同的处境。我们能进口到相对低廉的商品，是因为生产这些商品的人都低薪工作；如果我们知道了这一点还继续购买，我们就在为维持工人的低薪助纣为虐。

不要被表面的差异忽悠了。虽然在这个故事中，埃里克比我们更接近廉价劳工，但地理位置上的远近在伦理学上意义不大，你不会因为与被剥削者相距千里就没有剥削他。同样，咖啡馆雇员的非法务工也不是问题的关键，只要想象一下这样恶劣的雇工方式也被允许就可以明白了。

你可能会说，公平工资的水平取决于当地的一般水平，所以，像在英国这样国家中的“奴隶工资”，放到坦桑尼亚将是高薪。这没错，但这并不能结束争论。因为关键点在于，雀巢咖啡馆利用了员工需要这份工作这一点，尽可能地降低工资。其非正义主要不是表现在比较工资上，而是表现在惟利是图对其员工福利的漠视上。同理，发展中国家种植咖啡豆的人，也许并不比他们许多同胞过得差，但这并不意味着，他们的西方雇主不需要关心他们工作多么苦而收入多么少，特别是当雇主有能力付给他们更多时。

“少总比一无所有好”这个辩解，也不能说明问题，因为可供选择的不只是一无所有，而是更高的工资或更好的工作条件。对低廉品的抵制可能使被剥削的工人失业，但是反过来，来自譬如雀巢

咖啡馆这样公司的低价竞争，也会使其他正当领取工资的工人失业。

因此，在道德上相关的各个方面，看来我们确实处于与埃里克相同的处境。如果埃里克通过消费帮助雀巢咖啡馆中饱私囊*是错误的，那我们从那些以同样方式对待产业链末端的员工的公司购买东西也是错误的。

这是个非常使人烦恼的结论，因为看来几乎我们每个人都参与了剥削。这一点可能看来是如此蛮不讲理，因而可能被认为是证明这个论证错误的证据。但这只是他们一种自鸣得意的回答。在历史上，曾经存在许多系统性的不正义（systemic injustice），这些不正义是社会所有方面都暗中支持的，试想南非大多数白人在种族隔离时的行为、奴隶制度时期的中层与上层阶级以及男性先于女性被赋予平等权，就会明白这一点。几乎所有人都始终犯错，这是可能的。如果埃里克应当重新思考去哪里买咖啡，我们也应当重新思考去哪里买其他许多商品。

思考链接：

7. 没有赢家
22. 救生艇
34. 不要怪罪我
44. 至死才分离

---

* 巧妙运用 nest 的大小写所分别意味的“雀巢咖啡馆”和“雀巢”，作者在此一语双关地运用了 to help feather the Nest，因为 feather (one's) nest 即“中饱私囊”之意，所以在此翻译为“帮助雀巢咖啡馆中饱私囊”。——译者注